

中國古代的類書



中 华 书 局

中国古代的类书

胡道静著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5 1/4 印张·116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400册
统一书号: 10018·485 定价: 0.60元

春秋左傳曰衛懿公好鶴有桑扈者及有

秋人之鄰國大受甲者皆曰使鶴鶴齊有標

位余焉能戰遂敗杜預曰軒大夫也齊子曰齊懿公諸無有以文也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晨鶴鳴

神異經曰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七寸為

人目擊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

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長海鶴胡遇春

而壽五百歲人在鶴腹中不死而鶴一舉

千里張氏云在四北陳

春秋考異却曰想知夜半

宋初注曰陽水尺尺能感其氣則益也

現存的最早之類書

敦煌唐寫本北齊《修文殿御覽》

一說為更早的梁代《華林遍略》

藝文類聚卷第八

歐陽 詢 撰

山部下 虎丘山 蒜山 石帆山 石鼓山 石門山

太平山 岷山 會稽諸山 交廣諸山

水部上 慈蘇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濮水 洛水

虎丘山

虎丘山銘曰晉司徒東亭獻公王珣撰云武丘山先名海涌山 吳越
 春秋曰闔廬死葬於國西北名虎丘山乎夫為川積壤為丘發五都之
 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隄土冢池四周水深丈餘擲三重傾水銀為池
 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危鴈扇諸之劍魚三千腸在焉苑疇之已三
 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墳故曰虎丘 王珣虎丘記曰山大勢西面周
 嶺南則是山逕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踐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
 張正見從水陽王遊虎丘山詩曰滄波壯樹附島洛巨鎮亦示其不若
 茲山巖崿峻擅水鄉地靈存少室空艱像太行重巖標虎披九曲
 峻羊腸潮深瀾無底風幽谷自涼寶氣沈餘王氣劍隱壁屋光白雲多

《藝文類聚》

南宋紹興間嚴州地區刻本

太平御覽卷第一

翰林學士袁章纂次大中府府志書局刻註在國經書館藏書

初纂

晉日知院

天部一

元氣
太素

太易
太極

太初
天部上

太始

元氣

三五曆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狀如雞子溟滓始牙濛

濛孔鴻洞孔滋萌歲在攝提元氣肇始又曰清輕者上為

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河圖曰元氣闡闢陽為天

又曰元氣無形淘淘蒙蒙偃者為地伏者為天也

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所自焉

《太平御覽》

南宋蜀刻本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一

總錄部百五十一

公直

直

服義

公直

滅私之謂公正曲之謂直君子之懿德也自上古之世移至公
之道廢則情勝於理恩克於義心由利易政以勢遷自非時獻
中庸好是正直執不阿之道守無頗之性則焉能獻替可否不
以辭而掩賢聞實憲章不以親而害法臨事盡節外顧於妻孥
當官而行罔避於權右刑奏列而無隱斥問遺而不通故能成
剛毅之風全忠信之行先聖所以嘉歎良史所以攸書宜乎為
後世之懿範也

史魚為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

叔向為晉大夫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

冊府元龜

目次

第一章 类书的性质、起源及类型

- (一) 类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位置.....1
- (二) 类书的起源和远源.....5
- (三) 类书的范围和各种类型.....8

第二章 类书的作用、反作用和特殊作用

- (一) 类书的本来作用及其流弊15
- (二) 类书的第一特殊作用22
- (三) 类书的第二特殊作用35

第三章 曹魏和南北朝的重要类书

- (一) 《皇览》40
- (二) 《寿光书苑》43
- (三) 《类苑》44
- (四) 《华林遍略》45
- (五) 《玄洲苑御览》——《圣寿堂御览》
——《修文殿御览》47
- (六) 《珮玉集》55

第四章 隋代的重要类书

- (一) 《长洲玉镜》58
- (二) 《编珠》59
- (三) 《北堂书钞》64

第五章 唐代的重要类书

- (一) 《艺文类聚》77

(二) 《文思博要》; 《三教珠英》——《海内珠英》	84
(三) 《兔园策府》; 《类林》; 《增广分门类林杂说》	87
(四) 《初学记》.....	94
(五) 《白氏六帖事类集》; 《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 《孔氏六帖》; 《唐宋白孔六帖》; 《六帖补》.....	102
(六) 《稽瑞》.....	114

第六章 北宋的重要类书

(一) 《太平总类》——《太平御览》.....	117
(二) 《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	133
(三) 《一字题赋》——《事类赋》.....	147
(四) 《重广会史》.....	151

后记	154
----------	-----

第一章

类书的性质、起源及类型

在我们清理祖国古代文化、研究古代历史的工作中，经常会运用到古代的类书，从其中搜集有关的资料。因为它们总是把历史文献上的各种资料，分类汇辑在一起。因此，类书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是很明显的。

类书辑录的资料，一般都不是单门、单类的专题性质的，而是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的，所谓“区分胪列，靡所不载”《玉海》李桓序语；“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陈梦雷《上诚亲王汇编启》语者。所以，十分接近于现代的“百科全书”。当然，它们只是封建社会体系的百科全书。而且，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不是专门把有关的原材料辑录在一处；中国古代的类书的编辑方法则一般地与此相反。因此，构成了类书性质的特点——兼“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两者而有之。也正因为这样，从今天看来，古类书不仅可以作为了解古代知识全貌的一种工具，而且也是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藪。

（一）类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位置

谈谈类书在我国古典目录学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借此以明确类书的性质，同时也说明它们在古典目录学中的部位及其变革。

我国的古籍，自晋、隋以来，按“四部”分类——经、史、子、集，每一部代表一个大的门类。类书和丛书，实际上都综赅四部的书，

是哪一部也容纳不了的。但习惯上总是把这两类书籍，特别是类书一类，放在子部里。例如，清末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把丛书独立成一部，和四部相并而成为五部；但是，类书还是放在子部里。不过，在类目下附了一个注说：“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①因为传统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子部的内容是可以综括群类的，好象我们今天的“总类”一样。这种看法，是由于子部里有“杂家”一类，而“杂家”本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当类书在古典目录学里还没有被独立安置一类时，是附处在杂家类里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类书性质的书十多部于子部·杂家类的末尾，是作为杂家的附庸或杂家的一支看待的。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意见，《隋志》的杂家类实包容四支：（1）诸子之属，（2）杂家之不名一体者，（3）类事之属，（4）释家之属。《隋志》上虽未标明这些属名，但从书籍的排列次序上看，界线是很清楚的，没有以此入彼的混乱。

在《隋志》以前，晋·荀勖编《中经新簿》，那时类书方诞生不久，尚只有始祖《皇览》一部。但是，这唯一的份量巨大、性质特殊的书籍已引起了注意。据《隋志·序》说：“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三曰景部，按，“景部”即“丙部”，因唐高祖之父名昞避讳改；又，其时史部为丙部，子部为乙部，及东晋著作郎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于是史部居乙，子部居丙。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样，荀《簿》是以《皇览》入史部。但“皇览簿”只能有孤零零的一部书，何以与“史记”、“旧事”等并列一类是一疑问；其何以在史部，是又一疑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举《中经新簿》有不可解者三，其一是：“《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页72）。所以，《隋志》对此作了处置，

^① 撰《书目答问笺补》的江人度曾上书于张之洞论目录学的配隶问题，其间对此亦提出了意见，他说：“《隋志》以类书入子部。考诸子之学，儒、墨未碍于并立，名、法亦有所取材，宗旨各殊，不嫌偏宕，畦径独辟，别具精深，所谓自成一家言也。类书者，肴饌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祭于枵腹。岂可杂厕丙籍，混迹子家？[原注]中堂原注亦有‘类书实非子’之语。”

将类书移至子部,附在杂家类的后面。

类书独立成类 类书在子部里独辟成为一类,是始于唐开元时毋暉编《古今书录》。《古今书录》已佚,但五代·刘昫《唐书·经籍志》是循《古今书录》辑成的。在《唐书·经籍志》里,丙部子录有十七家,其第十五家为“类事家”。类书于是脱出了杂家类而独自成为一类。

这个变革的重要意义是:(1)认识到类书和杂家书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2)显示类书已更加增加,蔚为大国,既有必要且有可能独自成为一类。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类家的《小叙》说:“前史有杂家,无类书。近代纂述丛杂,乃为别出。要之,杂家出自一人,类书兼总诸籍,自不容濶也。”大体上说出了这两项重要意义。

这个变革的重要影响是:类书从此独占一类,不为附庸,已无异议。由《新唐书·艺文志》以下,到清乾隆中的《四库全书总目》,到近、现代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分类目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都是如此:隶之于子部而为独立之一类。只是类的名称异于《唐书·经籍志》:《新唐志》称“类书类”,《宋史·艺文志》称“类事类”,《国史经籍志》称“类家”,《中国丛书综录》称“典故类”,而以“类书”夷为属名;然绝大多数是照《新唐志》称“类书类”,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主张类书由类升部 南宋初年,莆田郑樵撰《通志·艺文略》,他的分类法打破了“四部法”,以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于是类书类不为诸子类的隶属,而与诸子类相并,意味着类书类升级为部级。其后,南宋端平中,樵之族孙郑寅“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见《直斋书录解

题》五十六卷本卷 25、二十二卷本卷 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称寅所立七类“在分类学中，颇近合理。……类书包含一切，更不宜屈居子末。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
页 114。

明正德时陆深撰《江东藏书目》，嘉靖中晁琛、孙楼各撰《宝文堂书目》和《博雅堂藏书目录》，万历中张萱撰《内阁书目》，清嘉庆时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等，都把类书和诸子并列，处于抗衡而非从属的地位。

这样做法，都是发见了类书的内容是包举四部的百科全书性质，因而觉得它们不应当隶属于四部中之一部。明嘉靖时胡应麟、万历时祁承燾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明确的意见提出：

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贗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

夫类书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岂以包宇宙而罗万有乎？然而类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经之原委，纤备详明，是类而经者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郑氏《通志》，历朝令甲，古今故典，实在于此，是类而史者也；又如《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余谓宜另附四部之后。（《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鉴书》）

事实上，不仅这一或那一类书近经、近史、近集，而是这些类书每种都包罗万有、赅括四部。故议以类书自居一部，与四部相并，是有理由的。不过在历来古典目录学的实际使用上，还是类书类隶子部的占优势。这个事实情况，是应当照顾的；可是在理论上，我们

也应当支持类书自居一部的主张，因为这个理论能够更彰明地揭示类书的性质。

《四库全书总目》虽仍旧贯而把类书类放在子部里，但它也明确类书实非四部的任何一部所可收容的，它在类书类的《小叙》中是有所交代的：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

但是它说胡应麟“始议改入集部”，是错误的。胡是主张独立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而实行独立为一部者，也早已有之。《四库》是惮于改变，知而不能行，才仍旧贯罢了。

（二）类书的起源和远源

明确了是怎样一种性质的书称为类书，才好确定类书的起源是什么书。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另外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它们的形式是区分门类的。“类书”的名称，本是由此得来。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系辞传》语；“事类相从，聚之义也”皇甫谧《甲乙经·序》语者是。

区分门类是为了便于查检，便于按图索骥。后来发明了临事求检的更便捷的编排方式，就是采用“字典式的”依韵编录的方法。这种类书，已消失了分类的形式，但是不因此而影响到它们的百科性质和资料汇辑的实质，并且依韵编录也是由便于查检的分类方式衍生的、发展的，所以这种没有分类形式的类书仍然是类书。

《皇览》是类书的始祖 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到黄初三年间

[220—222]召集群儒编成了一部在当时书籍体制上是完全新型的书——《皇览》。这书的性质和形式完全符合于上述的条款，所以它是古类书的始祖。宋·王应麟《玉海》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玉海》卷54《承诏撰述》和《类书》篇；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说：“流览贵乎博，患其不精；强记贵乎要，患其不备；古昔所专，必凭简策，综贯群典，约为成书，此类家所由起也；自魏《皇览》而下，莫不代集儒硕，开局编摩；乃私家所成，亦复猥众；大都包络今古，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韩愈氏所称‘钩玄提要’者，其谓斯乎！”《国史经籍志》卷4下·类家·小序。这些说法都是对的。

由于《皇览》到赵宋时代已亡佚，学者不及见，乃以为类书起于齐、梁间，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14《同姓名录》条下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徵栗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袁州本卷3下《同姓名录》的解题里没有这几句话，或者是发现不对而删去了。这个把创始时间推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杂家乃类书托始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把类书的开端推得早早的，认为战国季年的杂家著作，即类书之所托始。倡其说者为清代中期的学者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①说：

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

接着，以辑佚名家的历城马国翰推广此意，也在其《玉函山房文集》卷3的《〈锱珠囊〉序》中说：

^① 题下原注云：“代毕尚书作。”即代毕沅作的。但《吕氏春秋新校正》前面的毕氏自序，并不是这一篇，不过确实吸收了汪中的许多看法写在里面，可信是以汪文为蓝本而改写的。然而汪氏那句大胆设想的“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的话，毕氏并没有敢采用。

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书,《当染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而取黄帝、老子、文子、子华子之说,不一而足。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此·类·书·之·最·先·者·也。

《淮南鸿烈》实仿《吕览》为之,书中采文子语几尽;其它大抵皆有所本。刘向《洪范五行传记》及《新序》、《说苑》,率取古说,分类条列,皆类书也。

乃《唐书·艺文志》别列类书一目,托始于何承天、徐爰并合之《皇览》。考《魏志·刘劭传》:“黄初中,受诏集群书,号《皇览》。”岂《志》以《吕览》、《淮南》及中垒之书所征引不可复见,而据《魏志》为断欤?

马氏在辑佚实践中与类书的交道打得透熟,所以这些是他的深刻体会之语。当然也应看到,诸子各有其宗旨,纵使为杂家言,“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依然有其中心,如《吕览》之宗于儒,《淮南》之归于道;并且绝不是专以资料为标榜。因此,与“肴饌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祭于枵腹”的类书毕竟有别。故视杂家言的《吕览》为类书的“远源”则可^①,竟谓类书始于《吕览》则不可。这也就是“杂家”和“类书”之间的一条分界线。当然,它们之间有通气孔,故古典目录学的著录中,开始时是把类书附列于杂家类中——为何不列于它类而要置于杂家,便是一个可以玩味的问题。明乎此,一些古籍间的脉络、关节,可以“思过半”了。

《尔雅》为分类书籍之所昉 由于类书是明标类目,分别部居的,所以也要追溯分类书籍的起源。今人张舜徽反对马国翰的说法,而以为《尔雅》应是类书之所起。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15

^① 这也好象有的学者认为《管子》和大、小戴《礼记》是“丛书”的远源一样。但真要指出“丛书”的始祖,还是要举《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

中说：

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夫诸子百家，以立言为宗，例多援据旧语，以明欲宣之义。“《诗》云”、“《书》曰”，见之《论语》、《孟子》者，亦已多矣，安得悉谓为类书耶？

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此说有其“类书远源论”的一部分道理，而驳议为未当。因马国翰不说“一切诸子”的“援据旧语”，而是说兼综诸家的“杂家”援据旧语。本来嘛，杂家之兼综，类书之集裘，就是构成了它们的血缘关系。至于类书的分类形式，应推源于《尔雅》，则也是类书的“远源”之一。然就性质来说，《尔雅》为文字训诂之书；类书虽亦收录字书，但毕竟不能把类书作为字书来看待。

所以，推类书的远源，可以及于分类标目的《尔雅》和兼综众家的《吕览》，而不能视《尔雅》、《吕览》即为类书。类书之起，自要到曹魏初年《皇览》问世后才有此一体。至于把类书出现的时间降至齐、梁，则又为数典忘祖。

（三）类书的范围和各种类型

我们现在所说的“类书”，就是指这种兼“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正宗的“类书”，也就是这种性质的古籍。类书的始祖《皇览》完全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它是正宗的类书，也是标准的类书。因为作为“类书”这一体裁的书是取此做衡量的标准的。但是，在古今的古典文献著录中，“类书”一类的包容范围却不一律，当然，正宗的类书一定照收在内，可是其它门类的书籍也往往阑入，象姓氏书、政书，有时甚至是考证笔记、目录书都会列在类书类里。这些，我们就不能认它们为是类书，至少有些不是正宗的类书。而正宗的类书，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也确是各有不同的类型。

现在把这些情况概述如下：

大范围里的所谓类书 (1) 姓氏书。《郡斋读书志》将一部分姓氏书如《同姓名录》、《古人姓字相同录》等列入人类书类，理由是它们是“徵事”的性质。《四库全书总目》则将所有的姓氏书都放在类书类里。其理由则是：“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姓氏书被作为“专考一事”的书来归入，其它专考一事的书自亦阑入，如专记花卉草木的《全芳备祖》，以及《花木鸟兽集类》等书都入人类书类。但主要的是因为《四库总目》的史部里没有谱牒类或姓氏书类，所以所有的姓氏书都纳入了类书类。

(2) 政书。《通典》、《会要》这类政书，在古典目录书里没有史部中设专类时，是放在类书类里，与正宗类书等同看待的。原因是它们也是分类辑集史料的。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是如此安置。但这些书是以国政、朝章为重心，形式虽有分类，这亦和某些字书之形式为分类相同，不能就视为类书。《四库总目》在史部中设政书一类，下分六属，而以第一属通制之属容纳《通典》、《会要》诸书，这种措施是比较好的。

(3) 职官书。历来目录学书，史部有职官一类。然职官之书，在著录中亦有阑入人类书类者，如《郡斋志》以《职林》、《四库总目》以《职官分纪》等书入人类书类。

(4) 纪事本末。《郡斋志》将《太平治迹统类》、《中兴治迹统类》等书列入人类书类，其实它们是纪事本末体的史书。

(5) 书钞体书。我国有一种书钞体书，摘录群书以成编。其异于类书者，是类书须依类归纳资料，而书钞体书则没有这一道重要的“工序”，只是摘钞完一书，再摘钞一书，仍按一种书、一种书排列。如唐·马总的《意林》、宋·曾慥的《类说》都是。《四库总目》是将这一类书置在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的。《中国丛书综录·

子目分类目录》以正宗类书为基础而立“典故”一类,则把这种书钞体书收于典故类·杂纂之属·纂言一目。

(6) 考证性笔记。明末祁承燾的《澹生堂藏书目》,类家类分三属,为“会辑”、“纂略”及“丛笔”。会辑为一般的正宗类书,纂略为《事类赋》、《小学紺珠》等。其第三属“丛笔”,是把一些考证性的笔记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都作为类书收进去。

(7) 目录书。清嘉庆间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类书类亦分三属,为“事类”、“姓类”及“书目”。事类即正宗的类书,姓类便是姓氏书,而把目录书也置在类书类里,这是很奇怪的。大概因为书目是分类的缘故。然而这样来理解类书,就把类书的性质和界线完全搞混了。

正宗类书的类型 正宗的类书,分析起来也有许多类型的。

(1) 就内容性质来说,有一般性的类书,有专业性的类书。前者是包综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的,如《皇览》、《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是。后者则只是一方面的,如《册府元龟》为政事历史的专业类书,《格致镜原》为科学技术的专业类书。

(2) 按编录的体裁来说,有徵事的,有徵事兼采诗文的,有词藻的,有编成韵语的,有重视图表的,更有综合数种的。徵事的体裁是一般的,也是类书的最早形式,《皇览》大抵是这样,现存最早的类书《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肯定是这样。徵事兼采诗文者如唐之《艺文类聚》,宋之《事文类聚》。词藻的如《编珠》、《佩文韵府》,目的在提供诗文的词藻材料。编成韵语的如《蒙求》、《幼学故事琼林》等,目的在帮助童蒙记忆。重视图表的如《帝王经世图谱》、《图书编》。其综合的,如《初学记》综合第二与第三两种,《古今图书集成》综合第二与第五两种。

(3) 按编录的方法来说,有分类的,有韵编的,有以数目字来编录的。分类的是一般的形式,也是类书的主要形式,从《皇览》以

下,大多数是采取分类编录的方式。韵编的如《韵府群玉》、《永乐大典》、《佩文韵府》等,较分类的更便于寻检到所需的主题材料,但也有不能把有关的主题材料“类聚”在一起的缺点。以数目字来编录的类书,专以数字为纲,聚集事实,如《小学紺珠》、《读书纪数略》是;在分类编纂的词藻类书中,清代官修的《骈字类编》包含着“数目”一门,却是以数字为纲,好象吸收了《小学紺珠》一类的书在里面的。

(4) 按编纂的情况来说,有官修的,有文人学者自己编的,有书坊编辑的。第一种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第二种如《北堂书钞》、《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第三种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林广记》等。最后一种,是要到刻版盛行、书肆林立的南宋时代才开始有的。

(5) 从编纂当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料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第一种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第二种如《白氏六帖事类集》、《海录碎事》等,第三种如《群书会元截江网》、《玉海》等,第四种如《兔园策府》、《初学记》等,第五种如《万用正宗不求人》、《文林聚宝万卷星罗》等。最后一种,类似现代的“日用手册”或“日用百科全书”。

类书的属别 在古典目录学的著录中,对于类书类,有许多是不再详分属别的,如两《唐书》的《经籍》、《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是。有的却再细分属别,如《澹生堂藏书目》和《孙氏祠堂书目》,在前面一段里我们已提及。这是因为,类书类的范围既有不同的看法,正宗类书的本身也有不同类型,因此自然会产生进一步细分属别的要求。除祁、孙二目外,还有1935年编撰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卷30子部·类书类有以下的分属:

类编之属一：通录 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

类编之属二：专录 如《子史精华》

韵编之属： 如《韵府群玉》、《永乐大典》

字编之属： 如《骈字类编》

专编之属： 如《姓解》、《职官分纪》、《帝王经世图谱》、《小学紺珠》、《稽瑞》、《格致镜原》

1961年编撰的《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子部·典故类有以下的分属：

杂纂之属	{	纂言	《群书治要》
		纂事	《玉芝堂谈荟》
		纂物	《博物志》
类书之属	{	汇考	《北堂书钞》
		摘锦	《佩文韵府》

类书专题书目 前燕京大学图书馆曾将其馆藏的类书编一附有提要的专题书目，名曰《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在1935年4月出版。著录类书三百十六种，内有附录三十七种。每种纪录书名、卷数、著者姓名、版本、册数函数、前后序跋及作序年代、简单的提要，最后附门类卷目其以韵编排，或有细目而无总门类者，则付阙如。目录以外，附有《原分门类各书引得》，系将该目录中各类书的类目分别排列而成，以省学者翻检之劳。凡欲寻觅某项材料，如“屯田”，则各种类书所有的屯田类目，都可一检而得，知其在某类书某卷有之：

屯田《白氏六帖事类集》16

——《图书集成·戎政典》241—248

——《古今疏》12

——《策府统宗》47

——《历代制度详说》10

——《考古类编》11

- 《群书备考》6
- 《源流至论续》1
- 《博物典汇》15

屯田水利 《古今好议论》10

屯田篇 《治平全书》5

- 《广治平略》13

屯田考 《经济类考》下

屯田类 《策学渊萃》37

屯漕 《清稗类钞》册4

《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编·类书之部》所收的类书既是很多,就越加有再详细分属的需要,因此,它按“十进分类法”,将类事之书,也分为十门;每门之下,复按书之多寡,内容、体例之同异,另分系属。兹将门目、属目并各举所收书例,列表如下:

类事门	{	残阙类书之属	《编珠》	
		一般类书之属	《北堂书钞》	
典故门	{	文篇	诗赋之属	《事类赋》
			书翰应酬之属	《书敍指南》
			杂考之属	《策府统宗》
	{	文句	群书典故之属	《海录碎事》
			以韵检者	《佩文韵府》
			以数检者	《小学紺珠》
博物门	{	广记	一般博物之属	《格致镜原》
			事物原始之属	《事物纪原》
	{	专记	时序之属	《岁华纪丽》
			杂项	《方輿类聚》
典制门	{	政典之属(互见政书)	《通典》	
		政论之属	《治平全书》	

姓名门 (互见谱牒)	{	同姓名之属	《同姓名录》
		小名别号之属	《实宾录》
		氏族考证之属	《元和姓纂》
		史姓人名之属	《万姓统谱》
稗编门(互见小说)			《太平广记》
同异门			《古事比》
鉴戒门			《类林杂说》
蒙求门			《幼学琼林》
常识门			《万宝全书》

这是我国类书目录分列门属最详细、复杂的一个，然未必是最妥适的一个。它所以搞得那么复杂，原因之一是把古典目录书中大范围类书的种种对象大都包举了进去，例如，既容纳了姓氏书，又容纳了政书。当然，它仍不失为一个有参考价值的类书专题书目。

第二章

类书的作用、反作用和特殊作用

(一) 类书的本来作用及其流弊

封建王朝大规模地编辑类书，首先意在夸耀王朝的“文治之盛”，以及某些帝王企图借此以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但也考虑到成品的实际作用，这就是为了：(1)考事征引，有临事取索的方便；(2)帝王自己及皇族借以熟悉封建文化的全部知识，也供给封建士大夫熟悉这些东西，《艺文类聚·序》所说“欲使家富隋珠，人怀荆玉”者是；(3)唐代以下，统治集团通过科举的形式选拔为本阶层服务的后备力量，需要为士人及官僚供给应试准备所需的资料……。

封建文人学者自己编辑的类书，则是为了准备资料、积聚资料，以备撰写文章、临事应对的需要，主要是在于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类书，不问其原来编辑的动机如何，在效用上一律都曾适用于制举的需要。

书坊编辑的类书，是为了方便士人们查检资料和应试的需要，但也编出了一部分适应民间日用需要的常识性的类书，而总的加上一个书贾贸利的目的。

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类家《小叙》说：“韩愈氏所称‘钩玄提要’者，其谓斯乎！盖施之文为通儒，厝于事为达政，其为益亦甚巨已！”大体上是概括了类书的本来作用。

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说 这个说法，是由南宋的当代史家王明清字仲言记述朱敦儒字希真之言而起。王著《挥麈后录》卷

1 说:

朱希真先生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咸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廩禄贍给，以役其心。”

朱敦儒的话，与事实有出入。南宋另一当代史家李心传已驳其误。李著《旧闻证误》卷1说：

按《会要》，太平兴国二年[977]，命学士李明远[昉]、扈日用[蒙]偕诸儒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广记》五百卷。明年，《广记》成；八年[983]，《御览》成。九年[984]，又命三公及诸儒修《文苑英华》一千卷^①，雍熙三年[986]成，与修者乃李文恭穆、杨文安徽之、杨枢副砺、贾参政黄中、李参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赵舍人邻几，皆名臣也。杨文安虽贯浦城，然耻事伪廷，举后周进士第。江南旧臣之与选者，特汤光祿[悦]、张师黯[洎]、徐鼎臣[铉]、杜文周[镐]、吴正仪[淑]等数人。其后汤、徐并直学士院，张参知政事，杜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吴知制诰，皆一时文人。此谓“多老于文字之间”者，误也。当修《御览》、《广记》时，李重光[煜]尚亡恙。今谓“因降王死而出怨言”，误矣。《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1005]王文穆[钦若]、杨文公[亿]奉诏修，朱说甚误。

李氏所驳议者是，但朱说不脛而走，至1933年邓嗣禹撰《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序》时，犹信其说。1934年12月，聂崇岐撰《太平御览引得·序》，乃复议之云聂似未见李说，其引朱说亦误为王说：

稽之史籍，王氏之说，实有两种错误：

一、《册府元龟》非太宗时所修，故或以为系《太平御览》之误。

二、《御览》及《广记》同时开始，其时吴越·钱俶尚未纳土，

^① 《文苑英华》开始修撰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御览》尚未结束之时，李说亦误。

北汉·刘继元亦未归降。所谓“诸降王”者，仅后蜀·孟昶、南汉·刘鋹、南唐·李煜等三人。昶卒于乾德三年[965]六月，事在太祖朝，与太宗无关。鋹卒于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已在下诏修书之后，且其遗臣亦无侧身于馆阁者，与王氏所云“因降王死而用群臣修书”之言全不相符。煜之卒，当时曾有不得善终之谣；而被命入馆修书诸人，若汤悦、徐铉、张洎、吴淑、舒雅、吕文仲、王克贞等又皆煜之故吏，是或即王氏记述之所指。然煜卒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已在《广记》将成之际^①，并不在修书之前；而汤悦诸人归宋入仕，又多在太祖朝，不必待太宗即位再事拢络；且若张洎之徒，于仕宋之后，对李煜非但无故主之情，且时丐索不已，背恩负义，寡廉鲜耻，能有官有钱，即不再思它事，更何必另因翰墨之任以安其心乎！愚意以为太宗之敕修群书，不过为点缀升平，欲获“右文令主”之名。其用南唐遗臣，亦仅以其文学优赡，初不必有若何深意。王氏之言，讹谬抵牾，不足信也。

聂氏的考证，可以说是彻底击溃了王氏所记朱说。但是没有考虑到，宋太宗赵光义确有“惭德”的问题，他的帝王位置是从他哥哥太祖赵匡胤手中夺得的，且有杀兄的嫌疑——所谓“烛影斧声”者是^②。当时他必须安定人心，首先是须安定太祖旧臣之心。用这点来窥测太宗广修类书的心理及其政治作用，则李、聂所举抵牾之点皆可通；朱敦儒的说法诚有错误——不应当联系到“诸降王死”的问题上去，而他的说法的基本精神是应该认为有所根据的。

封建帝王的这种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做法，不只宋太宗为然，明成祖朱棣的诏修《永乐大典》，据明代中期的学者李日华据

^① 《太平广记》成于太平兴国三年八月。

^②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104《读〈太平御览〉三书》：“宋初辑三大类书，有功于载籍者不鲜也。……余每薄太宗之凉德，至读三书，则斧声烛影之疑，辄姑举而置之。”

所闻以揭穿的，也是使用相同的手段。李著《紫桃轩又缀》卷2说：

《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湖广王洪编纂。号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余年而就，亦所以耗磨逊国诸儒不平之气。

因此，封建王朝诏修的大类书，是有些具有这种意图和作用的。当然，并非每一类书如此。

临事取给用便检索 这是类书编撰的最主要的作用，动机在此，效果亦如此。当封建制度高度集中以后，王朝的政事涉及各个方面，襄政者非但需要干练明达，也必需熟谙各种典故，骤遇问题，必需立即能答。所以王朝的执政、侍从之臣，总是要求博学强记之士^①。但任何博学者，也不能把所有的资料都记在脑袋中，随口答出所有的任何突然而来的难题。因此必需准备好临事检索的资料工具书，遇事可迅速检得呈复。王朝为此目的而辑类书，文人学者亦为此目的而自辑类书备用。唐·刘餗的《隋唐嘉话》记载说：

〔唐〕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

“行秘书”就是现在口语中的“两脚书橱”。虞世南诚然极博（太宗称他的“五德”之一），可是随从时未必不带书，但他所带的书只须极少而比有司所载的很多能够抵用。虞世南有他的秘本——在隋秘书省时即辑成的类书《北堂书钞》。他的类书，既有选择，又经分类。有司们茫无头绪，杂携许多原书，顾此失彼，且临事无术迅速索检。因此，虞世南的“行秘书”，定与他的“枕中鸿宝”有关；而他的所以能博闻强记，亦未始不因他的勤钞类书有

^① 举二事为例：(1)《道山清话》说：“陈彭年以博学强记受知定陵〔宋真宗〕。上问墨智、墨允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齐也。’上问：‘见何书？’曰：‘《春秋少阳》。’即令秘阁取此书至。彭年令于第几版检寻，果得之。上极喜，自是注意，未几执政。”(2)宋·张舜民《画墁录》：“神庙博涉多闻，每发疑难，出人意表，讲官每以进讲为难。苏子由〔辙〕以手扞腹曰：‘吾每进讲，未尝不汗出也。’”（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注云：“按，子由终神宗之世，未为京朝官，似无进讲事。疑是苏子容〔颂〕之误。”）

以助成。类书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予人以“书精”之感。因此，北宋·秦观字少游，淮海人因自己年长后，记性稍拙，集古书、古语之精华为一册，曰《精骑集》，以备采用。见《淮海后集》卷6《精骑集·序》。又，南宋·吕祖谦所辑的《历代制度详说》，当时亦称为《精骑集》。其意就是“以一敌百”。

《〈重广会史〉解题》曾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遇事徵典苟得类书之助，则胜多年读书摸索之功。它首先引用清·阎若璩《潜丘札记》卷2的一段故事说：

按忆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庵〔健学〕寓邸。夜饮言：“今日某直起居注，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既思不可得，又不敢上问，奈何？”余对：“丙午、丁未〔康熙五至六年，1666-7〕间，重策论，读宋·陈傅良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发挥，应是昔人论此事者作此语，第不见出何书耳。”公曰：“博！”

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谓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八百破开州蛮冉肇则，俘禽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谓即出此。

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太子贤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处。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

《解题》说：“可是在《重广会史》卷第41《使功不如使过第五》的题下，《后汉书》《索卢放传》、《窦宪传》、《前汉书》《朱博传》、《张敞传》、《王嘉传》、《三国志·魏志》《高柔传》、《新唐书》《李靖传》、《郑从谏传》一一援引列载。夫以阎若璩之赅博，积二十年读书之功，方始得其据典。而数百年前之类书，已具其本末如此。”若使当年阎、徐查阅《重广会史》，则不但出典一索即得，还能将有关的事类

一网打尽。关于后者，阎若璩虽历二十年而未尽得之。阎氏说：“学问无穷，人不可以无年。”这话是很对的。但是，可以用些方法来缩短寻觅资料的时间，利用类书就是一种方法。类书的作用即在于此。

储材待用备文章之助 类书储材待用，一方面是备仓卒应对之需，一方面也是为撰文、作诗资料之需。封建时代的诗、文，大多是需要堆砌典故。临事得题，不得不乞灵于类书，而平日不得不有所豫备。虞世南之为《书钞》，当然主要是为此。白居易作《六帖》、元稹作《类集》、晏殊作《类要》、秦观作《精骑集》，等等，无非都是如此。封建政府的编纂类书，乃至书坊的辑录类书，也是提供给文人以这种方便。

宋·傅自得序叶廷珪所纂《海录碎事》，即明白叙说这种作用云：

予尝得见侯所谓《海录》者，几十数大册，皆亲书蝇头，细字惟谨，盖无虑十余万事，大抵皆诗才也。侯因自言，游宦四十余年，未尝一日不作诗，食以饴口，怠以饴神，此书之力为多。其博与专乃如此，以是其诗老而益工。

由于封建时代的诗文，多数是赖“獭祭”^①而成，于是后世注解诗文者，寻绎出典，亦必需乞助于类书。这是类书的又一种作用。

流弊 有了类书，对于作文、注书，委实方便。但是学人从此不读原书、不究本源，流弊就无穷。《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叙》说：“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就概括了只知利用类书的坏处。这个问题，南宋·朱熹已提出，他在《答吕伯恭祖谦书》里，针对吕所辑类书《历代制度详

^① “獭祭”本出于《礼记·月令》：“獭祭鱼。”谓獭捕鱼而陈之，如陈物而祭。《杨文公谈苑》：“旧说，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堆积，时号‘獭祭鱼’。”（曾慥《类说》卷53引）后人因以抄撮故实而成文者为“獭祭”。

说》云：

学者用功不实之弊，诚如来诲。近见建阳印一小册，名《精骑集》，云出于贤者之手，不知是否？此·书·流·传·，·恐·误·后·生·辈·，·读·书·愈·不·成·片·段·也·。

类书与“堆砌成章”的诗歌之间的关系，闻一多浠水人，(1899—1946)在《唐诗杂论》的《类书与诗》一文中阐述得极清楚。他提出“类书家‘采事而忘意’”和“‘类书式’的诗”两个问题，正是切中类书在文学上所造成的坏影响，当然这也正因当时文学上有这种在词藻里兜圈子的要求，才促使词藻性类书的发展，转而推澜助波。闻一多的说法，摘录如下：

章句家是书麓，类书家也是书麓。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著格外分明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
——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麓”，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地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是“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

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史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是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

讲到这里，我们许要想到时人批判李善“释事而忘意”，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两句话。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

这类“用事而忘意”的诗，也不仅是初唐为然，流毒所中甚远。象前面提到的叶廷珪，他的类书《海录碎事》是有名的，但他的诗是没有人称道的，尽管他为诗四十余年，傅自得谀其作品为“老而益工”，都没有用处，因为他的诗就只是词藻的堆砌、头脚的装配。

（二）类书的第一特殊作用

作为“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编纂出来是为当时之用的。时过境迁，便成刍狗。即使同在封建社会时代，新的类书编成，旧的类书用途便也减少。但是，由于古类书兼有“资料汇编”的特质，所以它们贻留到后世乃至今天，还能在学术研究工作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完全不是以其原来的用途而发生作用，而是以其始料所不及的用途而产生着作用。这就是现在要说明的类书的“特殊

作用”。

第一特殊作用是古类书可以用来校勘古籍和辑录已佚的古籍遗文。《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叙》所说“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玃断璧，至摭拾不穷”者是。清代乾、嘉考证学者在这个用途上利用类书所得体会最深，因此他们更加强调类书的这一作用，例如孙星衍在《孙忠愍侯祠堂藏书记》里对类书类·事类之属的概括说：“古书亡佚，独赖唐、宋人采录，存其十五，非独獭祭词章，实亦羽仪经、史。”《五松园文稿》卷一。光绪时学者周星诒在其所藏明·安国刊本《初学记》后题跋说：“《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御览》及此，古经、史、子、集今不传者，于四书可得十三、四，学者必读之书也。予行篋书悉归蒋氏按，谓蒋凤藻，独影钞明写《书钞》、校宋《类聚》、鲍刻《御览》及此在，盖炳烛之志，不与年迈也。”见罗振常辑《善本书所见录》卷3。这亦可见其十分重视古类书的价值，摩挲披览，迄老不倦的情况。虽然，他们所说还是不全面。第一，古类书不仅能用以辑佚书，还经常被用来校订现存的古籍。第二，古类书也不仅是唐、宋编者多存先秦、两汉、六朝遗文，其后编纂的也同样多存唐、宋以下的逸书。清代乾隆季年以后掀起的一股辑录先秦、两汉、六朝佚书遗文的高潮，本来就是受了乾隆中期官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里大事辑录宋、元人佚书运动并收得了良好效果的影响。

古类书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是和它编纂上的传统特征和优点分不开的。古类书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而在辑录资料时，绝大多数是引用原材料，并且标明出处。引用时虽也不免有删节，或有个别的改动，但一般来讲，总是忠实于原文的。类书的始祖《皇览》，本身也是被辑佚辑出来的，其编纂上的面貌，不能详知。然从现存最早的类书即自敦煌发见的《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看，上述的这个特征与优点，即已完全存在。后来修辑的类书，萧

规曹随，大抵是奉行弗失的。

古类书编纂时，依据其当时所有的书籍和文献，加以引用、编辑。降至后世，大部分原资料失传；一部分虽还存在，但夹带着不断地经过传写、刻印和其它有意识窜乱所造成的无数的脱误和混乱。于是，古类书以其特殊的功能而为校勘、辑佚学者所运用，就在校理古籍的存真、存佚的要求中大大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古类书在清代考订学者心目中有“存一书即存众书”的印象。阮元序《仿宋刻〈太平御览〉》说：“存《御览》一书，即存秦、汉以来佚书千余种矣。”而周星诒垂老藏书转移时，独欲保留几种善本的古类书，其意亦正为此。

辑录佚书 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所遗留下来的古籍很多，但历来保存不善，兵火洊多，散失的情况也极其严重。古籍之确实存在的，在比数上就显得很少。历代有些学者，因发见古类书、选本以及四部书的旧注中引用了不少已佚古籍的片段，特别是古类书中更为渊薮，若加以辑录（从工作方法上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变换装置”的手段，类书本身是以逐个部类来辑录，辑佚书则是以逐个书来辑录），尽可能的拼凑起来，便能回复不少已失去的古籍，就利用这种引书众多的书籍来做辑佚的工作。逐渐发展，到了清代，就成为学者的一种专门之业，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南宋的洪迈，已经看到这一点。他在《容斋五笔》卷7里说：

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卷首，而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

洪迈当然也说错一些，如他以为北宋初年编《太平御览》时，所引用的诸书当时都具存，而不了解它是以前代类书《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为蓝本，有些古籍并非北宋初年尚存，而是

从前代类书转录的。但不管是《太平御览》的转录，前代类书的辑录，总之是，洪迈已看到在他的时代有很多已无传本的古书可得其片段于《太平御览》这些类书里。

辑录佚书的实践，在北宋季年已开始。黄伯思在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秋天所看到的《相鹤经》，便是一个辑集本，不过它是从马总《意林》和李善注鲍照《舞鹤赋》辑出见《东观馀论》卷下《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而不是利用类书的。南宋末年，王应麟辑录汉·郑玄的《周易注》和齐、鲁、韩三家诗成《周易郑康成注》及《诗考》各一卷，大部分还是利用经疏和《经典释文》等，但已开始用到类书。

明隆庆、万历间学者胡应麟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并且有所实践。他说：

姚叔祥(士粦)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乎？”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御览》、《艺文》、《初学》、《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匮、幽岩土窟掘得耶！”大抵后出异书，皆此类也。（《甲乙剩言》）

洪景卢(迈)云：“国初承五季乱离……无传者十之七、八矣。”[见前引]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少室山房笔丛》卷4《经籍会通》四）

万历季年学者祁承燦更细致地阐明这个道理，在《澹生堂藏书约》的《藏书训略·鉴书》中说：

书籍与代日增，而亦与代日亡之物也。乃有……名亡而实存者，有得一书而即可概见其余者，有得其所散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如汉人之谈经在训诂，读注、疏而汉之释经可概也。……如《北梦琐言》、《酉阳杂俎》之类，今刊本虽盛行矣，然悉括《太平广记》之所载，更有溢其全帙之外者，此所谓得其所散

见而即可凑合其全文者也。

其时一位年轻的学者吕兆禧生于万历元年，卒于万历十八年（1573—1590），得年仅十八岁。他治考订、校勘之学，已接近清代学者之所为。他批校群书的发明、心得，经其友姚士舜辑为《吕锡侯笔记》，刻于《盐邑志林》中。也重视到古类书的这种特殊作用，他的读书记中有一条说：

刘梅国《广文选》，潘尼《火赋》直十之三，其七见《初学记》；

孙楚《反金人铭》亦遗五十余言，见《太平御览》。

这时候，藉辑佚而编成的书就陆续出来，如辑录古代诗文的《诗纪》冯惟讷辑，一百五十六卷，《文纪》梅鼎祚辑，一百五十八卷，《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张溥辑，一百十八卷，辑录纬书的《古微书》孙穀辑，三十六卷等。近代藏书家乌程蒋汝藻的《传书堂善本书目》卷7子部里著录一部《古今佚书》二百十九卷，注云：“明刻本。卢抱经文弼、周季贶星诒通部手校并跋。”这应是明人一部巨大的辑佚著作，惜不知何人所为。蒋氏此藏未知下落；卢文弼用于此书的勤力，在他的文集中也看不到痕迹。

明人辑佚的通病，是不把出处注明。

清代辑佚之举，蔚成巨业。这一方面是承前代的涓涓细流而来，另一方面还有两大原因。其一是，清代汉学家治经，欲恢复汉儒的原貌，而汉儒经注多已散佚，所以他们的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从辑佚着手，惠栋定字之辑孟、京、干、郑、荀、虞诸家《易》注而为《易汉学》八卷，其弟子余萧客仲林用其师法辑《古经解钩沉》三十卷，宗旨均在于此。另一是，乾隆中官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历代佚书特别是宋、元两代的佚书三百八十八种^①，大大地丰富了当时的书囊，给予辑佚工作者一大刺激。

^① 四库全书馆从《永乐大典》辑出佚书的数字，有几种不同的。这里的数字，是根据孙毓修《〈永乐大典〉录出书考》（稿本）中经过核对几种数字后确定下来的统计。除了这三百八十八种外，还有列入《四库存目》的一百二十七种，共达五百十五种。

乾隆季年以后，大规模地从古类书和其它引书丰富的古籍中搜辑先秦、两汉、六朝佚书的高潮就掀起。如金溪王谟辑有《汉魏遗书钞》一百零五种嘉庆三年[1798]王氏刊本和《汉魏地理书钞》七十种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王氏刊本为五十种，1961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本在刊本外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的钞本补了二十种。临海洪颐煊辑有《经典集林》三十种嘉庆中《问经堂丛书》本，但传世的《问经堂丛书》中，几乎都没有《经典集林》，1926年陈乃乾得之而以影印，《经典集林》乃传于世。会稽章宗源字逢之肆力辑佚，所录书“满十余笈”，其《隋书经籍志考证》史部一稿，即在他自己辑录佚书的基础上写成。孙星衍《古史考·序》说：“逢之辑书，满十馀笈，欲售之毕督部（沅），会楚中有兵事而止，卒于嘉庆某年，遗书遂为叶君继雯所得。”乌程严可均字景文，号铁桥亦广辑佚书，据其《答徐星伯松同年书》说：“可均四十余年来，所撰辑再等身，大率皆千数百年前之古人之心血寄存者，搜拾丛残而联比之、整齐之，为《四录堂类集》千二百余卷。”《铁桥漫稿》卷3在这一千二百五十一卷之中，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道光十四年[1834]完稿，光绪十九年[1893]刻于广州，1958年中华书局影印最为巨擘。到道光时，甘泉黄奭字右原和历城马国翰字竹吾南北对峙，大事辑集汉、魏经说、古史和诸子。黄氏的《汉学堂丛书》，所辑佚书二百七十种道光中黄氏刊本；1925年王鉴以原版修补印本，易名为《黄氏逸书考》，1934年江都朱长圻重印之。马氏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共有六百三十种光绪九年[1883]长沙蟾嬛馆刊本，次年，章丘李氏据马氏刊板重印，同年又有楚南书局印本。下来还有作为清代辑佚后劲的吴县王仁俊字扞郑（1866—1913），所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二百六十九种、《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一百三十八种、《经籍佚文》一百十六种，总计五百二十三种，稿本未刻，存上海图书馆^①。这样也没有把宋以前的古逸书籍辑完，如小说没有经过系统的辑录，故鲁迅周树人，会稽人（1881—1936）有《古小说钩沉》之作，共辑录三十六种1938年印入《鲁迅全集》第

^① 细目见《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页395—400。

8册；武陵余嘉锡字季豫(1883—1955)及其女淑宜合撰《殷芸小说辑证》印入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余嘉锡论学杂著》页280—324。古地志的辑佚工作，王谟也没有做得彻底，蒲圻张国淦字乾若(1876—1959)的《中国古方志考》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便是在广泛的辑佚基础上作的。古佚医书，过去也是个空白点，今人汤溪范行准力事辑集，成《全汉三国六朝唐宋医方》八百卷^①，“上起炎汉，下尽于宋，而金源附焉，大者几复旧第，小者亦存一鳞，汰重去复，得四千余家”《总叙》语；又《元明医学钩沉》若干卷，稿均未刊。^②

宋以后的佚书，也还有很多可辑的。清四库馆利用《永乐大典》并没有净尽。《大典》现在存留的虽然只有全书的百分之三多一点，但还可以辑不少东西^③。从《大典》残卷和其它宋、元类书，故书杂记之中，赵万里辑有《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宋人诗文集校辑》五十七家附唐一家五代一家、《宋集补遗》一百四十九家、《元人诗文集校辑》四十八家附金一家明初三家、《元集补遗》三十九家附明初七家。唐圭璋辑《全宋词》1940年国立编译馆出版；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隋树森辑《全元散曲》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都曾利用元、明、清三朝的类书。朱启钤、刘敦桢从《大典》辑出工程书元·薛景石撰《梓人遗制》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胡道静从《大典》辑出农艺书宋·吴恽撰《种艺必用》和元·张福撰《种艺必用补遗》1963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① 自汉至唐的细目见范行准，《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医方简录》（《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1965）。

② 关于辑佚工作可参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章《辑佚书》节；拙著，《由地志的伏流谈到清人辑佚工作》（《文汇报》1962年6月5日）；拙著，《方志遗产的目录学总结》（《图书馆》1963年第1号）。

③ 参看：王仲华，《渤海一勺——读影印本〈永乐大典〉存卷后记》（《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1963）；拙著，《读影印本〈永乐大典〉记》（《图书馆》1961年第4号）。

校勘古籍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说：“古类书不特所引佚文足资考证，即见存诸书，亦可订正文字异同。”其原因是类书征引古籍，皆用当时或更早之本，若类书的本身版本完善，自可校正流俗专刻的错误、脱落和倒简，而往往为使用其它方法所不能代替者。周星诒跋明·安国刊本《初学记》说：“〔周〕、汉、魏古书，〔 〕中字原阙，以肥填补。自宋南渡来，传本鲜完善，故虽得天水槧〔以正〕误补脱，仅十三、四耳。以一书为专业，竭毕生心力，更佐以□古，必不能者势也。虞、徐、欧、白、《御览》、《册府》诸书，〔群〕书渊源，得一宋本，有益雠校，功等专刻。吾越先辈有收藏多类书者，少闻科第中人讥笑为‘兔园学’，遂亦轻鄙。及三十四、五岁，始大悔悟。”《善本书所见录》卷3。这是周氏浸沉类书、攻校群籍所得的经验之谈，对古类书的第一特殊作用做了很好的说明。

清代校勘之学大兴，校勘学者无不使用古类书，其所得力，往往甚巨。谭献《复堂类稿·日记》卷1说：“《读书杂志》校《大武篇》，补脱最为有功，祇是细考旧类书耳。”《逸周书·大武篇》自“武有六制”起至“后动燃之”三百七十五字，今本文多讹脱，后人因其前后不应，据后以删前，其余以意删改者甚多，遂不可读。诸家皆不能厘正。原本《北堂书钞》武功部一、二、五、六都引有这三百七十五字的片段，高邮王念孙细加籀绎，据以诂正，《大武篇》乃恢复原来面目，厘然可诵。移正之文及其依据并理由，载入《读书杂志》卷1。清代学者利用类书订正古籍文字的误脱极多，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前面已经讲过，章宗源利用古类书辑出不少的佚书，后来他也发见自己还没有能尽古类书之用。孙星衍记他的话说：“今世所存古书版本，多经宋、明人删改。尝恨曩时辑录已佚之书，不录见存诸书，订正异同文字。当补成之。”见《五松园文稿》卷1《章宗源传》。章氏旋即下世，未能补其所悔。后来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处理《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乃兼存、佚而采之。《书目答目补正》说：“古类书……清代严可均、马国翰、黄奭诸人辑佚补亡，大都取材于此。但皆侧重佚文，实犹未尽类书之用。今北京大学用剪辑之法，不论存、佚，悉行录出，并加雠校，其法至善。惜已辑成者，尚未刊也。”

不过类书的本身不能无误，类书的传钞、传刻也有错误。故过分信任类书而不信传本原书，那也要犯偏差。各方面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有所论议：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2：“高邮王氏父子[念孙、引之]之于经，精审无匹。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若《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之类，世无善本；又其书初非为经训而作，事出众手，其来历已不可恃。而以改数千年诸儒断断考定之本，不亦慎乎！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可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

刘文典《三余札记》卷1《类书》条：“清代诸师校勘古籍，多好取证类书，高邮王氏尤甚。然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恃，往往有数书所引文句相同犹未可据以订正者，盖最初一书有误，后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如宋之《太平御览》，实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诸书参详条次修纂而成。若《四民月令》一书，唐人避太宗讳改‘民’为‘人’，《御览》亦竟仍而不改，书名如此，引文可知。故虽隋、唐、宋诸类书引文并同者，亦未可尽恃。讲校勘者，不可不察也。”

又，卷1《淮南子校补》：“《淮南子·原道篇》：‘故桔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鸕鶿不过济，貉渡汶而死。’王念孙云：‘枳本作橙，此后人依《考工记》改之也。《埤雅》引此作化而为枳，则所见本已误。《文选·潘岳为贾谧赠陆机诗》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果部引并作橙。’典案，《考工记》、《埤雅》字并作枳，即枳字不

误之证。此文以枳、济、死为韵，作橙则失其韵矣。”

朱氏虽主墨守，但他的指摘，亦不无是处。刘氏亦从事校勘之学，历校《淮南子》、《吕览》、《论衡》诸子书，也曾广泛利用类书，深味其中利弊，而能够跳出圈外看问题。马叙伦也和刘氏相似，在他的《读书续记》中对类书引文之不可尽恃多举证有所论列。这是校勘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但终不因此而废古类书在校勘工作中的功能。

类书校勘运动 利用类书来校勘古籍和做辑佚工作既开展了，随即带来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两种工作的准确性绝大部分是依赖于古类书本身的完善。若其本身已错谬脱落，又怎能凭之以做好校勘古籍和辑佚的工作呢？例如，王念孙用《北堂书钞》来校《逸周书》，是因为他得到了原本《书钞》的钞本；至于明·陈禹谟刻本的《北堂书钞》，却用流俗错误的《逸周书》去窜改了《书钞》，这个本子的《书钞》在校勘古籍上自然失去价值了。已经佚失的谢承、袁山松诸家《后汉书》之经《书钞》引用者，陈禹谟却又用现存的范曄《后汉书》去换置，于是，这个本子的《书钞》在辑佚上也大大地丧失作用了。由于这种经验教训，自然就引起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要求，即是欲以类书校辑古籍，首先得把类书的本身校好。故一个寻觅古类书善本和校勘古类书的运动，就在考订之学兴盛的清代的后半期掀起。

当然，寻觅古类书善本和校勘古类书的工作，在明末、清初就已开始。如明季文翔凤和黄国琦校勘《册府元龟》，费了不少的气力，也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清初朱彝尊求得题名为《大唐书钞》的原本《北堂书钞》。但真正感到有这样的需要还是起于清代考订之学蓬勃发展、古类书被广泛地运用之后的乾隆末年。这也可以说是“乾嘉考订之学”的乾隆、嘉庆两期的一个分界标识。这时，《四库全书》早已修成，库书所收的重要古类书，工作做得是不够负责的，《北堂书钞》的底本用的是“肆行窜乱，刻书书亡”的陈禹谟本，

《太平御览》用的是“姓名颠舛，世代鲁鱼”的倪炳刻本和铜活字本，对于考订之学是毫无帮助。搜求类书善本和校勘类书的运动，是对库书的补课，也是对库书的无言的批评。

从下面这个年表，可以看出自乾隆季年以来这个运动在自发地推展的情况和收到的成就：

乾隆四十九年[1784] 金坛段玉裁得宋槧《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后来赠给青浦王昶。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吴门黄丕烈得朱彝尊旧藏原本《北堂书钞》。

乾隆末 吴门周锡瓚自同郡朱文游家得宋闽刊《太平御览》残本，又自王昶得宋槧《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

嘉庆初 王昶得宋槧(实系元刻)《初学记》。

嘉庆六年[1801] 兰陵孙星衍得陶宗仪钞原本《北堂书钞》。

嘉庆七年[1802] 孙星衍在金陵五松书屋开馆校《北堂书钞》，先后参加者有王石华、严可均、王引之、钱东垣、洪颐煊、顾广圻等，以严为主力。 钱塘何元锡合宋槧等三本影钞《太平御览》全部。

嘉庆九年[1804] 海虞张海鹏校刊《太平御览》。 黄丕烈自周锡瓚得宋闽槧《太平御览》。

嘉庆十年[1805] 仪征阮元聚友人在杭州雷塘庵依宋本校《太平御览》。 孙星衍撰募启，劝捐拟刊何元锡影钞本《太平御览》。

嘉庆十一年[1806] 孙星衍自王昶借得宋槧《初学记》，严可均据以校明宁寿堂刻本。

嘉庆十二年[1807] 歙县鲍崇城在扬州校刊《太平御览》，以阮元校宋本为底。

嘉庆间 海虞陈揆校《艺文类聚》。庐江胡穰出赏刻严可均校《北堂书钞》。

道光五年[1825] 海虞张金吾得旧钞原本《北堂书钞》。

道光九年[1829] 严可均得明初写原本《北堂书钞》。

道光十八年[1838] 海虞黄廷鉴校《北堂书钞》。

咸丰五年[1855] 日本国喜多村直宽校刊《太平御览》。

光绪七年[1881] 南海孔广陶传录孙、严等校本《北堂书钞》，聚诸子、塾师、友人复校之。

光绪十四年[1888] 孔广陶刻成校本《北堂书钞》。

光绪十五年[1889] 归安姚觐元在苏州用活字摆印原本《北堂书钞》。

光绪间 归安陆心源撰《初学记·校记》八卷，印入《群书校补》。

* * *

1922年 江安傅增湘始据宋本校明槧《册府元龟》，自此历十年之久，校得一百零八卷。

1923年 傅增湘得宋槧《白氏六帖事类集》。

1933年 乌程张芹伯影印傅增湘藏宋槧《白氏六帖事类集》。

1935年 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槧《太平御览》。

* * *

1959年 中华书局影印宋槧《艺文类聚》。

1960年 中华书局重印宋槧《太平御览》；又影印明槧《册府元龟》。

1962年 中华书局出版司义祖校本《初学记》。

1965年 中华书局出版汪绍楹校本《艺文类聚》。

经过这一系列的发展，学者就能逐渐普遍地得到善本和校本的唐、

宋类书来使用。当清代乾隆初年，宋闽刻《太平御览》残本秘藏在吴郡朱文游家，当时的大学者惠栋以馆于朱家之故，独得借阅，藉善本《御览》以进行其辑佚、校勘和汉学研究的工作。黄丕烈后来跋此本《御览》说：“朱与惠征君栋为莫逆交，惠所著述，大半取材是书，故有‘惠定字借观’图记。”说“大半”，不免是夸大，但惠氏的学术研究工作，曾得助于这部善本的重要类书，则为无可置疑。

相反地，当乾隆末年到嘉庆中叶，金溪王谟以僻处腹地，他所从事的辑佚工作，以不能见到善本古类书，率取明刊及钞本资用，使他的工作受到不小的损害。中华书局影印王辑《汉唐地理书钞》的《出版说明》评论说：

他毕生尽力于搜辑考订工作，至老不倦。但正因为他久处闽、赣，与他省学者很少接触，也免不了“孤陋”之病。因此，他在辑佚工作的方式、方法上不及严可均、邵二云诸人的精密。那时候有很多善本书在江、浙一带藏书家手里，依据这些善本书，陈揆正在校《艺文类聚》，严可均正在校《初学记》和《北堂书钞》，鲍崇城正在校《太平御览》，王谟竟不能同他们取得联系，以致在所辑的书中沿袭了一些原本的错误。

不得善本类书而用之，王谟自己也深以此为苦恼。在《太平御览》的遭遇上，王谟与幸运的惠栋是刚巧相反的。他在《汉唐地理书钞·凡例》第九条中说：

《太平御览》书目一千六百九十种，内地理书约三百种，较诸类书尤为赅博。惟此书最为难得。兹所借钞，亦系旧本活字板，错简脱叶，阙文讹字，不可胜数，苦无善本较对。不敢以意补缀，沿谬承讹，在所不免。甚有因而割弃不录者。用是质诸大家，有能出所藏善本相为校正者，功德正非浅鲜。

于此可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重要。而这一磨砺工具的事业，事实上历一百六十多年而未能完成。直要到建国以来，才真

正地在完成它，而且完成得更其精确。今天的研究古代文化的学术工作者，个个都能达到惠栋具有的条件，而且比惠栋更其幸运，因为不只是一种古类书，而是几乎所有的古类书，我们都能够利用善本和校本来进行工作。

（三）类书的第二特殊作用

建国以来，学术文化事业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指导之下，有空前的发展。祖国文化遗产的清理工作，因为遵循毛主席的批判地继承的英明指示办事，同样地得到前所未有的进展：有许多研究课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了完全新的成就，有许多空白点和难攻的堡垒现在都被填补和拿下。当这些工作在进行过程中处于搜集资料的阶段，古类书是经常地被利用而起着作用的。这是因为古类书本来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而它包含的科目又是比较完备的。在研究古代文化的学术工作中，利用它们来对某一专题搜集文献资料，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也免得耗费过多精力。当然，类书上的资料是第二手的，还需要用原始资料来加以核对。但是它们已将一定门目的资料辑集在一处，起着“索引”的作用，比我们自己一开始就直接从散漫无边而又浩若烟海的文献中去寻第一手资料，其效果自大不相同。因此，古类书在今天清理文化遗产工作中的资料搜集阶段起着助手的作用。这样就构成了它的第二特殊作用。

古类书不但把某些专题的文献资料大体上汇集在一起，产生着“索引”的作用，还因为它具有第一特殊作用，即保存了一批原始材料已经失传的东西，因此在古类书中能够看到的某些材料，就已置代了第一手资料，这是更为可贵的。所以在祖国古代文化清理、研究的资料工作中，是不能够离开了类书来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技术委员会在1957年5月15日制订了编著《中国体育史》的工作规划，着手辑集资料，先编《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经过资料发掘，了解到祖国自古以来体育运动就是丰富多采的。1957年11月出版的《参考资料》第一辑，内有《我国古代足球资料汇编》，所有资料，是从《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蹴鞠部录出。

刘仙洲清华大学副校长编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1962年5月科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1963年6月科学出版社出版都曾利用《古今图书集成》的文字资料和绘图。他辑录《中国机械工程史料汇编》，更曾广泛地利用过各种类书。

李俨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前主任(1892—1963)编著《中国古代数学史料》《中国科学史料丛书·古代之部》之一，1954年出版和《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的民间数学》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都从唐、宋类书里辑录出有关数学的资料。

王嘉荫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编著《中国地质史料》1963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广泛地利用了自唐迄清的类书来搜集有关地质现象的纪录资料。

盛诚桂南京农学院教授著《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接木的记载》《生物学通报》1954年4月号、蔡以欣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著《我国历代分枝谷类作物的概况》《生物学通报》1955年6月号王纓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著《古人对棉花特征特性的观察》《生物学通报》1957年12月号等都曾利用了古类书来搜集资料。

例子非常的多，上面只是偶而举一些。

清理文化遗产的逐个部门的普查工作，也是到建国以来才有条件进行。在这项工作中，类书是被“集束地”来利用的。

资料普查 这里举一个利用古类书协助进行文献资料普查工作的典型例子。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委员会认为：“阐明

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优秀传统，端赖大家对于我国民族音乐发展历史作深入的研究，因此研究资料的汇集刊印一事，对继承与发扬民族音乐优秀传统就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故他们在1961年商请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抽出一部分人才，有计划地从事我国古代音乐资料的整理工作。中国音乐研究所首先以将近一年的时间选择了在音乐方面有一定参考价值、在各个历史时期又较有代表性的二十六种古类书的音乐类，把它们汇集起来编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影印，在1962年11月出版。它是将这些古类书中的音乐类，以及一些别的门类中与音乐有关的篇章，选择类书善本，以原书二叶（四面）合一页影印；每页上、下两栏，每栏为原书的一叶；共印成一千二百五十页，装一巨册。入选的二十六种古类书是：

《北堂书钞》 《艺文类聚》 《初学记》 《白氏六帖事类集》
《太平御览》 《事类赋》 《事物纪原集类》 《册府元龟》 《唐
宋白孔六帖》 《海录碎事》 《记纂渊海》 《新编古今事文类
聚》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玉海》 《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
事林广记》 《明本大字应用碎金》 《事物纪原》 《山堂肆考》
《新镌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 《三才图会》
《稗史汇编》 《天中记》 《渊鉴类函》 《子史精华》 《增补万
宝全书》 《新□万宝全书》

有些类书虽有一定代表性，但它所辑音乐方面的资料与以前其它类书重复的，如《唐类函》等；或者所收的音乐资料虽比较全面，甚至还有一些为其它类书所未收，但因卷帙浩繁，如《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等，本辑均暂未收录。

这部《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从利用古类书人手来进行资料普查工作所得的效果，综计有两大点：（1）古类书已从各种古籍中辑录的这一专题资料，得以借用。如本书序文所说：“唐、宋以来，迄

于明、清，先后出现了许多类书，大都设有音乐门类，从经、史、子、集、历代音乐专著及其它著作中摘引许多与音乐有关的资料。尽管这些类书不是专为音乐研究者编纂的，可是这许多珍贵的音乐资料，对于每个音乐研究者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古类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失传的、也就是今天在其它任何书籍中找不到的这一专题资料。也是如序文中所说：“其中有些资料虽然各书互见，但有些原著早已散佚不传，却由于编纂者的时代不同、着眼点不同，因而得以分别保存。”《例言》第二条更举例指出各种类书中所保存的不少散佚不传之音乐资料说：

《艺文类聚》辑录的某些汉、魏、六朝有关音乐的诗赋，《太平御览》、《玉海》辑录的后周显德间窦俨的《大周正乐》，《太平御览》辑录的延明《乐说》，《初学记》、《太平御览》辑录的《乐苑》，《玉海》辑录的唐·刘昉《太乐令壁记》，唐·徐景安《历代乐仪》（一名《新纂乐书》），唐·武平一《景龙文馆记》与唐、宋两朝《实录》里有关音乐的记载，《册府元龟》辑录的刘芳上书论乐，《事林广记》辑录的《遏云要诀》、《圆里圆》赚词、《鼓板棒数》、《愿成双》、《狮子序》、《乐星图谱》、《总叙诀》、《八犯诀》、《四犯诀》、《管色指法》等，《新楔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辑录的《三弦谱式》、《箫笛谱式》、《鼓经要法》，《新□万宝全书》辑录的《三弦谱式》，等等。

①

第三章

曹魏和南北朝的重要类书

魏文帝曹丕诏命编纂《皇览》一千多篇，不但在古籍中开创了类书这一种体制，也给后来许多封建王朝在开国之初集中人才大规模地编纂类书以示文采之盛做了一个示范。晋代几乎没有类书。^①南北朝的几个国家，却步武曹魏，辑成了好几种重要的类书：先有北魏道武帝拓拔珪时的《帝王集要》^②；到公元六世纪的头上二十年间，更是繁花迸发，南北竞美，南朝梁有《寿光书苑》、《类苑》、《华林遍略》递相出现，北朝元魏有《科录》^③成书；接着又有六世纪晚期北齐所编《修文殿御览》问世。虽然这些类书全都失传，已不能为今日所利用，但是我们还是要较详细地谈述它们，这是因为：（1）它们是古类书的河源，有回溯的必要；（2）一些现存的古类书，在编纂时曾大量地袭用了前代的类书——即是这片“河源”，例如《艺文类聚》之于《华林遍略》、《太平御览》之于《修文殿御览》，所以，纵然这片“河源”表面上已湮淀，实际仍有其现实意义；更其

① 只是陆机有三卷私人编的《要览》。此书在南宋的《中兴馆阁书目》列于子部类书家，但《唐书·经籍志》则著录于丙部子录杂家类。《玉海》卷54引《中兴馆阁书目》载陆机的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览》三篇：上曰‘连璧’，集其嘉名，取其连类；中曰‘述闻’，实述予之所闻；下曰‘析名’，乃搜同辨异也。”《馆阁目》著录一卷，当系合三篇为一卷。南宋以后失传。

② 《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帝王集要》三十卷，崔安撰。按，“安”当作“宏”。这书大概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往代兴废之由”，为一政事历史的专业类书。

③ 《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科录》七十卷，元暉撰。《魏书·常山王遵传》说元暉“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它也应是一部政事历史的专业类书。《隋志》著录的卷数恐脱“二百”二字。

因为,(3)有些死亡掉的又有复活,例如《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在敦煌石室里发现了残卷,《皇览》则有辑佚之本。

陈末张式编有《书图渊海》数十卷,将在第十一章《重视图表的类书》里谈及。

(一) 《皇 览》

《玉海·艺文·承诏撰述篇》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建云台者非一枝,成珍裘者非一腋,言集之者众也。”这部类书的始祖是魏文帝曹丕诏命编纂的。《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说:“初,帝好学,以著述为务,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命名之意,据《史记·五帝本纪》的司马贞《索隐》说:“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它的内容,据《三国典略》说是“包括群言,区分义别。”《太平御览》卷601引。

卷帙 据《魏略》说,《皇览》“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魏志·杨俊传》裴松之注引。《文帝纪》说“凡千余篇”,就是四十余部乘部有数十篇所得之数。如果每篇为一卷,则有一千多卷。《隋书·经籍志》:“《皇览》一百二十卷。梁六百八十卷。”这是说,在梁代编《七录》时存六百八十卷,至隋时已散失得只存一百二十卷。旧、新《唐志》都不载,大约是全佚于隋末。

部类 《皇览》的四十多部是那些部,现在已不清楚。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根据一些零星资料揣测着说:

《史记索隐》卷一云:“《皇览》记先代冢墓之处。”康按,《御览》礼仪部三十九引《皇览·冢墓记》二十余条;《水经注》引《皇览》十三条,言冢墓者十之九。“冢墓”,盖即四十余部中之一部。《御览》卷五百九十又引《皇览·记太公阴谋》,疑亦书中篇名也。《论语·三省章·释文》称《皇览》引鲁读六事,则兼及经义。”

编者 参加编辑的人,现知名者五:刘劭、桓范、韦诞、王象和缪袭。似以缪袭、王象为领修人。《史记·五帝本纪》索隐说:“是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也。”《隋书·经籍志》说:“《皇览》一百二十卷,缪卜等撰。”一本作“缪十等撰”。卜、十,皆“袭”之误。

缪袭汉 中平三年生,魏 正始六年卒(186—245),东海人,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王象,字羲伯,河内人。有才志。建安中,为魏太子曹丕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略》说:“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220]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鄲人。《魏志·劭传》:“黄初[220—226]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桓范魏 嘉平元年被杀(?—249),字元则,沛国人,《魏略》说他“延康中为羽林左监,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魏志·曹爽传》注引。韦诞,字仲将,京兆人。有文才,善属辞章,能书法。《三国典略》说:“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太平御览》卷 601 引。

成书期 概括上述材料,一般说《皇览》始事于汉延康元年,成书于魏黄初中。这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还可以把日期考定得更细一些,把情况说得更详一些。

延康这一年,共换了三次年号:开始时是汉建安二十五年,到三月改为延康元年,到十月又改为魏祚起点的黄初元年。这年发生的大事,是正月里丞相魏王曹操卒,子丕嗣魏王,并自为丞相。十月,曹丕篡位为魏帝。据《魏略》说,王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皇览》,又说桓范在延康中与王象等典集《皇览》,这就表明,这部类书的始祖在当年的三月以后,不待魏国建立,便已着手从事。

领修人之一的王象,少时孤贫,为人仆隶,年十七、八岁时,被指使牧羊。他偷暇读书,因被捶楚。同郡人杨俊嘉其才质,出资赎

象，为成立家室而后别去。象既为俊所拔，果有才志表现，及文帝登位，居魏重任。其时杨俊为南阳太守，因早先与临菑侯曹植相善，曾在太祖曹操面前称植之善，为植兄文帝所恨。至黄初三年〔222〕，借口车驾到宛而宛市闭户，即收宛令及太守杨俊，俊遂自杀。俊被收时，王象以受恩欲报，请于魏帝，叩头流血，帝仍不许。据《魏略》载：“象自恨不能济俊，遂发病死。”而在这段记载前，有“受诏撰《皇览》，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之语。是王象病死前，书已完成，而象之死在黄初三、四年间，故“数岁成”即可断言在黄初三年成。因此，《皇览》是在公元220年夏间开始编撰，而在222年完成的。

抄合本 《皇览》卷帙庞大，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依赖传抄，欲保存全书，是很困难的。因此在梁代流行类书时，对《皇览》有许多“抄合本”，即是节录与合并的抄写之本。《隋书·经籍志》在“《皇览》一百二十卷”条后云：“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亡。梁又有《皇览》五十卷，徐爰合，《皇览目》四卷，亡。梁又有《皇览抄》二十卷，梁特进萧琛抄，亡。”这是说梁代有何承天、徐爰、萧琛三家的抄合本，但至隋代，这些抄合本亦都亡佚。而《唐书·经籍志》著录：“《皇览》一百二十二卷，何承天撰。又八十四卷，徐爰并合。”^①那么，何、徐两本佚而复出，卷数也不同于《隋志》。惟魏时原本和萧琛所抄的，唐代亦无存。及至宋世，则所有《皇览》悉数亡失了。

^① 徐爰合抄的《皇览》，《隋志》载梁代《七录》的著录为五十卷和目录四卷。隋亡唐出，《唐志》的著录为八十四卷，卷帙反大于梁，孙冯翼引以为疑，在辑本《皇览·序》中云：“何以徐本阅唐而独增多？且其本既见《唐志》，则与何本《隋志》并云亡者，误也。惟《皇览目》及萧琛所抄或亡于隋时，故《唐志》祇载何、徐二本。”姚振宗不同意这种看法，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徐本唐时复出，乃八十卷、目录四卷。视梁本多三十卷。然亦疑本志此条‘五’字乃‘八’字之误。”姚说为长。

辑本 清代有两个辑本：(1) 嘉庆时沈阳孙冯翼辑本，一卷，计《逸礼》及《冢墓记》二篇和其它的片段数事，刻入《问经堂丛书》。亦收入《丛书集成》第 0172 册。(2) 道光时甘泉黄奭辑本，刻入《汉学堂丛书》这部丛书的后印本易名《黄氏逸书考》的《子史钩沉》部分中。也是一卷，所辑内容大致和冯本相同。

(二) 《寿光书苑》

梁武帝萧衍亦好文学，故得位之初，即诏修类书，可能是效魏文帝之所为。《隋书·经籍志》的类书行列中，载“《寿光书苑》二百卷，梁尚书左丞刘杳^①撰。”这是开国初年诏修的一部类书，在天监初年[502]即已开始。萧衍此人器量仄隘，后来为了与刘峻的《类苑》竞高下，又敕修第二部类书《华林遍略》。

领修《寿光书苑》的刘杳齐永明五年生，梁大同二年卒(487—536)，字士深，平原人。天监初，为太学博士，历仕至尚书左丞。《梁书·文学传》提到他“入华林撰《遍略》”，但是没有说他纂辑《寿光书苑》。

《梁书·文学传·序》说：“高祖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儒、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又《张率列传》：“率字士简，吴郡吴人。天监初，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七年[508]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又《到洽列传》：“使抄甲部书。”综合这些材料，可知《寿光书苑》乃统辑四部书资料而成，“寿光”二字以寿光省得名。始事于开国之初，藏事在天监七年后。

^① 《唐书·经籍志》类事家：“《寿光书苑》二百卷，刘杳撰。”“杳”为“杳”字之误。

(三) 《类苑》

当《寿光书苑》将竣事时，在历史上以注《世说新语》而闻名的刘孝标正为萧衍之弟萧秀编著一部类书——《类苑》。

《梁书·安成康王秀传》：“秀于高祖，布衣昆弟。生于宋元徽三年，卒于梁天监十七年(475—518)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又《文学·刘峻传》：“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孝标名峻，以字行。生于宋大明六年，卒于梁普通二年(462—521)按，萧秀迁荆州是天监七年[508]遭母忧，诏起视事之后。故《类苑》的着手编纂，大约是天监十年[511]左右之事。

梁武帝萧衍对刘孝标很不恰意，因为孝标投萧秀前，在朝时占了萧衍的面子。据《南史·刘峻传》说：“初，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沈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曾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这里透露了两个情况：孝标实高才博学，其后萧秀引他编纂类书，必是因此；另一方面，萧衍器量是很小的。《南史》本传接着说：“及峻撰《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这表明了两事并发，刺激了萧衍，同时也反映出一个情况，《寿光书苑》大抵是编得不及《类苑》的。

《隋书·经籍志》：“《类苑》一百二十卷，梁征虏刑狱参军刘孝标撰。梁《七录》八十二卷。”姚振宗《隋志考证》作一种解释道：“案，梁《七录》八十二卷，殆所谓‘书未成而已行于世’之未完本也。其后三十八卷则已在普通四年[523]《七录》成书之后矣。”这个推

测是不妥当的。因为刘孝标已在普通二年去世，那能在普通四年以后续书呢？这只能说，一百二十卷的就是“未完本”；《七录》著录的八十二卷本更是“未完本”的不足本。《南史·峻传》亦说：“峻撰《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可见“未及成，复以疾去”时的本子已是一百二十卷。

(四) 《华林遍略》

梁武帝命诸学士编纂《华林遍略》^①的原因已见于前。

《南史·文学·何思澄传》：“天监十五年[516]，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锺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计书成已到普通四年[523]时。《唐志》、《新唐志》皆载“徐勉撰”，与《何思澄传》相应，说明领修人是徐勉。勉为剡人，字修仁，生于宋泰始二年，卒于梁大同元年(466—535)，历史部尚书，累官至中书令，卒谥简肃。但《隋志》的记载是：“梁绥安令徐僧权等撰。”《日本见在书目录》同。徐僧权，东海人，为徐伯阳之父。《南史·徐伯阳传》叙僧权为梁东宫通事舍人，领秘书，以善书知名。不言其修《华林遍略》。或者《隋志》所记有误，或者二徐并是领修人，未可定。至于卷帙，《隋志》、《日本见在书目录》皆称六百二十卷，《唐志》、《新唐志》皆称六百卷，并与《何思澄传》有差。

影响 《华林遍略》成书后，影响颇大。表现在：(1) 流传得很广；(2) 此后修纂的类书，多以它为蓝本，把它吸收了进去。通过第二个情况，它有作用于今日还存在的古类书，例如《艺文类聚》。

^① 《华林遍略》的“遍”字，据《隋志》、《新唐志》、《日本见在书目录》和《北齐书》、《三国典略》等。《南史》中多处及《艺文类聚·序》作“徧”，二字相通。《唐书·经籍志》和有些地方作“编”字，则是错误的。

在当时,北方也很欢迎《遍略》。《北齐书·祖珽传》说:“后为秘书丞,领舍人。事文襄。扬^①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需也。’珽以《遍略》数秩质钱携蒲,文襄杖之四十。”文襄为高澄,后为北齐世宗,当时领中书监,为东魏兴和二年[540],去南梁编成《遍略》尚不足二十年,扬州贾人已作为奇货北运。高洋竟集书手多人一日夜录存副本,而祖珽窃其数秩亦能押得现款,其身价可知。且北齐所有,不止一部。据《祖珽传》又说,当文宣帝高洋作相时,祖珽“又盗官《遍略》一部,事发,文宣付从事中郎王士雅推检”。

据《三国典略》所记,北齐编《修文殿御览》,是以《华林遍略》为主要的蓝本。后来隋大业时修《长洲玉镜》,据《大业杂记》说是“源本出自《华林遍略》”。唐武德时修《艺文类聚》,同样充分地利用了它。

存本 《华林遍略》在唐代还存在,到宋初就已不传,故编《太平御览》时就没有能利用它。然隔九百多年后,敦煌莫高窟石室开启,发现唐人抄写的书籍中,有一无名的古类书,存二百五十九行。据上虞罗振玉的考订,认为是北齐编的《修文殿御览》;但按洪业的复考,则认为是《华林遍略》,详见下《修文殿御览》节中。

《要录》 《隋书·经籍志》在《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的著录后,紧接着有“《要录》六十卷”的一项登录,不著撰人名氏。姚振宗《隋志考证》说:“案,此列《华林遍略》之后,似乎即《遍略》之节录本。以本志部居言之,则近似。然考旧、新《唐志》之叙次,则又不然也。”姚氏之意,《要录》可能是象《皇览抄》之于《皇览》一样,乃《遍略》的一个抄合本,但无法确实证明。

^① “扬”字原脱,《北史》卷47亦然。据洪业说补,见《所谓〈修文殿御览〉者》(《燕京学报》第12期)。

(五) 《玄洲苑御览》——《圣寿堂御览》
——《修文殿御览》

《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高纬时代官修的一部类书，《玄洲苑御览》和《圣寿堂御览》是它修成以前所曾用过的名称，其实是一个东西。但《隋书·经籍志》以《圣寿堂御览》之名著录。

高纬之于文学，远远不如曹丕、萧衍。《修文殿御览》之纂修，只不过是听从了祖珽的建议，以洁文治之名。三百六十卷书，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就编成，也没有耗很大的功力。但在承前启后上，它却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对现存的古类书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较详细的了解它。

始末 《北齐书·后主本纪》说：“武平三年二月庚寅[十八日，572—III—17]，以侍中祖珽为左仆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八月癸巳[二十四日，572—IX—16]，行幸晋阳。是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当时祖珽获主信任，权倾中外，事由祖珽建议，而起意则为中书监阳休之生于魏永平二年，卒于隋开皇二年(509—582)，据《北齐书·阳休之传》说他“晚节说祖珽撰《御览》”，那么祖珽是听取了阳休之的献谋而向后主高纬进议的。纂修始末，《太平御览》卷601引唐·丘悦所撰之《三国典略》叙述甚详：

齐主如晋阳，尚书右仆射^①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陛下听览余日，眷言缃素，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

^① 按《北齐书》纪、传，珽于此时为左仆射。

短，登即编次。放天地之数，为五十五部^①；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窃缘斯义，仍曰《修文殿御览》。今缮写已毕，并目上呈，伏愿天鉴，赐垂裁览。”齐主命付史阁。

初，齐武城令宋士素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置于齐主巾箱。阳休之创意，取《芳林遍略》^②，加《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等书，以士素所撰之名，称为《玄洲苑御览》。后改为《圣寿堂御览》。至是，珽等又改为《修文殿》，上之。徐之才谓人曰：“此可谓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

由这段记载看来，可以得到几个情况：（1）齐王如晋阳，为常有之事。但这一次是恰在《修文殿御览》完成之时，由祖珽等上言的内容和这个记载末尾的“至是”字样可以看出。由此可知最后改名《修文殿御览》已到八月书成之时。《隋志》以《圣寿堂御览》之名著录，可能是看见一个初稿。（2）《御览》的命名是取于宋士素的书。它的内容实际上也是三条龙汇拢来的，即宋士素书、《华林遍略》和《遍略》所未收的书籍，这些未收书大抵是北朝的文史，为南方所未见者。（3）徐之才虽然也是本书的修撰人之一，但他对于这部书的编纂工作甚表不满。

卷帙 《修文殿御览》计三百六十卷，《唐志》、《新唐志》、《日本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都和《三国典略》相同。《隋志》著录书名虽为早先的命名，卷帙也是三百六十。

^① 原作“五十部”，脱后“五”字，非是。经我补。按，“放天地之数”，一定是五十五，不会是五十。因为：《易·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宋代的《太平御览》摹仿《修文殿御览》，也是分五十五部。由于《三国典略》脱去一个后面的“五”字，故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认为《太平御览》的分部比《修文殿御览》多五部，是一个误会。

^② “芳”字是错误的，当作“华”。

《玉海》卷54《艺文·承诏撰述篇》说：“《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采摭群书，分二百四十部以集之。”这里点出了它的类目总数，与祖珽等上言所说的五十五部当不矛盾。五十五是部数，二百四十是部下面一级的类数，但《玉海》所用的“部”字含混不清。

编者 《修文殿御览》的编纂工作者有监撰、撰例、撰书各职。其参加工作的主要人物据《北齐书·文苑传·序》说：“祖珽辅政，渐说后主属意斯文。三年武平三年[572]，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①、散骑常侍张雕、中书监阳休之监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骑侍郎韦道孙《北史·文苑传·叙》“孙”作“逊”、陆义、太子舍人王邵《北史》“邵”作“劼”、卫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刘仲威、袁爽、国子博士朱才、奉车都尉睦道闲、考工郎中崔子枢、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卢思道、司空东阁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参军崔儵《北齐书·文苑传·序》脱以上八字，据《北史》补入、太学博士诸葛汉、奉朝请郑公超、殿中侍御史郑子信等人馆撰书。并敕通直郎萧放、齐州录事参军萧愨、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等同人撰例。复令散骑常侍封孝琰、前乐陵太守郑元礼、卫尉少卿杜台卿、通直散骑常侍王训《北史》作“杨训”、前南兖州长史羊肃“南”字据《北史》补、通直散骑常侍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刘珉、开府行参军李师正《北史》“正”作“上”、温君悠入馆，亦令撰书。复命特进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刘逖、散骑常侍李孝贞、中书侍郎李德林续入待诏。寻又诏诸人各举所知，又有前济州长史李翥、司空祭酒阳辟强殿本误作“疆”，据宋本改。

^① 洪业《所谓〈修文殿御览〉者》认为崔劼当作崔季舒。理由是：“《北齐书·崔劼传》仅称劼‘待诏文林馆，监修新书’，而文林馆之置，据《后主纪》乃始于武平四年二月丙午[初十日，573—III—28]，已在《修文殿御览》成书后。”这个说法仍然是不对的：《后主纪》虽称文林馆置于武平四年，《文苑传·序》则言置于三年，《北齐书》中许多地方谈到《修文殿御览》皆与文林馆有关，《后主纪》也可能有误；再则，崔季舒在这个名单中也提到，如把这里的崔劼换成崔季舒，就变成有两个崔季舒。

……并入馆待诏。又敕右仆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览》成后^①，所撰录人亦有不时《北史》“时”作“得”待诏付所司处分者。凡此诸人，亦有文学肤浅，附会亲识，妄相推荐者，十三、四焉。虽然，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又，《文苑·颜之推传》：“之推撰《观我生赋》，自注曰：‘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阳休之的儿子辟强因其父故，也被引入撰书，据《北史·阳休之传》说：“令其子辟强预修《御览》书。”又说：“辟强字君大，性疏脱，又无艺，休之亦引入文林馆，为时人所嗤鄙。”这就是《文苑传·序》所说的“凡此诸人，亦有文学肤浅，附会亲识，妄相推荐者”。因亦可知，《文苑传·序》书名的那些人，都是参加过《御览》工作的。

祖珽，字孝征，范阳狄道人。自是高才博学，《北齐书·珽传》说他“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但是他的品德郤坏极。前面已述他两度盗卖《华林遍略》事，其它劣迹还有不少。南宋·陈振孙说“珽之行事，奸贪凶险，盗贼小人之尤无良者，言之则污口舌”，但是却怪诧“其所編集，乃独至今传于世”。《直斋书录解題》五十六卷本卷46、二十二卷本卷14。其实并不可怪，这部类书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而维持它的存在价值的。

蓝本 祖珽既两度盗卖《华林遍略》，陈振孙故在《修文殿御览》的著录下说：“今书毋乃亦盗《编略》之旧，以为己功耶？”实际上，《修文殿御览》以《华林遍略》为蓝本，大采而特用，是公开的事，并不偷偷摸摸。阳休之创意辑《玄洲苑御览》，即以《遍略》为蓝本。因袭的问题，不在于祖珽。祖珽虽两番盗书，但他确实也懂得《遍

^① 由“《御览》成后”一语看来，即知以上诸人，都是既入文林馆而又参加《御览》撰务的。洪业因抱“修文殿撰书在先，文林馆撰书在后”的看法，说这些中人“疑有文林馆人与《御览》无关者”，这种看法不符于史实。

略》的好处。阳休之的主意,他必是由衷的赞同。

为的是有《华林遍略》做蓝本,祖珽他们的工作自然能够事半功倍。洪业说:“梁以八年成书,齐以七月毕纂,创难而踵易也。”这是很合理的说法。当然,《修文殿御览》的卷帙只《华林遍略》的一半,工作也要简便些。

特点 现在已经看不到《修文殿御览》的全书,无法谈其优长。但是根据仅有的资料,仍然可以窥见它的某些特点,足以说明其流传较久的原因;反过来说,传世之久也说明它必有若干特点。编例的谨严,应是一端。因为它重视体例,故有专人负撰例之责,而司其事的颜之推是极有实学的人。所谓“萧、颜撰例,诸贤秉笔”,这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抓体例的实际效果,也势必是:“《遍略》为卷七百,此才得半,如何去取,虽未可知,而待诏诸人,当无率尔。”由隋代柳顾言平议《华林遍略》与《长洲玉镜》的短长在于冗汰与取精之别(见第四章第一节),便可了然。宋代编纂《太平御览》,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为蓝本,而分部的数目,一依《修文殿御览》,也说明了撰例谨严取得的成绩。

传本 曹魏和南北朝的几部大类书,以《修文殿御览》传世的时日为最长久。在南宋时,它还全部存在,《中兴馆阁书目》、《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都著录。遂初堂,直斋都是私人藏书,直斋所著录者亦是三百六十卷,完善无缺。故陈振孙说:“案《唐志》类书,在前者有《皇览》、《类苑》、《华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则此书当为古今类书之首。”南宋季年,王应麟撰《玉海》,著录《修文殿御览》,并知其分二百四十部(类),也一定曾见原书。明初的内府藏书《文渊阁书目》卷11类书类著录:“《修文御览》一部,四十五册,阙。”则已不全。明季钱谦益藏书《绛云楼书目》卷3类书类著录:“《修文殿御览》一百六十四册。”清乾隆中余姚卢沚藏书《抱经楼书目》也有“《修文御览》一百六十三册。”似乎直到清代中叶,

尚有其书。但明、清两代学者,从未见引用此书者。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广征天下图书,也未得此书。严可均《铁桥漫稿》载邢澍之言说,“汉中张姓家有《修文殿御览》。”卷8《书葛香士〈林屋藏书图〉后》。可是严既未见之,也没有别人真正地见到。

更可讶异的是,《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载清末学者孙诒让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848—1908)的识语云:“甲戌〔同治十三年,1874〕,过沪上,闻书估吴姓云:‘有明钞《修文殿御览》二百册,为楚人某购去。’然则天壤尚有传本也。”^①然而还是一件无头公案,其下落既不明,且没有一位近代的学者曾真正见到它。所以,按现在所能掌握的情况,还只能说本书自明初以后,即不传于世。

石室本的发见 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第288号石窟所封藏的古籍和文物,蕴涵几及千年,至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始被发见,不久,便被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分子所盗劫。光绪戊申〔三十四年,1908〕被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盗走的文卷中,有唐人抄本^②类书残卷,存二百五十九行,无首无尾,不见书题、卷第和撰人姓氏,故不明其为哪一部类书(伯氏劫经编号:P. 2526)。其存者鸟部鹤类四十六条,鸿类十八条,黄鹄类十五条,雉类四条,合共八十三条。^③其体例颇似《太平御览》,而所引书六十五种,迄刘宋时代著作而止。^④至宣统辛亥〔三年,1911〕,上虞罗振玉依影片抄录,以石印发表于《国学丛刊》第二册《佚籍丛残》中,订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复于1913年用珂罗版景印真迹于《鸣沙石室佚书》中,亦题此名。因为

^①范希曾在1931年以前撰的《书目答问补正》,在《皇览》条下有一记注云:“《修文殿御览》,尚存钞本,有百余册。”亦无可追究。

^②罗振玉据其“虎”、“民”、“治”诸字缺笔,而“隆”字则否,定其缮写在开元、天宝之前。

^③此统计据洪业《所谓〈修文殿御览〉者》。罗振玉景印本跋所作统计为总数七十九条,而细数又与总数不符,故不从。

^④所引《幽明记》,刘义庆撰;《异苑》,刘敬叔撰;《神境记》,王韶之撰;《荆州记》,盛弘之撰;《南越志》,沈怀文撰;都是宋人。罗振玉谓“所引诸书至魏、晋而止”,不确。

据他的考订，这卷无首无尾的古类书该就是《修文殿御览》，他说：

宋·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谓，《太平御览》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译条次修纂。《玉海》卷五十四^①“太平御览”条引《实录》，与陈氏说合。今检宋代《御览》鸟部，其采取此书者十五、六，而采取《类聚》者十二、三。当日馆臣，任意删节，复多讹夺，而因袭之迹，昭昭可见。则此残卷者，即《修文殿御览》，殆无可疑。

1917年，潮阳郑氏刻《龙溪精舍丛书》，据罗氏景印本刻入，亦依题为《修文御览》。引用此项资料的，也都沿用其名。金以为“文林钜制，重现于世，吉光片羽，弥可珍贵。”

至1932年，洪业撰成《所谓〈修文殿御览〉者》一文，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2期，始提出异议，认为这卷敦煌石室发见的残本古类书不是《修文殿御览》，而可能是比它更早的《华林遍略》。他的理由大致有三端：（1）残卷中“隐”、“秦”、“湖”、“树”、“湛”等字不避高齐讳，“馆臣纂书，往往删除文字，更改句法，以避庙廷之讳，今乃不避，何也”；（2）据《隋书·儒林传·叙》说，南北朝时，两方“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今残卷引《易》二条皆用王弼注；引《左传》二条，一条无注，一条则用杜预注。“然则残卷原书之编纂，乃在江左而不在河、洛欤”；（3）洪氏以为最堪注意者，据《三国典略》，《修文殿御览》固常引《十六国春秋》，而残卷第77条不引《十六国春秋》而引《赵书》，下缀以注“谨案”云云三十六字：

《赵书》曰：“石庸建武十三年，扬州献黄鹄雏五，颈长一丈，鸣声闻十余里，养之于池。”谨案，虎实逆贼，王化不通，岂有贡其鸟物者乎？

^① 原文误为“卷五十六”。

此献必妄，或疆垂小民假称珍怪，取媚于虎耳。

洪业说：“注之意，驳书之辞也。夫唯江左文人，乃摈北虜于王化之外；而邺都朝臣，何必以扬州贡鸟为可讳？只此寥寥三十六字注语，已足证残卷之不为《修文御览》矣。”

洪业考此残卷不能为北朝修的类书，而应出于江左，则“与其称残卷为《修文御览》也者，不如号之为《华林遍略》”。据欧阳询《艺文类聚·序》：“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可以窥见《遍略》义例，重事不重文，与《修文殿御览》、《太平御览》体制相同。编《太平御览》时，《遍略》已不存，不能用其书，然可通过《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所取自《遍略》者而存之。只是经过转折，采抄者少。据洪业统计，《太平御览》鹤、鸿、鹄三类之颇相似于敦煌古类书残卷者，实仅十七条（按比例不到十分之二）。且此十七条者，中有十条，实亦与《艺文类聚》所引者相似。罗振玉说“今检宋代《御览》鸟部，其采此书（指残卷）者十五、六”，是不确的。洪业的结论说：

今有残卷于此，置之《修文御览》之背景中，则格格而不合；置之《华林遍略》之推测中，则油然而合，故可断其决非《修文御览》，而可疑其或为《华林遍略》也。二十年来，学者之重视所谓《修文御览》者，盖以其为类书之最古而仅可见者也。倘其诚为《华林遍略》也，则较《修文御览》尤古、尤可贵。不必以其不为《修文御览》为憾。

洪业的考证，已动摇了残卷之为《修文殿御览》的说法，而使人觉得这卷石室本古类书残卷应是出于南朝的编撰而不为北朝之产物。至于是否《华林遍略》，犹待更充分的证明。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残卷的发见，应为“类书之最古而仅可见者”（比《编珠》、《北堂书钞》都要早得多），大概能说是确定不移之事实。

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论此残卷的作用说：

今以宋《御览》及《类聚》勘之，知此书之善，厥有数端：

《类聚》所引古籍，虽据旧本，然明刊恒据俗本改更。若北宋《御览》，则修书之时已据习见之文校改。此卷出自中唐，舍讹脱外，文字仍准北齐之旧，故所引各书，有与今本经、注异文者，有与纬书、古字书异文者，有与史籍异文者，有与子书不同者。与《类聚》、宋《御览》所引亦不尽合。已佚之书亦然。彼略此详，固足为辑录佚书之助；即字有损益异同，亦足为辑书互勘之助。若文为二书所未采，又属已佚之书，则只字单词，亦复有资于存古，如鹤类所引《春秋考异邮》、《三辅旧事》、《纪年》、《列异传》、《古今注》、《玄中记》、王隐《晋书》、《鲁连子》、刘向《别录》、桓谭《新论》、仲长统《昌言》、《幽明录》、傅咸《诗叙》、《桂阳列仙传》，鸿类所引《风土记》、《梦书》，黄鹄类所引《昌言》、《韵集》、《南越志》是也。坠籍佚词，凭斯复显。

刘氏已指出此残卷在校勘、辑佚上的用途，但它还没有在这些工作中被充分利用。《海隅读书记》指出，刘向《别录》在清代到近代有洪颐煊、严可均、马国翰、陶澐宣、姚振宗、王仁俊六家辑本，但此一类书残卷中所引的一条，皆未被收：

刘向《别录》有《鹤赋》。今鼓石邑感君广或见白鹤。（洪业编号第39条）

姚氏以前诸家见不到敦煌秘笈，不足怪。王仁俊已能看到敦煌发见的部分文物他编印有《敦煌石室真迹录》五卷，罗氏初印的石室本《修文殿御览》他也完全有可能看到，缺收此条，为未充分利用新发现古类书材料之事例。

（六）《瑠玉集》

《瑠玉集》原十五卷，不知撰人。国内久失传，日本尾张真福寺

藏有该国当我国唐代时的旧钞卷子本，残存 12、14 两卷，著录于涩江全善和森立之著的《经籍访古志》说：

每卷首题《瑠玉集卷第几》，次行列书篇目。十四卷末记云：“用纸一十六张。天平十九年岁在丁亥〔当我国唐玄宗天宝六载，747〕三月写。”文字遒劲，似唐初人笔迹，真罕见之宝笈也。但此书未详撰人名氏。其目仅见《见在书目》及《通志·艺文略》，知其佚已久。所引各书如《蔡琰别传》、《语林》、《史记》、《晋抄》、王智深《宋书》、《帝王世纪》，近多不传，亦得藉此以存其梗概。

清光绪初年，宜都杨守敬随遵义黎庶昌使日本，摹得其本，为黎氏影刻入《古逸丛书》中，乃传于世。残二卷所存的类目如下：

〔卷第 12〕聪慧篇第 1 壮力篇第 2 鉴识篇第 3 感应篇第 4

〔卷第 14〕美人篇第 1 丑人篇第 2 肥人篇第 3 瘦人篇第 4 嗜酒篇第 5 别味篇第 6 祥瑞篇第 7 怪异篇第 8

李慈铭在光绪十五年甲申〔1884〕所作之日记，说《瑠玉集》“究不定其谁作；其书掇拾奇零，绝无条理，重性贻缪，不胜指摘，盖是六朝末季底下之书”。但是也认为：其中引《孝子传》李善两乳存孤事“足以裨史阙”；引《类林》者七，《春秋后语》及《同贤记》者各三，王隐《晋书》、王智深《宋书》及《语林》、《古传》、《论语疏》者各一，“《论语疏》引颜子问一以知十，其说甚异，不知出何人《论语疏》，皇《疏》亦无此文也”。又说：“裴子野《类林》世久不传，此犹存其七事，亦可少见梗概矣。”又说：“再校《瑠玉集》，补得《后汉书》四事，盖皆出谢承诸书。”《越缦堂日记·荀学斋日记己集下》

现代徐宗元辑录《帝王世纪辑存》1964年5月出版，也利用了《瑠玉集》的引文。

第四章

隋代的重要类书

隋代享国之年甚短，但在类书史上却占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在隋炀帝杨广时，公私共有几部重要的类书编成：(1)诏命编修的《长洲玉镜》，(2)杜公瞻奉敕编的《编珠》，(3)虞世南在秘书省时自辑的《北堂书钞》，(4)诸葛颖辑的《玄门宝海》^①。而《编珠》是现存古类书之最早而较为完整者，虽然也已残缺，但是比辑佚而存的《皇览》，敦煌石室发现的《修文殿御览》(或《华林遍略》)那是要完整多了。《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的领首著录，便是《编珠》^②。有些学者怀疑传本《编珠》是明或清初人所伪造，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看法。这里要加以辨正，并且说明《编珠》的价值。《北堂书钞》是久经重视的一部古类书，被列为“唐代四大类书”^③之一，编者虞世南虽然是初唐的一位名宦和大学者，但《书钞》是他在隋末服官于秘书省时的述造，所以实际上是一部隋代的类书。因此，我们把隋代专列一章来谈。

① 《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类事家著录诸葛颖《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不著编撰时代。按《北史·文苑传》，颖字汉，丹阳建康人。仕隋炀帝为著作郎，甚见亲倖。从驾北巡，卒于道。颖死于隋末，是书为在隋时所修。

② 《编珠》的前面，还有一种：梁元帝萧绎的《古今同姓名录》。但那是一种姓氏书，不是类书。《四库总目》类书类的《小序》说：“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可见这是硬挨进去的。当《四库全书》修纂时，《皇览》尚未辑佚，石室之书犹不闻于世，故其时所存类书，实以《编珠》为魁首。

③ 《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帖事类集》。

(一)《长洲玉镜》

《长洲玉镜》是隋炀帝杨广时官修的一部类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百三十八卷，不著撰人。《大业杂记》则记录为四百卷。参预编撰者有秘书学士虞绰、柳顾言、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王曹等。始于大业初〔605〕，至二年〔606〕六月成书。

《北史·文苑·虞绰传》说：“绰仕陈为太学博士。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

《续谈助》卷4引唐·杜宝《大业杂记》一则，提供了好多有关这部今已失传的古类书的情况，如(1)其它的编撰人；(2)蓝本为《华林遍略》；(3)采事弘富，而无《遍略》复见之病，故卷帙为少。杜宝说：

大业二年六月，学士秘书监柳顾言、学士著作佐郎王曹等撰《长洲玉镜》一部，四百卷。帝谓顾言曰：“此书源本出自《华林遍略》，然无复可加，事当典要。其卷虽少，其事乃多于《遍略》。”对曰：“梁主以隐士刘孝标撰《类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毕尽此书，无一物遗漏，梁主心不伏，即敕华林园学士七百余，人撰一卷，其事数倍，多于《类苑》。今文籍又富梁朝，是以取事多于《遍略》。然梁朝学士取事，意各不同，至如‘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①序剑者尽录为剑事，序溪者亦取为溪事，撰玉者亦编为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至于《玉镜》则不然。”帝曰：“诚如卿说。”

^① 梁·吴均《咏宝剑》诗：“我有一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太平御览》卷344引）。

《唐书·经籍志》著录：“《长洲玉镜》一百三十八卷，虞绰等撰。”《新唐书·艺文志》：“虞绰等《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旧志的“一”当是“二”之误。至宋代不传。

（二）《编珠》

《编珠》四卷，现存第一、第二两卷。隋杜公瞻奉敕撰进。首载大业七年[611]正月自序，称“皇帝在江都日，好为杂咏及新体诗。偶缘属思，顾谓侍读学士曰：‘今经籍浩汗，子史恢博，朕每阅览，欲其故实简者，易为比风。’爰命微臣编录。”结衔题“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隋书·经籍志》未著录，旧、新《唐志》但有杜公瞻《荆楚岁时记》二卷，而没有这书。《通志·艺文略》卷7类书类（上）始著录：“《编珠》五卷^①，隋·杜公瞻撰。”^②但后来传本也非常稀少，几无称及之者。至清康熙廿余年间，詹事府詹士高士奇字澹人，号江邨，钱塘人。生于顺治二年，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645—1704）。始在内库废纸中得之。高氏说：“曩直大内南书房，奉命检阅内库书籍，于废纸堆中得隋著作佐郎杜公瞻《编珠》一册，原目凡四卷，遗其半，遍觅不得。因手抄之，藏笥篋间。己巳[康熙二十八年，1689]归寓平湖，端居多暇，出而校讎。爰其精粹，辄因原目，补为四卷，又广其类之未具者为二卷。”于是成《编珠》四卷、《续编珠》二卷，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朔日[1693-X-29]徐乾学序之。三十七年，高氏重加点勘增删，在是年五月朔[1698-VI-8]序刊之，遂行于世。但六卷之中，只有前二卷是杜氏原书，而前二卷每一门类的后面，都有高氏的补充，如天地

① 此著录卷数误。杜公瞻自序及目录皆四卷。

② 《四库全书总目》说“《宋志》始著于录”，此先于《宋志》者。又，尤袤《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有《编珠》。南宋时，官、私皆有其书。

门增补十四条等。这些增补,都有“此下补入”字样以区别之,也都不是我们所要叙及的东西,因为这些是没有价值的。

《编珠》原目分十四部,存者仅一、二两卷的五部:

[卷一]天地部 山川部 [卷二]居处部 仪卫部 音乐部
[卷三]服玩部 珍宝部 繒采部 酒膳部 [卷四]黍稷部 菜蔬部 果实部 车马部 舟楫部

体制 《编珠》的本来作用,是为了提供做近体诗的材料,故与“徵事”、“叙事”的类书不同,而为“事对”式的。它的体制是:隶事为对,下注出处。与后来《初学记》中的“事对”部分相同。杜氏自序说:“其朱书者故实,墨书者正义。”故实即事对,正义即出处。但今本已不别以朱墨。其隶对有三字,有二字,有四字。如“山川部”云:

暴练河,萦带海。

刘荟《劭山记》曰:“黄河去劭山一百余里,望之如暴练。”《罗浮山记》曰:“浮山东岭杳冥,东南望海,有如萦带。”

谷王,水伯。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之中。”

桥势如星,沙形如月。

《华阳国志》曰:“蜀郡城西南有七桥,云李冰所造,上应七星。”《太康地记》曰:“西海居延县流沙,形如月初生五、六日也。”

真伪问题 《编珠》的出现较晚,故引起疑窦。高氏得本以后,又补、续以行,其行径亦引起人们的怀疑,认为他是否故弄玄虚。然清代大内之确有此书残本前二卷,实无容疑,因为见者不止高士奇一人,并不是象《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世无传本,始出于士奇家”。第一,与士奇同见于内库者,有徐乾学、朱彝尊二人,朱亦手

录一本。^①第二,约在相同时期,王士禛亦见之于内府而传写之,故《居易录》卷 17 云:“杜氏《编珠》四卷,内府写本,阙三、四卷。”惟王士禛对库书即有所怀疑,他说:

公瞻自序:“隋皇在江都日,命微臣编录。大业七年正月奉敕撰进(原脱“进”字),勒成四卷。”称煬帝曰“隋皇”,不可晓。其云“在江都日”者,按史,大业元年秋八月,行幸江都;二年三月,发江都,四月至东京。书盖奉诏旨编于是时,而称大业七年,何也?

《四库全书总目》更以三事致疑:(1)不避隋讳;(2)菖蒲海一条引《汉书》,今检《汉书》乃蒲昌非菖蒲,“唐以前书,不应荒谬至此”;(3)南城鼓一条引《乐府解题》,其书晚出,必非六朝旧籍,公瞻安得而见之?因而认为是“或明人所依托,士奇偶未审欤?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张萱《内阁书目》俱不著录;《永乐大典》亦不登其一字,知其出明中叶以后矣”。又在《事类赋》条下说:“高士奇所刻《编珠》,称隋·杜公瞻撰者,伪书也。”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 60 更简捷了当地认为是高士奇伪造:“江村称得自内库,殊不可信。疑此书与所补、所续,均江村一手所撰,并伪撰杜氏原序以实之尔。”

周中孚的错误,在于没有详读徐乾学序,也没有阅《曝书亭集》和《居易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 16 更提出朱彝尊不可能掩护高士奇作弊的理由说:“彝尊虽与士奇唱和,而其后为士奇所嫉,中谗免官,必不肯与士奇共同作伪,亦以明矣。”彝尊之序,本为士奇作,然士奇刻本不载朱序,也反映了这种情况。是以朱序仅保

^① 高氏补、续本《编珠》前徐乾学序:“詹事江村高公偕余奉命校勘阁中书籍得之,已逸其后二卷,詹事喜而录之。”朱彝尊《曝书亭集》卷 35《杜氏编珠补序》:“是书余获之中簿,手钞以归,惜阙其半。”

存在《曝书亭集》中^①。何况在内库见原本者，尚有徐乾学、王士禛等，

王士禛的怀疑，实在也是他自己搞错了。余嘉锡纠正他说：

今按，高氏刻本公瞻自序实作“皇帝幸江都日”，不作“隋皇”，王氏钞本偶误耳。《隋书》及《北史》炀帝纪并云：“大业六年三月，幸江都宫。七年二月，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序题大业七年正月，正炀帝在江都之日，无可疑者。

《四库全书总目》三证，自己就取消掉两个：对首证说，“此犹可曰临文不讳，未必尽拘”；对第二证说“此尚可曰一时失记”；第三证是它自以为最坚强的，就是说《乐府解题》乃唐人著作，杜公瞻不能引之。不知隋、唐间解乐府之书数数出，公瞻所引涉及《巫山高》、《战城南》二题，郭茂倩《乐府诗集》卷16引用的唐·吴兢《乐府解题》只于《巫山高》有解，《战城南》则付阙如，安知公瞻所引者非另一《乐府解题》？

特点 《编珠》的前二卷，由于迭遭怀疑，认为不是先唐著作，故其中征引古籍，清代辑佚校勘学者几乎没有加以利用的。余嘉锡首先辨明它不是清初人的伪撰，替高士奇洗刷了冤枉，但还没有从这两卷书的内容来考定其价值，因而也不能解决高、朱、徐、王等人所见的内库底本是否已为南宋以来所造的伪书问题。胡道静作《编珠残二卷引书考》，始知此实公瞻原作，卷帙虽少，而征引古籍文字，尚多出于现存隋、唐、北宋类书之外，清代以来学者因疑而不信，在校勘、辑佚工作中就遗留一点小缺憾。举例言之：卷一山川部引谢灵运《游名山志》云：

^① 李详《媿生丛录》卷2又认为是朱彝尊所弄的玄虚：“文恪（高士奇）盖为朱竹垞所惑也。《曝书亭集·杜氏编珠补序》言‘是书余获自中簿，手钞以归，詹事钱唐高君按其目补之’。”则是没有详阅徐乾学、高士奇两序，又不了解朱、高后来关系恶化那一段情况。

枫林岭、石潭溪、桂林岭，白昼结阴，盛夏凝冰，近山之远，远山之近，有若罗縠映于岩间。俯观木末，仰视星罗。
严可均《全宋文》卷 33 据《初学记》5 及 28，又《太平御览》卷 942 辑谢灵运《游名山志》十二则，没有这一则。

山川部引《徐先生南岳记》宋·徐灵期撰共四则，陈运溶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輿地纪胜》所辑十则见《麓山精舍丛书》第一集《荆湘地记》本徐氏《南岳记》，皆无此四则。

卷二音乐部引《语林》云：

祢衡被武帝谪为鼓吏，正月十五日试鼓击渔阳之曲，渊渊有金石声。

鲁迅辑《古小说钩沉》内《裴子语林》无此则。

再说用于校勘上的例子：章宗源、孙星衍辑杨泉《物理论》《平津馆丛书》本据《太平御览》天部及《事类赋》天部辑有如下一则：

风怒则飞沙扬砾，喜则不摇枝动草。

“不”字乃衍文，复检《御览》、《事类赋》皆衍，然《编珠》卷一所引无“不”字，可据正；又，“草”作“花”。又，仪卫部引《物理论》：

有阮师之刀者，天下之宝。……作刀三年而丧明。刀长不过四、五尺。……

章、孙辑本据《御览》兵部，脱“刀长不过四、五尺”句。

天地部引《吕氏春秋》：“雨云水气。”见《应同篇》今本作“水波”，然《类聚》1、《御览》8 引皆作“水气”，与《编珠》同。

李详《媿生丛录》卷 2 说：“余检核杜氏自注所引，皆无异书，疑是后人伪撰。”如果他真是“检核”了，殊不应得此结论。

《编珠》残二卷的引书据统计为一百九十四种。

版本 《编珠》因高士奇从内库残本录出，增补刊版而传于世。现在我们所见者，即高氏在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刊本 同时并刊自撰之《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唐·韩鄂撰之《岁华纪丽》四卷、明·杨慎撰之《谢华

启秀》二卷，五书版式一致。至光绪中，甘泉宣哲字愚公用铅字排印杜公瞻残书二卷及高士奇《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所据亦为高氏本。内库残本原书究为何时刻本抑钞本，不得而知。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明嘉靖甲戌刊本。然嘉靖无甲戌；嘉靖本《编珠》亦迄无人见过。邵亭著录，当有错误。如果确实有明刊本，则内库原本或为明刊；如果明刊四卷俱全，则原书足本尚当有发见的希望。

（三）《北堂书钞》

在敦煌石室唐写本古类书残卷被发见、《编珠》的真伪问题被澄清以前，金以《北堂书钞》为现存的最早的古类书。虽至今日，由于石室残卷和《编珠》的份量都很小，具有相当规模的古类书仍当推《北堂书钞》为首。《书钞》在清代汉学家治理古籍的工作中，和《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①等类书共同起过重要的作用，是一部很重要的古类书。

《北堂书钞》系虞世南撰。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陈永定二年生，唐贞观十二年卒（558—638）。隋内史侍郎世基弟。父荔，陈朝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世南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仕陈。入隋，大业中为秘书郎。后落在宇文化及和义军窦建德手中^②。唐武德四年〔621〕四月，李世民消灭窦建德后，引为秦府参军，累迁。及李世民即皇帝位，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故后人称为虞永兴）。贞观十二年〔638〕致仕，授银青光禄大夫。卒年八十一，谥文懿。据《唐书·虞世南传》。世南在隋，

^① 隋、唐、宋的这四部类书，在清代被称为“四大类书”，与“唐代四大类书”有别。严可均《书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后》内说：“今陈刻亦渐稀罕，收藏家率购以多金，备四大类书之数”，指此。

^② 唐武德元年〔618〕三月，宇文化及杀隋炀帝于江都。二年〔619〕闰二月，窦建德与宇文化及战，大破之，入聊城，生擒化及，抚存隋之百官，以虞世南为黄门侍郎。

炀帝知其才，嫉其鲠直，一为七品十余年。唐太宗加以赏识，曾说：“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据《书断列传》卷3。

虞世南官显于唐初，算是唐朝人。但《北堂书钞》是他在隋朝大业时为秘书郎所作的，书名上“北堂”二字即反映了这种情况。唐·刘餗《隋唐嘉话》说：

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而《书钞》盛传于世。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清楚地解释道：“《北堂书钞》，唐·虞世南仕隋为秘书郎时抄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北堂者，省之后堂，世南抄书之所也。”袁州本《后志》卷2、衢州本卷1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亦说：“其书成于隋世。”五十六卷本卷46、二十二卷本卷14。因其成于隋世，故书中避隋讳，如“坚”作“牢”、“固”、“劳”、“至”、“刚”或作“永固”，“广”作“阔”、“大”、“博”、“开”等。

虞世南在自己辑录《书钞》之前，曾参加过官修类书《长洲玉镜》的工作。这回是他个人编类书，以准备作文的参考资料。既非参加官修，也不是奉诏命之作。

卷帙 因系隋代的著作，《隋书·经籍志》已著录，并记卷帙为“一百七十四卷”，不著撰人。《唐书·经籍志》类事家：“《书钞》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撰。”《新唐书·艺文志》类书类：“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较《隋志》著录少一卷，可能这一卷是目录，或计或不计。

北宋的《崇文总目》著录亦为一百七十三卷。南宋的《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则为一百六十卷《玉海》卷54引，《宋史·艺文志》同。今本卷帙，与《中兴馆阁书目》同，也是一百六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怀疑今本有阙，说：“其地部至泥、沙、石而毕，度非完帙。岂原书在宋按应作‘北宋’，已有亡佚耶？”缪荃孙则说：“今本非残缺，即并省，

已非永兴之旧。”《艺风堂文漫存·乙丁彙》卷5《北堂书钞跋》。

南宋时陈振孙所藏亦为一百六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纪录是：“《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家一百二十卷。”又似乎晁氏所家藏者只有一百二十卷。或此“二”字为“六”字之误。

部类 《郡斋读书志》说：“《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分八十部，八百一类。”《中兴馆阁书目》则说：“《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分一百六十门。”今本一百六十卷，实数分十九部，八百五十一类^①：

帝王部（22卷/75类） 后妃部（4/26） 政术部（16/46） 刑法部（3/13） 封爵部（3/14） 设官部（31/182） 礼仪部（15/42） 艺文部（10/56） 乐部（8/29） 武功部（14/61） 衣冠部（3/30） 仪饰部（2/15） 服饰部（5/86） 舟部（2/22） 车部（3/25） 酒食部（7/60） 天部（4/25） 岁时部（4/28） 地部（4/16）

《北堂书钞》的类目，举仪饰部二卷为例：

[卷第130 仪饰部上] 鹵簿一 警蹕二 钺三 豹尾四 节五 鼓吹六 髦头七 云罕八 闾戟九 浑仪十 漏刻十一 相风十二

[卷第131 仪饰部下] 玺十三 印十四 绶十五

体制 《北堂书钞》的体制，是在每一个类目（即每一篇）里，把文籍中有关材料汇集起来，每一事摘出句子（句的字数多寡不等），用大字登载，而后把这句文句的出处、上下文以及有关的解释用小字注在下面。注文中有时候还有虞世南自己的案语。例如卷第96“艺文部二·史八”篇：

书契之作，而有史官。《汉书·司马迁传·赞》云云，“其载籍博矣”。掌

^①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8《书北堂书钞原本后》说：“今本起帝王部帝王总载类，迄地部石类，凡十九部，八百五十二类。”所计类目总数多一，误。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彙》卷5《北堂书钞跋》亦同此误。

五帝之书。《周礼·外史》职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明得失之迹。《毛诗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谨案，国史者，书记之官。所以状理，谓之为得；所行乖理，谓之为失。言则右史书之，动则左史书之。《礼记·玉藻》。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云：“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董狐不隐。《春秋左氏》云：“君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明得失之迹”一事的注文中“谨案”以下，就是虞世南的引申之语。

上举的，是今传本《北堂书钞》体例的第一式，还有第二式和第三式。由于《北堂书钞》在明、清刊刻之前，长期是借抄写而流传，造成许多混乱，内容也不一致。但第一式是主要的，从卷第 31 到卷第 49，卷第 51 到卷第 138，卷第 140 到卷第 157 这一百二十五卷都是如此。第二式基本上和第一式相同，只是仅有摘出的句子，而没有注语，或者只简略地注一个出处。例如卷第 8 “帝王部八·务农三十一”篇：

务农重谷。命农勉作。并耕而王，以劝农也。《尸子》。劳农民劝。唯农是务。《国语》。威戒农用。《国语》。纪农协功。兴锄利眠。农天下之本。《汉书》。……

从卷第 1 到卷第 30 这三十卷都如上。必定是注语被抄录者全省了或删削掉大部分，所以形成此式。

卷第 50 “总裁三公”、卷第 139 “车总裁”以及卷第 158 到 160 这五卷，与其余一百五十五卷完全不同。它将文籍中的有关原文引用，径用大字登载。没有摘句，也没有小字的注子。例如卷第 160 “地部四·石十六”篇：

《易归藏启筮》曰：“鲧乃以息壤，以填洪水。”

《易》曰：“艮为小石。”

又曰：“困于石，据于蒺藜。”

又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周易参同契》曰：“吉记提龙虎，黄帝美金华。淮南□秋石，王阳加黄牙。”……

这种方式，和《艺文类聚》的采事部分以及《太平御览》就完全相同，是《北堂书钞》的第三式。今传本《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的体制是不一律的，三式并存着。

引书 《北堂书钞》引用的书籍，据孔广陶的统计，除集部外，约八百多种。每种采用一千几百条至三、二条不等。孔氏曾略仿《太平御览》卷首的《经史图书纲目》例，编出《书钞》所引书目。由于今传本《书钞》有部分类事未经注出书名，孔氏校勘时，遇古书印合，辄录书名、篇目于条下；其互见数书者亦并著之，不过这些因非原记，故并不编入书目。据孔校《北堂书钞》凡例第十一条。然而孔氏编的引用书目，并没有刻在他校刊的《北堂书钞》内，故至今尚欠一个《书钞》引用书目。

《北堂书钞》引书断限，据清代学者严可均生于乾隆二十七年，卒于道光二十三年（1762—1843）。的调查结果说：“所钞之书，皆三代、汉、魏，迄于宋、齐。其最晚者沈约《宋书》、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后魏书》；其诗、赋、颂则颜、谢、鲍为最晚，陈、隋只字不钞。”又总结说：“钞者今世亡其本十盖八、九；其存者，亦流俗写变、残缺误讹，不为典要。”见《铁桥漫稿》卷8《书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后》。

特点 《北堂书钞》撰于隋代，所引经典，是隋前旧本，与孔颖达、陆德明订定诸经之本颇有不同，往往于义为长。清代学者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生于乾隆十八年，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753—1818）。有《明钞本北堂书钞跋》一文载于高阳王重民所辑《孙渊如外集》卷4曾讨论到这个问题：

如引《易》“君子以恐惧修省”作“循省”，引《书》“询事考言，乃底可绩”无“言”字，“播时百谷”作“是”，“笙鏞以间”作“庸”，

“共行天罚”作“龚”，“俊民用章”作“峻”，“敬尔由狱”作“繇”，“率循大卞”作“弁”，“杜乃攫”作“敷”，及“乃”多作“迺”，“攸”多作“廌”，“茂”多作“楸”之属，不独异于开元所改文字，且为隋已前所传旧本。按《史记》述《尚书》“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云，“询事至而言可绩”，则知“底”为“至”，“乃言”之“言”当为衍字，得此书正之。《说文》所载古文如“廌”、“勳”、“敷”之属，亦赖有此，证非字书之改经。又引“其克有勳一迺心”，今《书》无文，唐以前今文《秦誓》尚存，或是篇中语，未敢定之。引《礼记》“青阳左个右个”作“介”。引《左传》“闵子马”作“闵子騫”，按《后汉书·杨秉传》注、《文选·檄吴将校部曲》注俱作“闵子騫”。引“象有齿以焚其身”作“樊”，按，象在樊笼，为人所擒，是也，火焚之“焚”似误。如此之属，足证古经义，不可胜举。

接着又论述其引用子、传诸书古本之胜说：

引子、传，《逸周书》夏箴云：“天有四殃，水旱饥荒。非务积聚，何以备荒？”较今本有韵。如《海内北经》“濮水出鲋鱼之山”，其山正为濮水所经，今本作汉水，地里不合。引《淮南》“积芦灰以止淮水”，“淮”亦大也，或“淫”异字。引《吕氏春秋》“墨者巨子腹䟽”，䟽从“革”，今从“黄”，俱无此字，疑“䟽”为“鞞”省。引《穆天子传》“四徼中绳”，“徼”，边也，胜“彻”字。引“觴于淫池”，“淫池”，大池也，不必“瑶”字。引《风俗通》丙吉断狱事，为今本所阙。引《汉书·宣帝纪》“骨肉之亲，粲然不殊”，有“如淳曰：‘粲’或作‘散’，‘殊’或作‘诛’也。”今本无如淳注，师古注亦甚谬。引《释名》“碑者披也，本葬时所设也”，今本“葬”作“王莽”。此皆足证古本书传与流俗本不同，实为至宝。

陈禹谟刻本 《北堂书钞》与其它几部现存的古类书有个不同的地方：一直到明代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虞山陈禹谟字抱中。嘉靖二十七年生，万历四十六年卒(1548—1618)。刊刻以前，没有过刻本，只是

借钞本流传。此书在北宋初年，已是难得之书，幸赖赵安仁家藏本以传。《宋史·赵安仁传》纪其事云：“安仁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三馆旧缺虞世南《北堂书钞》，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其好学，手诏褒美。”清·陆心源释之云：“五代始有刊板，如《书钞》刊行于五代，真宗时传本必多，何至三馆缺而安仁家独有乎？则必无刊板可知。”《仪顾堂集》卷17《原本北堂书钞跋》。

宋、元两代和明代中期以前，刊刻了很多古籍，也刻了不少类书，但《北堂书钞》还是没有刻本。到明代后期，陈禹谟始于万历庚子校刊，为是书钺版的权舆^①。但是他的校刻本很不好。首先是他所根据的传钞底本脱误颇多，他既不能校讎，又不能阙疑，徒勇于凭臆增删、改动，不脱明人刻书习气。至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旧。其增加各条，幸皆注明“补”字，尚有踪迹可寻；而其所改、所删，就使此书丧失掉应有的作用，并使利用此书者大伤脑筋或误入歧途。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26综括陈氏搀乱删改有六端：（1）原书所引之句与题不甚协者则删；（2）绝无文义可通者则删；（3）其书人人习读无所用注者则删；（4）其书世无传本不复可校者则删，或改引他书；如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则改引范蔚宗书，十八家《晋书》则改引房玄龄书是也。（5）有原本正文而改作小注者，有原本小注而改作正文者；（6）有陈氏所增而未注“补”字者，有陈氏稍加增改而注“补”字者。还有，第50，139，158-160五卷原系大字无注与全书异者，陈氏改从一律，立题分注，遂使原本面目，不可复识。孔广陶校《北堂书钞》凡例第二条更申论陈氏窜乱之弊说：

（1）以今易古 凡四部书之现存者，与本钞辄异，多是古本，或是节引。陈氏必改从今本，动增数行，多则十数行，罕有仍本

^① 《书林清话》卷8《唐宋人类书刻本》篇说：“《北堂书钞》经陈禹谟重刻。”这个“重”字用得不恰当。

钞之旧者。

(2)以存改佚 凡四部书之亡佚者,陈氏多改引他书,如《魏略》改《魏志》,《吴录》改《吴志》之类。

(3)改注文而不改书名 如以范书改《后汉》八家,仍冒称八家;以唐修《晋书》改晋十八家,仍冒称十八家。凡若此类,属目皆是。观卷54“太仆”篇曹褒饴粥一条,是以范书冒彪书,姚鲁偲不知此,遂收入所辑《续汉书》^①卷1。又,卷91“藉田”篇王沐浴一条、庶众也一条、风气和一条,皆是以《国语》韦注冒贾注,汪小米不知此,遂收入所撰《三君注辑存》^②卷1。甚矣陈本之惑人也。

原本的搜寻和书名的窜改 陈刻《书钞》是那样地不可信,使人有“刊刻之功不赎窜乱之过”《四库总目》语感想。至清代考证之学兴,利用《书钞》的时机更多,寻求原本的需要也更迫切。所谓原本,即是陈刻以前的旧钞本(明钞原本)。钞本书不能无误,但是这种错误还有迹可寻,不似经过窜改的,反起混乱、迷惑的作用。

首先得到明钞原本的,是秀水朱彝尊字竹垞。他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得于湖州书贾之手。但是这个本子,书名被书贾挖改写为《大唐类要》。朱说,“反复观之,即虞氏《北堂书钞》也。”《曝书亭集》卷52《大唐类要跋》。此本书名被窜改而内容是原本,陈刻本则书名依旧而内容遭窜改。此本后归于季振宜字沧苇,书名再度被书贾挖改为《古唐类范》^③。至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四月又为吴门黄

① 姚之骊,字鲁偲。清康熙辛丑[六十年,1721]进士。辑有《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内有司马彪《续汉书》四卷。

② 汪远孙,字小米。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卒于道光十六年(1794—1836)。辑有《国语三君注辑存》四卷。三君者:后汉·贾逵、吴·虞翻、唐固。

③ 严可均《书北堂书钞原本后》云:“《古唐类范》为吴县黄尧圃所得,余屡借观。每卷‘古唐类范’四字俱挖补。盖《类范》即《类要》,《类要》即《书钞》,书贾作伪,实是《书钞》原本也。”书贾一再挖改书名的原因,胡道静以为,当时他们并不知原本《书钞》的可贵,见刻本已出,恐钞本难售,故改易书名,冒充另一类书,以致朱彝尊亦反复观之,始知为《书钞》,然朱已认出《类要》的真正价值。

丕烈字莛圃所得。现在台湾。

嘉庆六年[1801]四月，孙星衍字渊如得元末、明初陶宗仪字九成传钞宋本于吴门，为现存钞本中最古之本。此本书名未换。孙去世后为钱唐何元锡字梦华所得。何故后为福州陈征芝字兰邻在道光十三年[1833]所得。同治四年乙丑[1865]由陈归祥符周星诒字季颢。周以重金得此本，其本遂以“千金本”闻名。周亦自榜其藏书室为“书钞阁”。至光绪十年甲申[1884]又为长洲蒋凤藻字香生所得。后又辗转为翁之熹所得。全国解放后，翁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道光五年乙酉[1825]，虞山张金吾字月霄得一旧钞本，书名亦《北堂书钞》，系从明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六月十二日[1546—VII—9]杨梦羽题记收藏本传录，曾经清康熙时曹寅字棟亭收藏。张氏以后，归同里瞿氏铁琴铜剑楼。现藏在北京图书馆。

约在张金吾得本的同时，钱唐汪远孙字小米亦得一本，乃朱彝尊曝书亭所写副本，书名作《大唐类要》。严可均曾于道光十四年甲午六月十三日[1834—VII—19]见之，谓缮写精妙，为朱彝尊、钱曾字遵王所递藏。汪氏振绮堂藏书在咸丰季年[1860—61]损毁甚巨，此本下落不明。

乌程严可均在道光九年[1829]亦从朱世杰得一明初写本《北堂书钞》，朱得于道光五年[1825]。严去世后为周礼堂所得。以后下落不明，可能毁于咸丰、同治间。

严可均校《北堂书钞》，费力甚巨。他在道光九年[1829]撰《书北堂书钞原本后》一文，提出“统计千年来，《书钞》在若存若亡之际，就余闻见，江、浙间实有五本”之语。“五本”即上述五本。更制收藏递遵表如下：

- | | |
|------------------|--|
| 江
浙
五
本 | — 黄尧圃本：朱彝尊(正本)——季振宜——黄丕烈——现在台湾 |
| | — 孙渊如本：孙星衍——何元锡——陈征芝——周星诒——蒋凤藻……翁之熹——北京图书馆 |
| | — 张月霄本：曹寅——张金吾——瞿氏铁琴铜剑楼——北京图书馆 |
| | — 汪小米本：朱彝尊(副本)——钱曾——汪远孙——(下落不明) |
| | — 严氏自有：朱世杰——严可均——周礼堂——(下落不明) |

校本和校刻本 陈刻本不好，因此求陈前钞本。钞本也有缮录之误，因此求得以后需要校。校勘《北堂书钞》实非易事，严可均有“世间难校之书，此为第一”之语。《书北堂书钞原本后》。是项工作，自孙星衍得陶九成写本后，于嘉庆七年[1802]春间在金陵寓邸五松书屋开馆进行，参加者皆一时学人之选，如王石华、严可均、高邮王引之伯申、嘉定钱东垣既勤、临海洪颐煊筠轩、元和顾广圻千里都参预工作，而尤以严可均所费之力为勤。严氏复校卷1—26，132—160，共五十五卷，因为这些卷是陈本窜改太甚的。得督理江西盐法道庐江胡稷砚农的助款，将132—160这二十九卷刊板^①，余卷以助款不至而止槧。

道光间，虞山蒋因培字伯生得孙氏藏陶九成传写宋本的录副，发愿欲校刻之，“以挽乡先辈窜改之失”，在道光十八年[1838]春属同邑老儒黄廷鉴字琴六校勘，借得瞿氏所藏张金吾本和稽瑞楼明钞本互勘，功未及丰，蒋氏去世，剞劂之业遂辍。《第六弦溪文钞》卷3

^① 严氏所复校者五十五卷，而刊刻者只二十九卷。《书目答问》登录：“《校明初写本北堂书钞》五十五卷，严可均校。”举为刻本，实误。严自云：“余竭八、九月之力，校刻卷百三十二起，至卷百六十止。砚农刻资杳不续寄，余遂辍业。”(《铁桥漫稿》卷8《书北堂书钞原本后》)。

《校正宋本北堂书钞跋》。黄氏手校本现在台湾。

光绪初年，归安姚觐元字彦侍亦借得瞿氏藏本，悉心校讎，在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用活字版排印三十四卷于吴门，功未竣而姚氏病歿，事遂中辍。姚氏集福怀俭斋活字本三十四卷^①是：52—54，70，72—76，80，84—86，88—94，96，98—110，也因为这些卷是陈本窜改臆补最严重的，故严、姚先后刻印，都从此等处入手。所惜六十年间，两次刻印，都未完成。

孔广陶校刻本 其间，在粤东却将原本校印完成，即清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南海孔广陶三十有三万卷堂的校注重刊陶九成传写宋本，此为虞氏成书后一千三百年间第一次依照旧本刻印的足本，并加了校注，也是我们今天通行使用的本子。

先是，孔广陶少唐在光绪七年辛巳[1881]从周星诒借得孙星衍、王石华、严可均诸家手校陶九成传写宋本，分五色笔摹录一本。并在孙、严诸家校勘的基础上，与三子并塾师林国赓合力复校。总计《书钞》二万一千余条，校定一万八千余条，其无可校者二千余条，比孙、严旧校，增十之七、八。孔氏总结其校书钞的经验说：“盖校讎之难也，校近书易，校古书难；校完整书易，校未成书难；校现存书易，校亡佚书难。”既深刻体会“非辑佚无以辨存亡，非分汇无以收散漫”，遂毕其功于“校辑并举”。

孔氏的校语作注文，因原书有注，故校语前加“○”并“今案”二字为记。兹举校语数例如下：

[卷第3帝王部三殷忧八]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
圣明。○今案，《类聚》十三引刘琨《劝进元帝表》，“殷”作“隐”。陈本“殷”上无
“或”字。果行育德。○孙氏校“高”改“育”。今案，见《易·蒙卦》。

^① 姚本，缪荃孙说印成百卷，叶德辉《书林清话》说印成七十余卷，皆不确。盖所印各卷，多零星而不连属，见其72—76等卷者，以为有七十余卷；见其98—110等卷者，又以为印成百卷。

[卷第 97 艺文部三博学十二]苞含六艺,游览百家。王逸《折武论》云:“苞含六艺,游览百家。用道德为弓弩,仁义为铠甲。”○今案,张溥《百三家本王逸集》及陈、俞本“铠甲”句皆五字,严辑《王逸集》于“仁”上补一方圈,今从之。博极群书。《玄晏春秋》云:“予常恨不能请命于天,延年累百,博极群书者也。”○今案,俞本同。陈本改引今《晋书》裴楷。

[卷第 158 地部二穴篇十三]周景式《庐山记》曰:“主簿山,在胡郎庙南数里。山下温泉,穴口周围一丈许,涌出如汤沸,冬夏恒热。”○今案,《事文类聚》前集十八引《周氏庐山记》“恒”作“常”,余同。陈、俞本脱。

孔校似较繁琐,然能查明出处的概予查明注出,作为资料用,也颇便于读者。或病其“校者非专门,以校语夹杂注中,阅之令人目眩”。《书林清话》卷 8《唐、宋人类书刻本》。亦非公议。缪荃孙评此本“较之陈本自相天壤,然讹字间或有之;又未得见铁桥刻本”。《艺风堂文漫存·乙丁集》卷 5《北堂书钞跋》。还有其它旧钞原本,亦仍可供校勘之用,孔氏时尚采之未周^①。所以,《北堂书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校理。

① 缪荃孙说:“吴兴张君石铭购得孙藏副本,绵纸明钞。取粤本相校,孙本有而粤本无者亦有数十条。此传本在五本之外者。”傅增湘《跋明写本北堂书钞》说:“近年南海孔氏据渊如本校勘刊行,余曾取家藏此本核之,则其文字异同,亦颇有可供考证者。意当时孔氏僻在岭海,未能汇集众本,以致颇有遗漏。”

第五章

唐代的重要类书

唐代自开国到玄宗时代,除了中宗、睿宗两个很短的朝代外,累朝都用封建国家的力量编纂了一些大规模的类书:高祖时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太宗时有《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五卷;高宗时有《瑶山玉彩》五百卷^①,又《累璧》四百卷、目录四卷^②;武后时有她亲自抓编撰的《玄览》一百卷^③,又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乃依《文思博要》扩充修订而成;玄宗时有《事类》一百三十卷^④,又有《初学记》三十卷。现在只《艺文类聚》、《初学记》二书尚存,《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还有一卷之遗留。

唐代还有不少的文人学士自己编辑的类书,借以储备撰文作诗的资料,如陆贽有《备举文言》二十卷、张仲素有《词圃》十卷、元稹有《类集》三百卷、白居易有《白氏经史事类》一名《六帖》三十卷、于立政有《类林》十卷、温庭筠有《学海》三十卷、皮日休有《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⑤等。今惟白居易的《白氏六帖事类集》又名《白氏六帖》

① 《唐书·文苑传上》：“孟利贞者，华州华阴人也。初为太子司议郎，中宗在东宫深惧之。受诏与少师许敬宗、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龙朔二年[662]奏上之，高宗称善。”《唐书·高宗纪上》：“龙朔三年[663]二月，太子弘撰《瑶山玉彩》成书，凡五百卷。”《唐会要》卷36修撰篇称：“龙朔三年十月二日[663-XI-7]，皇太子弘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进所撰《瑶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诏藏书府。”《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类书类著录，误“瑶”字为“摇”字。

② 《新唐志》著录，注：“许敬宗等撰，龙朔元年[661]上。”《唐会要》作六百三十卷，云“龙朔元年六月二十六日[661-VII-28]，许敬宗等撰《累璧》六百三十卷，上之。”

③ 《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类事家著录，注语说：“天后撰。”

④ 《新唐志》著录。

⑤ 以上均见《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类书类著录，《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类事家则无。按，《唐书·经籍志》以开元时辑录的《群书四部录》为依据，故中唐以后的撰述，皆不能著录。

尚存,与《艺文类聚》、《初学记》共为唐代三大类书;又于立政的《类林》在清末发见唐写残卷于敦煌石室中。

唐、五代有一流行于民间的类书《兔园策府》亦称《兔园策》或《兔园册府》,是唐太宗子蒋王恽命僚佐杜嗣先所作,计三十卷。其书久亡,然清末亦出残卷于敦煌石室。

此外,又有一种小类书——《稽瑞》一卷,在清代中期发见传世,曾在校勘、辑佚工作中起过作用。

依韵编录的类书,在唐代中期之末也开始冒头,便是颜真卿在大历十二年[777]辑成的《韵海镜原》三百六十卷。当在第十章详述之。

(一) 《艺文类聚》

《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撰的。下诏的年份,据《唐书·令狐德棻传》的记载是武德五年[662]^①。受诏参与编修的共十余人,今能考知姓名的有给事中欧阳询、秘书丞令狐德棻、侍中陈叔达、太子詹事裴矩、詹事府主簿赵弘智、齐王文学袁朗等。全书一百卷,以三年的时间编成,据《唐会要》卷36《修撰篇》载,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624-XI-3]由欧阳询奏上。询生于陈永定元年,卒于唐贞观十五年(557—641)。《唐书·儒学传上》说欧阳询在武德时奏上《艺文类聚》后,得赐帛二百段;接着说他“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也证明本书在高祖时已完成。现在书前所载序文,结衔署“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渤海男欧阳询序”,这些衔名应系追改或后人移改的,因为欧阳询的这些官职和爵号全是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才得到的,不可能为武德时原

^① 据《唐书·令狐德棻传》。另《唐书·儒学传上》说:“武德七年诏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奏之。”乃是把诏撰与成书年代混为一谈。

署。若为原署，就得把成书年代拉下到贞观初，这是和事实不符的。

部类 《艺文类聚》一百卷，分四十六部^①，列子目七百二十七。全书约百余万言。部目如下（每部所占卷数及所分子目数附载）：

天部（2卷/13子目） 岁时部（3/21） 地部（ $\frac{1}{3}$ /8） 州部（ $\frac{1}{3}$ /12） 郡部（ $\frac{1}{3}$ /4） 山部（ $1\frac{1}{2}$ /24） 水部（ $1\frac{1}{2}$ /23） 符命部（1/1） 帝王部（4/50） 后妃部（1/1） 储宫部（1/3） 人部（21/58） 礼部（3/20） 乐部（4/13） 职官部（6/43） 封爵部（1/7） 治政部（2/6） 刑法部（1/1） 杂文部（4/15） 武部（1/2） 军器部（1/10） 居处部（4/20） 产业部（2/11） 衣冠部（1/9） 仪饰部（1/5） 服饰部（2/23） 舟车部（1/2） 食物部（1/9） 杂器物部（1/9） 巧艺部（1/12） 方术部（1/5） 内典部（2/2） 灵异部（2/4） 火部（1/8） 药香草部（2/46） 宝玉部（2/13） 百谷部（ $\frac{1}{2}$ /9） 布帛部（ $\frac{1}{2}$ /6） 果部（2/37） 木部（2/42） 鸟部（3/39） 兽部（3/24） 鳞介部（ $1\frac{1}{2}$ /12） 虫豸部（ $\frac{1}{2}$ /15） 祥瑞部（2/25） 灾异部（1/7）

子目举“产业部”两卷的例子如下：

[65卷·产业部上]农 田 园 圃 蚕 织 针 市 [66

卷·产业部下]田 猎 钓 钱

《类聚》的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处。《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云：

^① 《四库全书总目》称“为类四十有八”，《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又称“凡分四十七门”。数字上的歧异，皆由对原书卷81（药香草部上）和卷82（草部下）的算法不同所致。《库目》大约是把药、香、草作为三部计。《燕大目》则明确以“药香草部上”为一部，“草部下”为一部。今因其他各部也有占许多卷的和分上下卷的，但计部数时仍只作一部。为了用统一的标准来计算，81、82两卷只能作为一部计。故共得四十六部。

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读阙一；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惟载高齐；储宫部公主附太子，而诸王别入职官；杂文部附纸、笔、砚，而武部外又别出刀、匕首等为军器一门；道路宜入地部，坛宜入礼部，而列之居处；针宜入器物，钱宜入宝玉，而列之产业；案、几、杖、扇、麈尾、如意之类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饰；疾病宜入人部，而列之方术；梦、魂魄亦宜入人部，而列之灵异；以及茱萸、黄连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鸿之外又别出雁，蚌之外又别出蛤，鹤之外别出黄鹤，马之外别出驹騊，如斯之类，皆不免丛脞少绪。

引书 《艺文类聚》所引用的古籍，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在1923年所作的统计，共为一千四百三十一种。他们辑制了一个《类聚》引用书目，载在《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中。

《类聚》引用书一千四百多种中，现存者不及百分之十。这就是说，它的引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今所不传之书；而其余的不足百分之十的征引，也因其所援用者为唐前古本^①，可用以互校今传之本而有可能纠订其误缪。清代校勘、辑佚学者曾经广泛地利用了本书。

特点 《艺文类聚》在辑存文献的方法、方式上，有一重大特点，和它以前的类书及以后的大多数类书非常不同，从而构成了它自己在类书群中的独特之处，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以往，“文”自为总集，“事”自为类书，正如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中所说的：“《流别》指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其结果是“文义既殊，寻检难一”。欧阳询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新

^① 《艺文类聚》所引《左传》，在卷5里有“昭上”之称，卷35有“僖中”之称，这是由于古本分卷与今不同，当时所传《左传》，僖公、昭公有分卷为上、中、下者。

创体制，事与文兼，汇为一书。他说：“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事前、文后，便是《艺文类聚》每一个子目的体例。他当时的目的，只在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而对后世来说，却具有大量地保存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为其他唐、宋类书所不及。宋·陈振孙因称之为：“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直斋书录解題》五十六卷本卷46、二十二卷本卷14。明·高儒也说：“汉、魏、六朝之文，独赖《文选》，此书之存。不然，几至泯没无闻矣。”《百川书志》卷11。故自晚明以下，冯惟讷辑《诗纪》，梅鼎祚辑《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无不资以为宝山玉海。迨清嘉庆、道光间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网罗隋前文词最备，其取汲于《类聚》的工程，也几乎达到了顶点。

欧阳询创造的这个类书体例，后来宋人的《事文类聚》、清代官修的《渊鉴类函》都摹仿它。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实际上也采取它这两条龙并一条龙的措施。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序》指出本书所收篇章有助于学术研究的事例说：

《艺文类聚》改善了以往类书的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段的缺点，予后人以研究上的便利。例如：殷巨的《鲸鱼灯赋》本书80卷“灯”篇、《奇布赋》85卷“布”篇叙述大秦于晋太康二年[281]《晋书·武帝纪》作太康五年[284]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可补《晋书·大秦传》的疏略；王粲《难鍾荀太平论》11卷“总裁帝王”篇，糜元讷许由36卷“隐逸”篇上、吊伯夷37卷“隐逸”篇下，对“周公致太平”和“隐逸”，都有与当时不同的看法，是研究魏、晋思想史的参考资料。因此，本书在搜辑散佚和研究学术方面，是有相当高的评价的。

缺佚和窜乱 《艺文类聚》一百卷，大体上是完整地保存下来

的。然而中间也不免有些缺佚，并经后人增补窜乱。可能在北宋时便已如此。南宋·叶大庆在其所著《考古质疑》中已指出：“正月十五日”篇有苏味道诗；“洛水”篇有李峤诗；“寒食”篇有沈佺期、宋之问诗；四人皆后于欧阳询，为《艺文类聚》所不能预收。当然是传写窜乱。实际上还不止这四人，如“正月十五日”篇的崔液；“月晦”篇和“洛水”篇中的太宗皇帝（李世民）；“寒食”篇中的李崇嗣；“七月十五日”篇中的杨炯，亦非本书之所能收。那么，这些诗文是从何处窜入的呢？汪绍楹考之说：

我们把《初学记》第四卷“岁时”门和第六卷“洛水”类来比一下，就了然了。原来这几个人的诗文，都是《初学记》“岁时”门和“洛水”类内所收的。不但每篇具在，并且连排列的次序都相同。可能是在宋人刻书时，这些篇已有缺佚，刻书人为了掩饰残缺，就把《初学记》“岁时”门和“洛水”类所收的唐人诗文补进去，以致造成了这个错误。

另外，明季冯舒校《类聚》时，发见“八十五至八十七三卷中，宋本亦杂乱无绪”。清代中期陈揆复校时，乃断言这三卷“似有后人增入处，非率更原书”。

汪绍楹校《类聚》，又发见后人有妄改的严重错误，举“祖”篇被窜改为“社”篇的例说：

还有因对篇目含义不明而妄改的。例如：本书卷5“社”篇，所收类事六条、诗文四篇，皆“行道祖祭”和“正月祖祭”事。其中类事五条、诗文三篇都见于《北堂书钞》155卷“岁时”部“祖”篇中。是本篇原当作“祖”篇，不应作“社”篇。——本书39卷另有“社、稷”篇——正月祖祭之礼，大概是古代民间一个盛大节日。后来汉朝统治者把它附会到阴阳五行上，作为颂扬自己“应运”的工具。在汉后，魏、晋、宋、齐、北魏都还沿用。齐、北魏以后不见于文献记载，可能已并到社日一同举行了。在本书刊

刻时或刊刻以前，校者因不明“祖”的含义，而改“祖”作“社”，造成错误。——改字的人，不但改本卷的篇目，并把篇内各条的“祖”字，一齐改掉。仅《毛诗》的“韩侯出租”之“祖”字未改。大概因《诗经》是人人念的，所以未能改。

版本 南宋绍兴时[12世纪中期]，浙江严州地区曾刊刻过《艺文类聚》，每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二十八字不等。明末时，虞山钱谦益藏有此本，邑人冯舒字已苍，自号孱守老人在崇祯十年[1637]借校一过在陆采刊本上，这个校本流传于世，即所谓“校宋本”。钱藏宋本后来不传，大约已毁于清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火灾。另一印本在清末为浙江藏书家朱氏结一庐所得，解放后归上海图书馆。

明代有六个刊本：(1)正德十年乙亥[1515]锡山华坚兰雪堂铜活字本，每半叶十四行，每行十三字。此本每半叶的直栏原只七行，但每一直栏中是双行排，每为十四行。(2)嘉靖六年丁亥[1527]天水胡缙宗在苏州刊小字本，每半叶十四字，每行二十八字。(3)嘉靖七年戊子[1528]陆采加跋本。即是用胡刊小字版重印而加跋的本子。但版经剗改，字句也有不尽同于胡本处。^①(4)嘉靖九年庚寅[1530]宗文堂书坊刊本。每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八字。卷首欧阳询序后有题记二行：“时嘉靖九年岁在庚寅孟春谷旦书坊郑氏宗文书堂重新刊行。”卷100的末尾，有刻书识语一通，结款题：“明嘉靖九年岁在庚寅宗文堂谨□。”^②(5)嘉靖二十八年乙酉[1549]知

^① 在有些著录中，也称这个本子为“闻人诠刊本”。闻人诠以刊刻《唐书》闻名，而《艺文类聚》，事实上他只参加过这个本子的部分校勘工作，而不是他刊刻的。

^② 这个版刻的流传印本，往往被书贾割去题记及识语的纪年，以冒充嘉靖前的刻本。清末浙江藏书家陆氏丽宋楼收藏一本，也是如此，陆心源遂误定它为元至顺中刊本（见《仪顾堂题跋》卷10和《丽宋楼藏书志》卷59）。据今所知，《艺文类聚》还没有发见元代的刊刻本。又，这个版刻的字体和雕工风格，极似明代中期早年的慎独斋所刊书，由于传本有失去题记及整个识语者，遂被认为慎独斋刊本（如影印宋本《艺文类聚》的前言中所说）。只有浙江图书馆所藏一部，题记及识语纪年俱全，始知为嘉靖九年宗文堂书坊刊本。

山西平阳府事洛阳张松重刻小字本。行款与胡刻本全同，惟前有濮阳苏祐、莆田黄毗、益都郑先溥序，未有张松的重刻后序。(6)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王元贞在南京刊大字本。也称为中字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前有长洲汤聘尹序，未有王元贞跋。

清代只有一个书坊刻本，是光绪五年己卯[1879]成都宏达堂用明·王元贞刻大字本翻雕的，恰恰这个底本是明刻中最坏的一个。

建国以来，中华书局印行了两个本子：(1)1959年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宋绍兴刊本影印；(2)1965年据汪绍楹校勘本排印。汪校本以影印宋绍兴本作底，取冯舒校本、明刊本以及所引用书之有传本者互校。作校记者约一千六百多条，径据明刊本改补者约一千三百多字，两共三千条左右。全书并通体断句。这是《艺文类聚》自有刻印本以来最完善的一个本子，便于学术研究参考之用。而影印本则复制了迄今为止所知的《类聚》最早的刻本^①，同样有利于学术研究参考。

《类聚》有一个旧刻本，是我们迄今尚未查明是什么版本的。清康熙时直武英殿修书何焯字岷瞻，学者称义门先生的《家书》有一则^②说：

前日，武英殿中偶有装订《艺文类聚》一部，第九十二卷鸟类中所采《吴历》改元太元一条，阙了一“鹊”字，要我查补。我归来检所带《艺文》，并无此条，于《初学记》中始查得之^③。不知此书

^① 清·沈涛《柴辟亭读书记》说：“《艺文类聚》兽部引《左传》曰：‘昔有攘羊者，以羊头遗晋·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后三年，攘羊事发，追捕向家，检羊骨都尽，唯有舌存。国人异之，遂以羊舌为族。’涛按，今《左传》无此语。《能改斋漫录》五卷辨误引《类聚》此条以为不记所出，盖询所闻之误。是宋本《类聚》并未标题《左传》。今各本如此，《唐类函》所载亦然，不知误始何时？”按，今检宋绍兴刻本《类聚》此条，果未标所出。《能改斋漫录》是南宋初年吴曾所撰，曾所见《类聚》，正是这个绍兴刻本。明代兰雪堂活字本也还没有标所出，胡纘宗以下本始有之。

^② 这一则家书，是王重民先生告知我的。

^③ 《初学记》卷30鸟第五：“《吴历》曰：‘吴王为神主来立庙苍龙门外，时有鸟巢朱雀门上，又有两鸟衔一鹊置神座前。或得神书，说改元之意，乃改赤乌为太元’。”

亦如《唐文粹》有两部板不同耶？抑我带者系后来板坏修补，妄有删动耶？此不可不审也。

但是宋本也没有这条，各明本亦无^①，不仅是何焯所带之本为然。因此，这个武英殿藏本不知究系什么本子。

（二）《文思博要》；《三教珠英》 ——《海内珠英》

《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类事家：“《文思博要》并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新唐志》作“《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唐会要》卷36《修撰门》说：“贞观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641-XII-3]，尚书左仆射高士廉《文思博要·序》及《新唐志》作“右仆射”申国公 [高] 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百卷。诏藏之祕府。同撰人：特进魏徵、中书令杨师道、中书侍郎高序及《新唐志》作“兼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颜相时、国子司业朱子奢、给事中许敬宗、国子博士刘伯庄、太常博士吕才、秘书监高序作秘书丞，《新唐志》作“左仆射”房玄龄《新唐志》居高士廉后、魏徵前、太学博士马嘉运、起居舍人《新唐志》作“起居郎”褚遂良、晋王友姚思廉“廉”高序作“聪”、太子舍人司马宅相、秘书郎宋正人“人”高序作“时”。”《新唐志》著录下有注，列奉诏撰人十六，较《唐会要》少宋正人，多司文郎中崔行功、秘书丞李淳风。《旧唐志》著录下但注“张大素撰”四字，但那是移写的错误，将前条《策府》的撰者张大素误在此处重复。殿本《唐书》的《考证》说：“《新书》高士廉等十六人奉诏撰，无张大素名，当从《新书》。”这个说法是对的。

《文思博要》包举甚广，片言只语，在所必收。故高士廉撰《文思博要·序》保存在《文苑英华》卷699里有“笼络素则一字必包，举残缺

^① 我查过胡纘宗本、宗文堂本、张松本、王元贞本，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代我查过兰雪堂活字本。

则片言靡弃，□而有检，简而不失，同兹万顷，滕埽自分，譬彼百川，派流无壅”之语。序文又说：

精义穷神，微言探颐。观书贵要，则十家并驰；观要贵博，则《七略》殊致。总质文而分流，混古今而共辙。万物虽众，可以同类；千里虽遥，可以同声。顿天网于蓬莱，纲目自举；驰云车于策府，辙迹可寻。义出《六经》，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则，极圣贤之训。岂止刻石汉京，垂金秦市？比丘明之作传，侔子长之著书。

北宋初年，官修《太平御览》，曾经利用过《文思博要》，其书必全部或大部分存在。但至南渡以后，全书失传，秘阁所存者只第172卷唐写墨迹一卷而已。据《中兴馆阁书目》说：“《文思博要》一卷。大中十年〔856〕，秘书监杨汉公奏，排比乱书，得此书第一百七十二卷墨迹。今藏于皇朝秘阁。乾道七年〔1171〕，录副本藏之集库。”《玉海》卷54引。

南宋藏书家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有《文思博要》，恐亦只有一卷，即从秘阁原本或副本传录者。

南宋秘阁所藏的一卷原本，据清季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卷4书籍门的纪述说：

《文思博要》帝王部一卷，唐类书也。所引书内《荀子》、《慎子》、《尸子》及《三略》、《阴符》及《文选》内诸事皆在焉。又有《苏子》数书，不知何人，皆古书也。天宝十二年〔753〕，背书臣胡山甫，字极適丽，大率如唐人写经手。至唐大中年间，方自馆中杂书中拣出，是时亦止存一卷而已。后用史馆新铸印，及列掌典之人及三校姓名，甚整齐。罨卷皆绍圣间人题跋，如蔡元长、周美成、晁说之、薛绍彭诸人皆在焉。

缪氏说唐大中时“亦止存一卷而已”，应为误解。详《中兴馆阁书目》的释题，只说在排比乱书时得此一卷，并不妨碍当时有另一份或几份全书的存在。

天后武则天时，诏命对《文思博要》作了修订和补充，或《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并目录十三卷^①，较《文思博要》多一百卷并目录一卷。《唐会要》说：“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701-XII-15]，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圣历[698-700]中，以上《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竞”原作“疑”，误，据《玉海》卷54引改、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韦元旦“韦”原作“常”，误，据《玉海》引改、杨齐哲、富嘉謩、蒋凤等二十六人同撰^②。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域“域”原误作“城”，据《玉海》引改等部。”卷36《修撰》。又说：“开元七年[719]九月敕：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卷35《经籍》。又说：“开成二年十月。《玉海》卷54注为十月辛卯朔[837-XI-2]，敕改天后朝所撰《三教珠英》为《海内珠英》。”卷36《修撰》。《新唐志》对最后一事还多一句话说：“武后所改字并复旧。”《新唐书·徐彦伯传》说：“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辞，皆天下选，而彦伯、李峤居首。”《徐坚传》：“坚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等与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弥年不下笔；坚与说专意撰综，条汇粗立，诸儒因之，乃成书。”由这些材料，可了解到以下几件事：(1)《三教珠英》是在《文思博要》的基础上增订的。圣历中所上《御览》及《文思博要》，《御览》当是《修文殿御览》，则《文思博要》当亦是旁依《修文殿御览》而成。(2)《文思博要》等并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部，《三教珠英》补充之，其书之得名亦以此；然至文宗李

① 《新唐志》如此著录。《旧唐志》作“《三教珠英》并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

② 所举名，连张昌宗是二十六人，不连只二十五人。《新唐志》注语约举张昌宗、李峤等十二人，有“乔品”一名不见于《唐会要》，或遗漏者是此人。《玉海》卷54引文下注云：“一本吴少微亦预修。”则遗漏者或又系此人（《新唐书·张昌宗传》：“昌宗入禁中论著，引李峤等二十六人撰《三教珠英》。”可证二十六人是不连张昌宗本人在内）。

昂时,被改名为《海内珠英》,同时,武后所造之字如改“照”作“曐”、改“国”作“囿”等,用于书中者,悉复其旧。(3)编撰《珠英》时,一时秀彦,几皆参加,观其名单可知。张昌宗、李峤挂名总领,实际上是徐坚和张说总其成。后来玄宗时坚与说又成《初学记》,盖已是编纂类书的能手了。(4)玄宗李隆基时,《珠英》已有缺落,曾据目录加以修补。然至南宋,存者只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三教珠英》三卷。《唐志》一千三百卷,今所存者止此。”衢州本卷14、袁州本《后志》卷2。今则一卷不存。

(三)《兔园策府》;《类林》;《增广分门类林杂说》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谓此也。”卷14《考史》。旧、新《唐志》皆未著录;《宋史·艺文志》子部类书类有杜嗣先《兔园册府》三十卷,即此。北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说:“宰相冯道形神庸陋。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蒙童,〔刘岳〕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卷19。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兔园策》十卷,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俚之语。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故有‘遗下兔园册’之谓。”衢州本卷14、袁州本卷3下。由此可知这部类书在唐、五代时流行于民间。杜嗣先撰抑虞世南撰,则自敦煌本发见后,证明是杜氏撰。王国维说:“窃疑世南入唐,太宗引为记室,即与房玄龄对掌文翰,未必令撰此等书。岂此书盛行之际,或并三十卷为十卷,又以世南有《北堂书钞》,故嫁名于彼欤?”《观堂集林》卷21《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吕思勉说:“士大夫之取此书,初盖以供对策之用,后则所重者惟在其俚语而不在其训注,盖有录其辞

而删其注者，故其卷帙止三之一；若写作巾箱本，则并可藏之怀袖间矣。”《燕石札记》（载《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版》1958年第1期）。所说皆有理致。

石室本 《兔园册府》南宋犹存，晁公武家有其书。元代以后，无复述及者。清季，敦煌石室书发见，有《兔园策府》残卷数帙，分别为法国伯希和、英国斯坦因（Aurel Stein）^①所劫去。伯氏所得者为《兔园策府》卷第一，仅存开端的序文十六行，编号P.2573。斯氏所得者为：（1）《兔园策》第一，末有“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了”题记，编号S.614；（2）《兔园册府》，残存《议封禅》、《论天地阴阳者》等三篇，编号S.1086；（3）《兔园翰（？）府》卷第一、第二，编号S.1722。

P.2573一卷，影印入《鸣沙石室佚书》第四册，首行上题“兔园策府卷第一并序”，下题“杜嗣先奉教撰”。王国维考之云：“此本虽仅存卷首，然犹是贞观时写本。序中‘刘君诏问，皆愿治之言’，‘治’字未阙笔，知尚在太宗时。又案《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蒋王恽以贞观十年〔636〕为安州都督，至永徽三年〔652〕除梁州都督，在安州凡十六年。则成书当在安州，而此本乃书成后即传写者。”

阙名古类书 伯、斯二人所劫，尚有不知名的古类书各若干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索引部分，页483—4疑其即《兔园策府》：P.2524一卷内容最多，系册叶装，存十七叶，内包括三十九部，始“王”，讫“神仙”。另有P.4636，S.78，S.79，S.2588四卷，十分零星，但部目及序次都同于P.2524卷。兹以P.2524卷的三十九个部目顺次列下，附注其它四卷互同的部目（就是说，这些卷中也有这个部目）。如果它确是《兔园策府》，则《兔园》的部目面貌，已可

^① 斯坦因是匈牙利人，1907年受英国印度政府之雇，潜入我国甘肃敦煌，盗取石室宝藏。所得文书七千卷，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这里称他为英国，是简便的提法。

为我们所掌握。

王部 公主部 公卿部 御史部 刺史部 县令部 朋友部
人才部 文笔部 勤学部 宴集部 富贵部 酒部 高尚部
贫贱部 送别部 (S. 78) 客游部 (S. 78, S. 2588) 荐举部
(S. 78, S. 2588) 报恩部 (S. 78, S. 2588) 兄弟部 (S. 78) 父母部
孝养部 (S. 78, P. 4636) 丧孝部 (S. 78, P. 4636) 孝行部
(S. 78, P. 4636) 孝感部 (P. 4636) 孝妇部 (P. 4636) 丧葬部
婚姻部 (S. 79) 重妻部 (S. 79) 弃妻部 (S. 79) 弃夫部 (S. 79)
美男部 (S. 79) 美女部 (S. 79) 贞男部 (S. 79) 贞妇部 (S. 79)
丑男部 (S. 79) 丑女部 (S. 79) 闺情部 神仙部

P. 2524 一卷经用珂罗版影印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第五册中。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考论之云：

古类书四百五行，前无书名；末有空行二，亦不标书名卷第。此书之例，亦依事区类。首行标题类名，次按类隶事，集为对偶，由二字至三字；其非对偶者十之三。每条之下，均有夹行小注。舍不采诗文外，略与徐坚《初学记》同。惟注例弗一轨：或详注其事，或并引所出之书，或解字义，或仅云见某书，略与今本《白帖》相似。

以《崇文总目》、晁氏《读书志》及《玉海》所引《中兴书目》证之，惟虞世南《兔园册》十卷，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丽语；陆贽《备举文言》二十卷，摘经史为偶对类事，共四百五十二门；李途《记室新书》三十卷，采掇故事，缀为偶俪之句，分四百余门；略与此书相似。然卷中“治”及“世”“民”字均不讳；各类之中，有“月旦恒娥逐虎”之文，不类唐人所撰。或成于唐末分割之时。观书中所引他籍，“治”或改“理”，“世”或改“代”，则所据之书，仍避唐讳，不得以不避唐讳，疑为唐代以前书也。

注中所述旧事，凡不标所出者，大抵本汉、魏、六朝各史，亦

间本他籍。其标注书名者，或系误引，或经改窜；然所据仍系旧本，有足校经传异文者，有足校史籍异文者，有足校子书异文者，有足校诗文异字者。即非明注书名，考其所出之书，互相勘合，亦足证字文殊异。此均有资于校雠者也。

若夫已佚之书，此书所引，有《齐职仪》一则，《先贤传》三则，《语林》三则，《谯子》一则，《招贤记》一则，《竹林七贤传论》二则，《傅子》一则，《襄阳记》、《三辅录》、《魏略》、《续汉书》、《巴东记》、《幽明录》、《异苑》各一则，《孝子传》四则，谢承《后汉书》、《列女传》、《晋诸公赞》、魏文帝《典论》、《石氏星经》、《神仙经》各一则。其有标注出“王粲宋书”、出“淮南国志”者又各一则。或与他籍所引同，或为他籍所未引，攷拾佚籍，不得不资于斯编。惜乎书名之莫可征也。

兔园策之谓 《兔园策府》在敦煌残卷发见前，久已和现实失去联系，可是“兔园册子”的名词，却甚流传，有时并用以作为通俗的类书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冯道的一个话柄使然。

《五代史·冯道传》说：“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道寻知之，召赞谓曰：‘《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邪？’赞大愧焉。”又，《新五代史记·刘岳传》说：“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回顾。赞问岳：‘道回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耳。’《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大怒，徙岳秘书监。”岳时为吏部侍郎。这也说明了《兔园策府》是一通俗性的类书，而冯道很喜用它，随身携带，出入不离。大概他颇健忘，故备为顾问，仿佛是一袖珍辞书。

类林 《新唐志》类书类所著录的于立政《类林》十卷，久已失传。敦煌石室中发见唐写数本：(1)伯希和劫去，编号P.3956，《类

林》，存“天地第一”至“王第十二”；(2)伯氏编号 P.2678，佚名类书，存“□□第三”、“雷电第四”至“瑞应第十一”，类目同P.3956卷；(3)伯氏编号P.2635，《类林》，存卷8后半、卷9全、卷10之前半，计“书法”等七类；(4)斯坦因劫去，编号S.6011，佚名类书，残存“马第十五”至“市第十九”等五类。合之见以下各类^①：

(钥匙)a=P.3956 b=P.2678 c=S.6011 d=P.2635

1. [卷一]天地第一(a)
2. 日月第二(a)
3. □□第三(ab)
4. 雷电第四(ab)
5. 烟雾(ab)
6. 春(ab)
7. 夏(ab)
8. 秋(a)
9. 冬(ab)
10. 帝德(ab)
11. 瑞应(ab)
12. 王第十二(a)
13. ×
14. □□ (c)
15. 马 (c)
16. 牛 (c)
17. 津梁 (c)
18. 关(c)
19. 市(c)
20. -31. ×
32. 书法 (d)
33. [卷九]善射(d)
34. 壮勇 (d)
35. 音声歌舞(d)
36. 美人 (d)
37. -
38. ×
39. [卷十]祥瑞(d)
40. 灾异(d)

王重民考论 P.2635 卷说：“《类林》残卷，存者卷8之末书法第三十二，卷9全善射第三十三、壮勇第三十四、音声歌舞第三十五、美人第三十六，卷10之半子目残缺，似为祥瑞、灾异两类。以事为类，缀辑古经子史以实之，盖即所以名编之意。《新唐书·艺文志》类书类有《类林》十卷，于立政撰，当即是书。按《旧唐书·于志宁传》：‘子立政，太仆少卿。’《新书·宰相世系表》：‘立政字匡时，太仆少卿，虢州刺史，子大猷。’《金石萃编》卷56有《于志宁碑》，卷63有《于大猷碑》，并称立政官‘尚书吏部郎中、国子司业，太子率更令、渠虢二州刺史、太仆少卿、上护军’，所记仕籍，当得其实。有唐盛时，三原于氏鼎盛。立政父志宁为名宰相，预修官撰群书，别有《谏林》三十卷。则立政此书，盖承家学也。今传世类书，其卷帙较繁、征引较富者，概出官撰；是书取资鸿富，抗衡官家。所征引如司马彪《续汉书》、《晋阳秋》、《晋记》、《赵记》、《蜀王本纪》、《典略》、《新论》、《丹阳记》、《语林》、《帝

^①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索引部分，页483。

王世说》、《续齐记》、《幽明传》之类，今并散佚，则此戈戈两卷书，在今日尤为鸿宝矣。是书写本，虎字、民字缺笔，基字不缺笔，殆写于开、天以前。按于志宁碑立于乾封元年[666]，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谓碑为立政所书，则立政之卒，恐不能下及玄宗之世。则此书之书写时代，距脱稿日固甚迩也。”《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卷3。

增广分门类林杂说 金大定二十九年己酉[1189]，平阳王朋寿字鲁老撰成《增广分门类林杂说》十五卷，由其乡人李子文刊之。据王氏序文说：

传记百家之学，率皆有补于时，然多散漫不伦，难于统纪，故前贤有区别而为书，号曰《类林》者，其来尚矣。惜乎次第失序，门类不备。予因暇日，辄为增广，第其次叙，将旧篇章之中，添入事实者加倍；又复增益至一百门，逐篇裨之以赞，为十五卷。较之旧书，多至三倍。

那么，《类林杂说》一书是根据《类林》扩编而成者，然扩编者并不知其所依以为本的《类林》是何人所作，故泛指为“前贤”。清道光元年[1821]海虞张蓉镜字美川为明钞本作跋，始定为王朋寿扩于立政之书，跋文说：

按《新唐书·艺文志》云：“于立政《类林》十卷。”《崇文总目》同。《中兴书目》云：“唐·于立政《类林》十卷，分五十目，记古人事迹。”观此，则朋寿此书，实以于氏为蓝本。原书十卷，此十五卷。序称多至三倍，盖实多至三分之一耳。①

此书初不甚传于世。清康熙初年，海虞藏书家钱曾有元人钞本，著录于他所撰的《读书敏求记》卷3类家。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未得此书。嘉庆末年，海虞藏书家张蓉镜、张金吾字月霄各得明钞本蓉镜得于二十三年戊寅[1818]，金吾得于二十四年己卯[1819]。金吾锐

① 王氏说“多至三倍”，如确是比较于立政书，也不一定说错。因为不但增益门目，扩充卷帙，并且在旧门目中添益事实，则当然可裨益至三倍。

意搜访金朝人著作，得此论为珍秘。蓉镜借金吾本校勘，知二本同出一源，“想必系俱从大定刊本影写”。后来吴兴刘承干得张蓉镜所藏，在1920年冬刊版，印入《嘉业堂丛书》中，流传始广。这个本子十五卷俱全，但中间也有一些残缺，如卷第一：《孝感篇第二》“陈业”标题下阙注文、“赞”全阙；卷第二：《勤学篇第六》“赞”阙，《勤学篇第七》、《志节篇第八》全阙；卷第六：《贞洁篇第三十二》全阙，《贤女篇第三十三》阙篇首；卷第九：《音乐歌舞篇第五十一》“赞”阙，《壮勇篇第五十二》阙篇首；……等。

据胡道静说，用P.2635《类林》残卷的卷次和类目来和《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的分卷、分门对照，能够证明王朋寿所扩编的底本确实是于立政的书。P.2635存卷八之末、卷九全和卷十之半。今将王书的八、九、十卷门目列下，就能证明王书的第一到第十卷的分卷和分门都是基本上照于书之旧。王书这三卷门目下加圈的，就是P.2635残卷里在同卷之中也有这个门目，不过门目的次第不同这是因为王书有在中间增插的门目，门目名称偶有异文如于书《书法》王作《攻书》、于书《音声歌舞》王作《音乐歌舞》罢了。

[卷第8] 别味篇第45 豪富篇第46 贫窶篇第47 贫达篇第48 攻书篇第49

[卷第9] 善射篇第50 音乐歌舞篇第51 壮勇篇第52 美妇人篇第53 美丈夫篇第54

[卷第10] 丑妇人篇第55 丑丈夫篇第56 长人篇第57 短人篇第58 肥瘦篇第59 怪异篇第60 祥瑞篇第61 歌谣篇第62 王书卷第3的《纳谏篇第十五》和《拒谏篇第十六》的标题下面，都注有“新添”两字，说明这些门目是王朋寿添插进去的。前十卷添插的门目，不止这些，有些大概是刻、钞的时候遗落了“新添”字样。从卷第11起，所有的门目应都是王氏扩增的。

上述的情况，用于P.2635卷全合；用于P.3956, P.2678, S.60

11 各卷则不合,因为这些卷的开头部分为天地、日月、春、夏、秋、冬、马、牛等类,而《增广分门类林杂说》的首两卷门目是:

[卷第1]孝行篇第1 孝感篇第2 孝悌篇第3 孝友篇第4
礼贤篇第5

[卷第2]勤学篇第6 劝学篇第7 志节篇第8 高士篇第9
廉俭篇第10 儒行篇第11

至于P.3956等三个卷子的天地、日月……等门,到《增广分门类林杂说》中已在卷第11及其后了《天文篇第六十三》、《岁时篇第六十四》在卷第11,《禽兽虫鱼篇第一百》在卷第15,并且这是概括性的门目,和P.3956等卷的具体的门目不同。若是王氏书卷第11起的门目为于氏书所本无,则P.3956等三个卷子是否为于氏《类林》,还是个值得追究的问题。据《海隅读书记》。

(四)《初学记》

《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字元固,湖州长城人。官至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封东海郡公。生于显庆四年,卒于开元十七年(659—729)。等撰,是玄宗李隆基时官修的类书。这是一部以知识为重点的类书,兼顾词藻典故以及文章名篇,故编辑体制和一般的类书都不同。它的“叙事”部分似刘宋·颜延之和梁元帝萧绎的《纂要》^①，“事对”部分似《编珠》，“诗文”部分似《艺文类聚》中的第二条龙。可说是吸取其前各种重要类书和准类书体制上的特长,汇并而成。既能丰富知

^① 因为它们富于对事物的解释性。《纂要》并不是类书,但和类书接近。《隋书·经籍志》著录颜书于子部杂家类,和《博物志》、《广志》、《博览》、《古今注》、《珠丛》、《物始》等书列在一起,盖视为解释名物之书。颜、萧的书都已佚,清·任大椿、马国翰和近人曹元忠都有综合辑本,其内容正符于《隋志》的比类。

识，又便于临文时检查事类。它原是为了适应皇子们练习学问上的基本功的需要而编辑的一部百科全书，其得名亦以此。编辑的缘起，在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卷9里有记载：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

进上的年代，据《唐会要》卷36《修撰篇》说：“开元十五年五月一日[727-V-26]，^①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名曰《初学记》，至是上之。[原注]欲令皇太子及诸王检事缀文。”待进上之后二年，徐坚即去世。参预编撰者，据《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类书类《初学记》三十卷下的注语说：“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按《唐书·徐坚传》，“开元十三年[725]，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以坚为学士，副张说知院事。”张说以宰相知集贤院事，为学士之首，故玄宗欲撰《初学记》，独降勅与说；而实际工作，则以副知院事徐坚为首。《唐会要》载张说以下集贤院十八学士之名，《新志》所载《初学记》撰人，多在其中，惟无施敬本、张烜、李锐三人，盖后来入院者。说本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部类 《初学记》三十卷，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个子目。部名及每部所占卷数、所分子目数如下：

天部(2卷/15子目) 岁时部(2/18) 地部(3/26) 州郡部(1/11) 帝王部(1/1) 中宫部(1/2) 储宫部(1/2) 帝戚

^① 《玉海》卷57引《集贤注记》载撰成年份为开元十六年正月，宋·周必大《承明集》卷7引柳芳《唐历》载撰成以献年份为开元十四年三月，宋·钱易《南部新书》王卷载进上年份为开元十三年五月，与《唐会要》皆有出入。然十三年集贤院方成立，恐无成书进上于是年之可能，“十三年”或为“十五年”之误。

部(1/3) 职官部(2/32) 礼部(2/18) 乐部(2/15) 人部(3/20) 政理部(1/11) 文部(1/9) 武部(1/11) 道释部(1/8) 居处部(1/15) 器物部(1/16) 服饌部^①(1/17) 宝器部花草附(1/16) 果木部(1/18) 兽部(1/15) 鸟部鳞介、虫附(1/14)

部下子目,举人部三卷为例:

[卷第17·人部上]圣一 贤二 忠三 孝四 友悌五 恭敬六 聪明七 [卷第18·人部中]师一 交友二 讽谏三 贵四 富五 贫六 离别七 [卷第19·人部下]美丈夫一 美妇人二 丑人三 长人四 短人五 奴婢六

体制 《初学记》每一子目内均分“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已如前述。特别要说明的,是“叙事”部分是经过精心编撰的,和其它类书的“类事”不同。其它类书,只是把征集的类事,逐条抄上,条与条之间,几乎没有连系,因此仅仅是个资料汇辑的性质。《初学记》的“叙事”部分,虽然也征集类事,然而经过一番组造,把类事连贯起来,成为一篇文章,对子目标题来说,等于是作了一番源源本本的说明,更为近似现代百科全书的作法,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更富于知识性的。《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可以说是道着了此书的好处。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司马光《续诗话》和孔平仲《谈苑》卷5都记载中山刘子仪爱其书,说:“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可知旧时对此书之重视。

举卷第5·地部上·总裁山第二的“叙事”为例:

【叙事】《国语》云:“山者,土之聚也。”《尔雅》云:“土高有石曰山。”《释名》曰:“山,产也。言产生万物。”《说文》云:“山,宣

① 这一部的标题,是据安国本和严可均校。古香斋本和新排校本作“器物部”,与前一部名重复,但又不分标“上”、“下”。按这一部的内容看,包括服饰和食物,则题“服饌部”是正确的。且亦必须如此,方符二十三部之数。

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也。”《韩诗外传》云：“夫山，万人之所瞻仰。材用生焉，宝藏植焉，飞禽萃焉，走兽伏焉。育群物而不倦，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乐山也。”《释名》云：山顶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冈。山大而高曰嵩，嵩，高称也。今中岳嵩山盖依此。亦作“崧”。小而高曰岑，锐而高曰峤，卑而大曰扈，小而众曰岵，上大下小曰嶽。……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夔，亦曰跂，亦曰云阳。祭山曰廋悬。自“山顶曰冢”已下，并出《说文》、《释名》、《尔雅》三书。

版本 《宋史·西蜀孟氏传》：“毋守素，父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守素赉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1016]，子克勤上其板。”这是《初学记》的极早刻本，到后来成为北宋的官板。但其印本久已无传者。

据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说，其国枫山官库有北宋刻本《初学记》，流传情况不明。清宫的善本书著录《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有宋本《初学记》，据故宫博物院的查核，乃是明代安国的复宋本。见《故宫善本书目》。清·严可均说：“嘉庆初，王兰泉少寇王昶也，青浦人。得宋版大字本，丙寅[嘉庆十一年，1806]春，孙渊翁孙星衍渊如也。借得之，以示余。”这个宋本实际上是元刻本而非宋刻本。日本宫内省书陵部旧称图书寮有南宋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余四十三郎宅刻本。每半叶十二行，每行大二十二字至二十四字不等，小三十字。前有绍兴四年岁次甲寅正月上元日[1134—II—10]福唐刘本序，序每半叶九行，每行十四字。序后有“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将监本写作大字，校正开雕，并无讹谬，收书贤士幸详鉴焉。绍兴丁卯季冬日谨题”木记四行。见《书舶庸谈》卷3。据此，余氏刻本前，有监本，有福唐刘本序刻本。明刻本的刘本序，结衔在“福唐”字前多“右修职郎建阳县丞”八字。严可均所校宋版大字本（实系元刻本），也没有这八个字。

严可均说：“乾隆末，有书贾以黑口小字本求售者，盖元版也。嫌稍漫漶，索值过多，还之。既而悔之，不能复得。嘉庆初，王兰泉少寇得宋版大字本。”所谓宋版大字本，实系元版。则严可均曾遇两个不同的元刻本。孙星衍据说也得一元刻本，《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卷1载：“《新刊初学记》三十卷，前有绍兴四年福唐刘本序。末卷后有题云，‘《初学记》三十卷，宋后刻于麻沙’下尚有字，书贾已剗去。据此，则此本为元时所刻。黑口版，每叶廿行，行廿字。”据胡道静说，这个本子实际上是明嘉靖宗文堂刻本，识语的下文被书贾剗去，冒充元刻，孙氏上了当。严可均曾见的元刻黑口小字本，有可能也是被冒充的宗文堂本。见《海隅读书记》。

明代有九个刻印本：(1)嘉靖初年，锡山安国字民泰，号桂坡。好蓄古图书，铸铜活字印书。得宋本《初学记》，缺七卷半卷7、卷10、卷21至25、卷30的后半。（这是活字本卷中所载的。见《郎园读书志》卷6。）即用铜活字排印，每半叶九行，每行十八字。流传甚少。(2)安国旋属其塾师郭禾将缺卷补完，在嘉靖十年辛卯[1531]用木板雕行，行字和先印的活字本相同。书首有秦金序，介绍安国刊书情况书口有“桂坡馆”字样。此本流传甚广，许多明刻本均从此出。但底本缺卷、残字经臆改、臆补，大失本真。明·陈大科刻本自序说：“南国一妄男子，谬以其意损益之，至窜入宋事什二、三。”即指安刻而言。但陈刻亦出于安刻，并无所胜。故安氏有功于本书，亦有过于本书。(3)同一年[1531]晋陵杨铨九洲书屋重刊安国本，行字同。(4)嘉靖十三年甲午[1534]，晋藩虚益堂翻刻安国本，行字同。(5)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宗文堂刊本。第30卷后有跋说：“《初学记》三十卷，宋后刻于麻沙。今岁书林郑逸叟再购，以板其书。……以钞本而贗字残简为多，献观于予，予謏隘弗敢讎也。……时嘉靖丙申[十五年，1536]冬，壶云子后跋。”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11。因此知孙星衍所谓曾得元刻本，实系书贾剗去跋语后部以冒充者。宗文堂刻本的《艺文类聚》也有相似

的遭遇,见前。此因宗文堂刻书字体,颇似元刻。然熟于版本者,见即能辨。并知其底本为一钞本,且误字残简为多,然未经擅改,反胜于安刻之据宋本而窜易者。(6)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沈藩刻本,源出安刻。(7)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太学徐守铭宁寿堂以安本复刻,前有茅鹿门序。(8)万历二十五年丁酉至二十六年戊戌[1597-1598]扬州陈大科刻本,源出安刻。(9)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虎林沈宗培刊巾箱本,源出宁寿堂本,前亦载茅鹿门序,而截去序文的后半,借名以行。又分卷改为三十二卷,装成六十四册。每类诗赋,有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增入者。所谓每下愈况,更失本真。

清代有乾隆时内府古香斋刻巾箱本,其底本未经交代。据杨守敬说:“古香斋本似以安国之卷第,而据沈氏为底本。”因为它的卷第是三十卷,而安本之误字经沈本改正者又依从了沈本。1918年,书贾江左书林以古香斋本影印,经过剪贴,化为中型的本子,不再为巾箱本的形式。

建国以来,有中华书局在1962年1月出版的排印校订本。司义祖校。以古香斋本为底本,断句照印。逐卷末附校勘表,罗列严可均、陆心源两家校录的异文。第二十五卷以后,有几段严、陆所见本与安刻及古香斋本绝异,无法列表,则另外照排,附在各该卷校勘表之后,首尾注明接某页某行,以便参读。是本书最切实用而校订完善的版本。

校本 从明代中期以降,《初学记》流行的版本大致上都出于安氏桂坡馆刊本。而安刊底本有阙,经过臆补,失去本真,所以清代学者利用本书时,即思觅旧本校正。嘉庆十一年[1806],乌程严可均借得宋本(实系元刻),取以校核宁寿堂本,迄二十年[1815]而写成清本,为用力于校勘《初学记》之勤劬者。严氏自记其经过于《书初学记校宋本后》载《铁桥漫稿》卷8云:

嘉庆初,王兰泉少寇得宋版大字本。丙寅[十一年,1806]

春，孙渊翁借得之，以示余。余案头有徐本，取与对勘。开卷见刘序“刑名度数”宋本“刑”作“形”，“形名”犹言名物，改便失之。因竭四十日力，得互异字纍万，用丹笔悉注于徐本之旁。宋有而徐无者，注于上方。宋无而徐有者，注于下方。……卷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二十二叶，宋与徐绝异，皆安国所据本之阙叶而郭禾补足者也^①，不能对勘，别写之夹置之各卷中。……渊翁劝余审定，乃取校本常置案头，渐加抉择，十得二、三。至乙亥〔二十年，1815〕夏，始以净徐本录取其长，仍其疑似。若讹谬灼然者，置不复载。宋本之善不尽此而尽于此。嘉庆二十年七月五日〔1815—VIII—9〕严可均书于冶城山馆。

严校原本，现在台湾。临录本曾有好几部，北京图书馆现藏有胡景潮临录本底本也是宁寿堂本和傅增湘临录本底本是桂坡馆本^②。

清光绪时，归安陆心源字伯刚。即著名藏书楼丽宋楼之主人。曾得孙星衍旧藏的元刻本《初学记》（其实是明宗文堂刊本；又，陆氏以为这是严可均曾校之本，新印的《初学记》出版说明又以为是“王昶藏本后归陆心源”，皆非），曾作校记；又得见严氏所校，乃合写成校记八卷，刻印入其所撰《群书校补》卷50至57中。今新印本《新学记》已采取入逐卷后的校勘表中。

清光绪时，宜都杨守敬对《初学记》亦曾下过校勘的功夫读《日本访书志》卷11《初学记》两篇可见，惜无校记遗留。

窜乱与谬误 安国刻本对底本缺卷有所臆补，这是另一回

① 这里所说的安国所据本的阙卷，与安氏活字本书中所记的阙卷不同。严氏并没有看见安印的活字本，故知其底本有阙而不知所阙果为何卷。看来，26、28、29各卷的“绝异”，当另有原因。

② 日本《静嘉堂秘籍志》卷29著录明·安国刊本《初学记》一部，说：“刘本序后有：‘嘉庆二十年六月初二日〔1815—VII—8〕严可均依青浦王述庵少寇所藏宋刊大字本校于孙氏冶城山馆。’”按，这个校本也是临录本，因为严氏亲笔所校系在宁寿堂本上，亲笔所写清本在另一宁寿堂本上，都不是在安国刊本上。

事。《初学记》三十卷的传本，大体上是徐坚的原书，似无问题。但也有被窜乱的痕迹，学者多举其不应载扬雄《凉州箴》、《润州箴》为说：

清·陆以湑《冷庐杂识》卷4：“扬子云《十二州箴》，冀、兖、青、徐、扬、荆、豫、益、雍、幽、并、交是也。《初学记》所载，多凉、润二州。其《润州箴》云：‘蒋庙钟山，孙陵曲衍。江宁之邑，楚曰金陵。吴、晋、梁、宋，六代都兴。’此皆汉以后事，岂得谓子云所作？徐公硕儒，当不若是之舛，或其书为后世妄人所增，有是误耳。”

清·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甲集：“《扬雄传》云：‘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晋灼以为‘九州之箴’。按，扬雄《州箴》惟见于《艺文类聚》及《初学记》所引。《艺文类聚》凡十二州，曰冀、扬、荆、青、徐、兖、豫、雍、益、幽、并、交；《初学记》又有凉、润，凡十四州。皆不止九州，则晋灼所言误矣。惟雄时无凉、润二州，则《初学记》所引亦误。《能改斋漫录》徒以‘蒋庙’、‘孙陵’辨《润州箴》非雄作^①，尚未尽也。今古香斋所刊《初学记》于《润州箴》去‘扬雄’字，只作两方围，盖因能改斋之说；于《凉州箴》则仍刊‘扬雄’。”

“后人窜乱”，当然是有可能的；但说“徐公硕儒，当不若是之舛”，也不一定。徐坚自己也会出错；类书杂出众手，有错更不是徐坚所能完全包得下来。《初学记》的乖失之处，唐代末年已有人在议论：

唐·李匡义《资暇集》：“《初学记》月门以‘吴牛’对‘魏鹊’，魏鹊者，引曹公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为据。斯甚疏阔。汉武《秋风辞》云：‘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今月门既云‘魏鹊’，则风

^①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9地理门《蒋庙钟山孙陵曲衍》条，首辨《润州箴》非扬雄所作。又，严可均校《初学记》，在“汉·扬雄《润州箴》”条下说：“此箴非扬雄所作也。润州，唐武德三年[620]置。疑杨师道或杨炯，当考。”

事亦可用‘汉雁’矣。若是采掇文字，何所不可？东海徐公，硕儒也，何乖之甚！”

《四库全书总目》评《初学记》说：“然不以一眚掩其全书。”这应该是持平之论。

(五) 《白氏六帖事类集》；《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孔氏六帖》；《唐宋白孔六帖》；《六帖补》

“白氏六帖”——也简称“白帖”，是唐代中期著名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大历七年生，会昌六年卒(772-846)为积聚写作的材料而自编的一部类书。据《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类书类载：“《白氏经史事类》三十卷 [原注]白居易。一名《六帖》。”则其原来名称为《白氏经史事类》，而又有《六帖》的别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引《醉吟先生墓志》云：“又著《事类集要》三十部，时人目为《白氏六帖》者是也。”及至南宋初年，孔子的裔孙孔传仿其书作《六帖新书》被称为《孔氏六帖》——也简称“孔帖”，白的原著遂被加上“白氏”的符记而称为“白氏六帖”。南宋季年，两书被混合刻在一起，变为一书，又被题名为《唐宋白孔六帖》——也简称《白孔六帖》。有一段时期，白氏原著的单行本几乎无人看见，后来有两种宋刻本发见，题名是《白氏六帖事类集》或《白氏六帖类聚》，这应看作为白氏书刻本的正式名称。

白氏原著的注文很为简单，也不注出处。宋人将其出处一一考注，这个宋刻本也经发见，它的题名是《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加注者据考查是北宋人晁仲衍。

晁仲衍也补续过白氏的书，名《事类后集》，已失传。孔传的补续为《孔氏六帖》，如前述。南宋季年，又有杨伯岳的补续，名《六帖补》。由于这都是“六帖”一个系统的类书，现在并作一起来谈。

白居易的“卡片箱” 白居易撰集《六帖》，有一段故事。据北

宋·黄鉴所撰记杨亿言谈的《杨文公谈苑》说：“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①，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钞录成书。故其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宛委山堂本《说郛》卷16引。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载此事而不记所出。这是说的白居易编纂类书的方法，他用了很多的陶瓶，每瓶作为一个门类，类名标记在瓶上，将采集所得资料，按类投入瓶中。很明显，白居易的陶瓶，就象我们今天搜集、积聚资料时用的卡片箱一样。但不能象我们的卡片那样有次序罢了。

六帖命名的意义 《六帖》本是《白氏经史事类》的别名，但后来却通行。即仍用本名者，亦架用别名，例如《白氏六帖事类集》。所谓“合本名、俗名而署之”者。“六帖”是什么意思呢？据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2的解释说：

白乐天作类书名《六帖》。《通典·选举门》载唐制曰：“开元中，举行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此《六帖》之名所从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数以名其书，期于必遂中选也。

《六帖》的命名，是否确与帖经之法有联系，也很难说。《四库总目》不同意这种说法，驳议之谓：

然此书杂采成语故实，备词藻之用，与进士帖经，绝不相涉，莫详其取义之所在。大昌所说，殆亦以意附会欤？

《总目》认为《六帖》之作，是备词藻之用，这是对的。清·王士禛乃以为“白乐天作《六帖》，本当时科举之书”《带经堂集》卷71《白孔六帖跋》，那是不对的。但是，当时科举人取以为帖括之用，因而得此别称，段玉

^① 《四库总目》引用的，“数千”作“数十”，非是。《六帖》的子目达千数以上，不是几十只陶瓶所能包容的。几十只陶瓶，也不用七层架来装置。《郡斋读书志》也作“以陶家瓶数千”。

裁《经韵楼集》卷8《跋白氏六帖三十卷宋本》说：“《六帖》者，盖科举人以为帖括之用而名之。”这又是可能的。

近人傅增湘字沅叔，江安人又有一种新的解释，据说这个名称是因为原分六帙而来。他得南宋绍兴刊本《白氏六帖事类集》一部，版心记册数凡六：卷一至四署“帖册一”，卷五至八署“帖册二”，卷九至十二署“帖册三”，卷十三至十八署“帖册四”，卷十九至二十四署“帖册五”，卷二十六至三十署“帖册六”。乃从而为之说曰：

全书汇数卷为一册，至册六而终。意当目标为“六帖”，正取此义。《四库提要》乃引程氏《演繁露》“唐人科试帖经之制，得五，得六为通”以证，其说殊为迂滞^①。当由作者未见此本，不免望文生训，以傅会其名。

顾余窃有疑者，昔陆存斋《皕宋楼藏书志》载《白帖》一部^②，号为北宋仁宗时刊本，据《志》言行款、大小字数，与余此本正同，惟标名为《六帖类聚》，分帖为十有二，独为差异耳。嗣余己巳[1929]东游，登静嘉堂，入文库披观原书^③，则刊工方雅，字抚率更，亦罔不与余本酷肖，且检其书名仍标《事类集》，审其中缝，亦止帖册六，篇中“构”字已书“御名”，是与余书实即一板刻所印^④，初不解《仪顾题跋》所举《类聚》之名与十二帖之数何自而得？大抵存斋锐意收书，志力闳伟，时或炫奇侈博，而鉴别未尽精能。……今此书繙检未周，第见其字体端严，刊工朴厚，悬断为

① 实际上，《四库总目》并没有同意《演繁露》的说法，而是反对它的。

② 陆心源（存斋）《皕宋楼藏书志》卷59著录《白氏六帖类聚》三十卷一部。又，陆所著《仪顾堂题跋》卷8有《宋槧白氏六帖类聚跋》。

③ 皕宋楼的藏书，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日本三菱系财阀岩崎兰室全部购去，入藏于东京江户静嘉堂文库。

④ 傅氏的《静嘉堂文库观书记》也这样说：“《白氏六帖类聚》三十卷。按，此本与余藏本同壹版刻，避讳实至‘构’字止。陆氏定为北宋刊，非也。中缝记‘帖一’至‘帖六’，与白氏原书合，陆氏言‘至帖十二’，亦误。”

仁宗时^①刊本，要不足诧也。异时将驰书长泽君^②，发篋重阅，详核终篇，历究标题、分帙、缺笔诸端，倾怀语我，庶一决此疑讫乎？（见影印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跋）

陆心源的藏书纪录，往往有浮夸、谬误之处，这是事实。但《白氏六帖类聚》一书十二帙的纪录，是否竟如傅氏所说的失实呢？如果失实，即可证明傅氏认为《六帖》之名由六帙而得为确凿。无奈傅氏虽亲见其本，不知如何竟产生了错乱。这个本子确实是分十二帙^③，并且行款并不与傅氏的藏本完全相同。换句话说，这个本子和傅氏所藏本并非“一板刻所印”。陆氏的这个纪录没有错，倒是傅氏自己搞错了。在傅氏的跋语之后，有陈乃乾所作的识语纠正之说：

陆氏旧藏今归静嘉堂文库者，行格与此不符；版心记“帖册一”至“十二”，不作六册。日本·长泽规矩也君尝取以印入《善本书影》中。兹影印陆本一叶于卷末，览者得参验焉。

所影印的一叶，是卷22的一叶，属于“帖十”；题名也署《白氏六帖事类集》，并不称为《白氏六帖类聚》，但行款与傅氏藏本微有不同。那么，《六帖》之名不能象傅氏那样来解释，是很明显的，也是必须辨清楚的。

白帖的体制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六帖》三十卷条下说：“唐·白居易撰。以天地事物分门类为对衢州本“对”作“声”偶，而不载所出书。”袁州本卷3下、衢州本卷14。它是采取唐以前的经传百家书中的典故，词藻和诗文中的佳句，分门辑录。计分一千三百六十七门。概为子目，不以部、类统率，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有所不同。内容多少与《北堂书钞》相象，但比《书钞》更为零散琐碎，

① “时”字原脱，今补。

② 长泽规矩也，时任静嘉堂文库长。

③ “帖一”至“帖六”每册两卷，“帖七”至“帖九”每册三卷，“帖十”为卷22—23，“帖十一”为卷24—27，“帖十二”为卷28—30。

并且不注出处。《四库总目》说：“其体例与《北堂书钞》同，而割裂钉，又出其下。”举《白氏六帖事类集》卷第1《天第一》门的开头部分如下：

高明柔克高明，天也。柔克，寒暑不干。阴隲 下人言天默定下人之命。
天尊地卑。 成象在天成象。 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 天行健 资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上浮为天 下降天气下降。 高远穷高极远。 贞观天地之道。 无私不息者天。 清明象天。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不可阶而升 天秉阳垂日星。……

上面的例子，都不举出处，与《郡斋读书志》所说原著“不载所出书”符合。但是，这个本子有些地方也夹杂着注出处的，例如卷第1《月第四》门：

牛喘 《世说》：“吴牛见月而喘。” 鹊飞 魏武帝歌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恒娥 羿妻，窃药奔月，乃为月中仙。 丽天日月丽乎天。……

其偶有标记出处的，当为刻书之时或刻书前所混入。因为到南宋绍兴刊刻《白氏六帖事类集》时，早已有加注出处的《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了。《添注出经》是逐条有注，注得够详细。《事类集》只是偶有出处，或者是据《添注出经》增入；仍不当说白氏原书注有出处。

宋绍兴间明州刊版的《白氏六帖事类集》三十卷一部，近代藏书家傅增湘得于1923年8月，旧为南皮张之洞家物。此本刷印，已到宋宁宗嘉定时。1933年影印时，监印人陈乃乾发见前三册纸背有嘉定六年至八年[12-15]鄞江盐税酒税公牒文字而知之。至1933年5月，吴兴张芹伯借傅氏藏本影印一百部，白氏原著单行本，乃得复行于世。

另一宋刻本名《白氏六帖类聚》，三十卷，亦原著单行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已如前述。

白帖门目 前面讲过，《白帖》分一千三百六十七门，这是不包括“附门”的。《白帖》有许多门有附门，附一门或数门。举卷24书题后所列门数、门目如下：

《白氏六帖事类集》卷第二十四凡四十三门，内二十一门附。

商贾 一守业、通商、抑商、市籍附 市 二市侩、货殖、屠、杂买卖、互市附
榷酒三 算缗四 百工五守业、考课、奇巧附 材木六 胶皮七 染
八 练九 金冶十 陶十一 陶瓦十二陶器附 土工十三计料、顺
时、不时、劳苦附 开凿十四 傭赁十五 负担十六 舂十七
碓附 债负十八 賒贷附 契券十九 乞假二十 遗物二十一
利二十二禁利、兼并附

全书三十卷，总共一千三百六十七门，附五百零三门；正附合计为一千八百七十门。逐卷正、附门数如下：

卷一(93 门/内 40 门附) 二(91/13) 三(74/43) 四(70/
25) 五(54/19) 六(83/43) 七(67/34) 八(79/26) 九(62/
21) 十(41/6) 十一(36/0) 十二(94/17) 十三(75/8)
十四(48/3) 十五(99/18) 十六(39/8) 十七(47/17) 十八
(37/7) 十九(76/25) 二十(52/7) 二十一(116/23) 二十
二(28/1) 二十三(65/6) 二十四(43/21) 二十五(21/12)
二十六(61/0) 二十七(16/2) 二十八(55/28) 二十九(113/
29) 三十(35/1)

《白氏六帖事类集》除每卷之前详列本卷的门数、门目外，首卷前面又有总目一叶。这个总目，有时是抽举本卷的重要门目(如卷第1)，有时则是概括为部目(如卷第21)，措置不一。总之，不能视为统率一千三百六十七门的部、类目录。然而由于它比较能反映全书的门目内容，故录之如下：

[卷第1]天、地、日、月、星辰、云、雨、风、雷、四时、节、腊

[卷第2]山、水、川泽、丘、陵、溪、涧、江、河、淮、海、泉、池、
宝货、布、帛

[卷第3]京都、邑居、道路、郊、野、封疆、馆驿、楼、阁、仓、
库、舟、车

[卷第4]衣服、印绶、刀、剑、器物、裋褐、笔砚、纸、墨

[卷第5]醕榷、饮食、酒、肉、醯、醢、茶、盐、蜜、酪、米、面、柴、草、菜、炭

[卷第6]宗亲、奴婢

[卷第7]人状貌、贵贱、隐逸、杂举措

[卷第8]孝行、情性、忠、义、智谋、仁、信、贞、俭、恭慎、傲慢、勇、壮

[卷第9]言语、视听、律吕、医、相、书、算、卜筮、图画、方药、博弈

[卷第10]宾、旅、干谒、朋友、推荐、离别、赠贖、庆贺、馈遗、奉使

[卷第11]帝德、朝会、宫苑、皇亲、制诏、图书、表奏、对见、谏争

[卷第12]理道、清廉、贪污、暴政、威名、俸禄、举选

[卷第13]刑法、断狱、拷讯、议讞、改制、赃贖、冤狱

[卷第14]赏赐、战功、谏臣、田宅、车服、杂器物、封建、嗣荫

[卷第15]军旅、出征、战阵、训练、救援、献捷、伏兵、险阻、戎狄

[卷第16]资粮、屯田、用兵、戎服、兵器、险固、防备

[卷第17]礼仪、享宴、冠礼、乡饮酒、上寿、养老、致仕

[卷第18]乐、制乐、知音、六代四夷乐、杂戏、歌、舞

[卷第19]丧服、殡敛、祭奠、哭、踊、吊、葬、坟墓、忌日

[卷第20]祭祀、蒸荐、宗庙、木社、地祇、释奠、杂祀

[卷第21]职官

[卷第22]户口、征赋、贡献、储蓄、均输

[卷第23]劝农、开垦、耕耘、收获、农器、百谷、丰稔

[卷第24]商贾、功巧、材木、胶皮、染、练、金冶、土工

[卷第 25] 畋猎、陷阱、纲罟、射

[卷第 26] 文、武、三教

[卷第 27] 鬼神、祷祀、妖怪、变化

[卷第 28] 叛乱、寇贼、谄佞、仇怨、黜辱、妖讹、咒诅

[卷第 29] 鸟、兽

[卷第 30] 草木、杂果

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 这是北宋人加注出处的本子，久亦不传于世。清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金坛段玉裁著名的《说文解字注》的作者始得本于江宁书肆。段氏在嘉庆十四年[1809]追记其事云：“乾隆甲辰，余于江宁承恩寺书肆，廉其为宋板也，以玄丝二定得之，不甚重之也。乃以赠王兰泉少司寇王昶，亦不之重也。余偶以告周明经漪塘 漪塘名锡瓚，字仲涟，又号香严，卒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漪塘曰：‘嘻，世所希有也！’索诸兰泉而得之，遂为漪塘物。”《经韵楼集》卷 8《跋白氏六帖三十卷宋本》。

注本上并未载明撰人姓名，然则这些添注的出处，是谁人所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说：“《六帖》不载所出书，曾祖父秘阁公为之注，行于世。”周漪塘考出晁公武的曾祖父为晁仲衍字子长，家开封之昭德坊。祖迥，父宗慤。初以祖任将作监主簿，召试西掖，赐进士第七。迁至祠部员外郎。召试禁林，充秘阁校理。除京东提点刑狱。大中祥符五年生，皇祐五年卒(1012-1053)。周氏写给段玉裁的信说：

秘阁公乃[晁]公武之曾祖。公武之五世祖名迥，官太子少保，谥文元；高祖名宗慤，官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谥文庄；父子世掌知诰，载于《宋史》。其曾祖及祖不载于史，惟晁补之《鸡肋集》六十三卷载《宗然居士晁君墓表》云：“文庄公生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讳仲衍。”六十七卷中《寿昌县君晁氏墓志铭》云：“夫人晁氏，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赠金紫光禄大夫仲衍之女。”则秘阁名仲衍无疑。为《六帖》注，想即其人。补之为公武族父，其

言似属可据。

晁仲衍把《六帖》的出处注得很详细，亦举卷1《天一》门的开头部分如下，以便与前举不载所出书的原著对照（它不但添注，内容也与不载所出书的本子稍有不同）：

高明所以覆物 《礼》十六。 高明柔克高明谓天有柔克，不干四时。《书》七。 阴隲 惟天阴隲下民，相协厥居。同上。 天尊地卑。《易》七。成象在天成象。同上。 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易》二。 天垂象 见吉凶，圣人象之。《易》七。 天行健《易》一。 资始 天哉乾元，万物资始。同上。上浮为天 下降天气下降。《礼》五。 天地为本故物本也。《礼》七。 无私不息者天。 清明象天。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语》九。 不可阶而升《语》十。 天秉阳垂日星。《礼》七。

出处后面所带的数字，是指篇、卷之数，如“《易》七”即《周易》第7卷《系辞上》。《中兴馆阁书目》说：“《白氏六帖》，白居易采经传百家之语，摘其英华，以类分门，悉注所出、卷帙、名氏于其下。”《玉海》卷42引。正是指的这个本子，不过误以“悉注所出……”为白氏自为。这正因为《添注出经》的本子上没有具注者之名，当然易被误会为白氏自注。其实晁公武说了：“白居易所撰，而不载所出书。”不能挂添注出处之名于白。所谓“悉注名氏”，乃指所注文章篇名之上有作者名氏。

周漪塘所藏本，后归乌程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9著录。①北京图书馆现藏残本一册，存卷17至20计四卷《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卷5著录，其书题皆为《新雕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段玉裁在文章中把书题写作《新雕添注白氏事类出经六帖》，是弄了几个颠倒的错误。

① 适园所藏，傅增湘曾见之。但傅氏又说：“王兰泉藏有宋本，见《邵氏目录》（谓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然不著行款，未详其为何本，且存佚不可考。”不知王兰泉所旧藏，即傅氏经见之本，因王归于周，周归于张也。傅氏未读段玉裁一文，故见而不知，谓王所藏为“未详何本”、“存佚不可考”。

扩充六帖者 白居易的《六帖》，那时必是很流行的，所以唐、宋时有许多人扩充、补续它。《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类书类著录“盛均《十三家帖》”一部，注语说：“均字之林，泉州南安人，终昭州刺史。以白氏《六帖》未备而广之。卷亡。”这是第一个扩充的。

北宋时给《白帖》添注出处的晁仲衍，一面又依据白氏的旧目，搜集材料，别作《事类后集》三十卷。据同时人王珪《华阳集》卷38《提点京东诸路州军刑狱公事兼诸路劝农事朝散大夫行尚书祠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上轻车都尉借紫晁君仲衍墓志铭》说：“仲衍以唐·白傅所撰《事类集》传者寢舛，乃参考经史，一以刊是之；仍据旧目补考摭新，别为三十卷，曰《事类后集》。”“参考经史，一以刊是”，便是指添注出经；“补考摭新，别为后集”，乃是补其未备，别辑一编。惜此《后集》已不传。宋时还有陈绍撰《重广六帖学林》三十卷，见《宋史·艺文志》，亦不传。

南宋初有孔传续书，名《六帖新书》三十卷；南宋季年又有杨伯喆续书，名《六帖补》二十卷，都有传本。分述如次。

孔氏六帖 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6引《复斋漫录》说：“东鲁孔传，字圣传，先圣之裔，而中丞道辅之孙也。为人博学多闻。取唐以来至于吾宋诗、颂、铭、赞，奇编、奥录，穷力讨论，纤芥不遗，撮其枢要，区分汇聚有益于世者，续唐·白居易《六帖》，谓之《六帖新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名为《后六帖》。《六帖新书》或《后六帖》也是三十卷。乾道二年丙戌[1166]刻于泉南郡庠，题名为《孔氏六帖》。书前有此年韩仲通序说：“绍兴之初，书始成。余守泉南，集此邦儒士相与校雠，刊于郡庠。”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5载，《孔帖》分门凡一千三百七十一。

白、孔二氏书合并本《白孔六帖》的前面，载有陵阳韩驹字子苍的序文一篇，此序原是专为《六帖新书》而作的，对孔传的著书经过

叙述较详:

自唐至吾宋几四百年，故事畔散不属。东鲁孔侯，宣圣之裔，中丞公之孙也。数试艺于有司，辄不售。退为《新书》，以仿白公之意。方侯著书时，士皆挟一经，不治他技，而侯独奋不顾，自诗、颂、铭、赞，奇编、秘录，穷探历代，纤芥不遗，斯亦勤矣。书成而当建炎、绍兴之际，主上复古救弊，士知博学。孔侯之书，如当家之储材，栋椽枅栱，云委山积。匠者得之，应手不穷，功用岂小哉！

孔传，《宋史》无传，其事迹据明·凌迪知《万姓统谱》载：“传字世文，兖州人，孔子五十世孙。精于《易》学。建炎初，与孔端友南渡，寓居衢州，率族人拜疏于阙下，叙家门故事。历知邠州、陕州、抚州，改知建昌。进《续白氏六帖》、《文枢要览》，诏送秘书省。所著有《东家杂记》、《杉溪集》。”

唐宋白孔六帖 南宋季年，白、孔二氏之书被合并刊刻，名为《唐宋白孔六帖》。《四库全书总目》说：“王应麟《玉海》始称‘孔传亦有《六帖》，今合为一书，则并于南宋之末矣。”《唐宋白孔六帖》，是以逐个子目来合并的。每一子目，先列《白帖》，后列《孔帖》，以黑地白文的“白”字、“孔”字为别。两帖本各为三十卷，合并后分为一百卷。子目计为一千三百九十九门，较单行的《白帖》多三十二门，单行的《孔帖》多二十八门。合并以后的形式，仍举卷1《天第一》门的开头部分为例：

☰高明柔克 高明，天也。柔克，寒暑不干。 阴隲下人 言天默定下人之命。 天尊地卑。 成象在天成象。 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以无言为尊圣人以不言为德。《刘洎传》。 《书》曰：“天道无亲，惟德是辅。” 苟违天道，人神弃之。张元素《谏太子承乾游畋》。 不私于人柳公绰《太医箴》曰：“天布寒暑，不私于人。” 百神之君张九龄：“玄宗即位，未郊。九龄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 形于上者谓之天韩愈《原人篇》。 日月星辰之生同上。……

刻于建阳的宋版合刻本，陆心源和杨守敬都曾经藏有残本一部，现在上海图书馆也藏有残存两卷的一部：（1）陆本存卷1-38计三十八卷，现在日本静嘉堂。陆的纪录说：“每叶二十行，每行十七字^①，小字双行。字体与《陆状元通鉴》、《蔡氏草堂诗笺》相仿，宋讳或缺或否，盖南宋光、宁以后福建刊本也。”《仪顾堂续跋》卷10《宋槧白孔六帖跋》。（2）杨本存卷3-20, 39-43, 65-77, 89-94计四十二卷^②，现在台湾。（3）上海图书馆藏卷39-40凡二卷^③，上有“陈氏秋鸿”、“友菊轩”两印，陆氏藏本据《静嘉堂宋本书影》同样有此两印，因此知道是同一部书拆散的了。此两卷正接陆藏的残本。

在残宋本发见前，所见皆明嘉靖间的翻刻本，每叶二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故杨守敬说：“海内著录家有宋单刻《白氏六帖》^④，而无宋《白孔六帖》合刻本，故皆以明本为祖刻。”王重民辑《日本访书志补》。

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人依宋刻传钞本一部，一百卷全。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其可贵者，卷首博平王安世所作的《白帖》序犹存，署“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二月己卯朔初一日丙申”[1090-III-4]，与黄朝英《靖康细素杂记》卷4所志者合。此序在现存的单刻《白帖》和其它版本的《白孔六帖》中均不存。

六帖补 续《六帖》的，最后还有代郡杨伯岳字彦瞻，号泳斋。一名蒙。《四库总目》说他字彦思，周密《云烟过眼录》又作彦德，都是错的。的《六帖补》二十卷，成书于宋淳祐二年壬寅[1242]。后二年[淳祐四年甲辰，1244]，其门生俞仕礼刊于衢州学宫。清·叶昌炽字鞠裳，长洲人撰《影宋本

① 原作“十九字”，误，据《静嘉堂秘籍志》卷9校正。《适园藏书志》卷9记每行亦为“十七字”。

② 《适园志》卷9记所存卷目不误，但总数误作“四十四卷”。

③ 《中国版刻图录·目录》记此本行、字为半叶十行、行十六字。按，应以十行、十七字为安。

④ 也还有宋单刻的《孔氏六帖》。

杨伯喆《六帖补跋》载《奇觚庐文集》卷中述此书的情况和作用说：

其书多采小说及词赋家言，汉以前书绝少，然间有称引者，殊较今本为胜。如卷一引《淮南·览冥训》：“朝发博桑，暮入落棠。”此言日所出入，今本“暮”作“日”。案“朝”与“暮”对文，则“暮”是矣。……卷十一引《山海经》尤多可据。如今本：“独山，末涂之水出焉。其中多螭虺，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此本“翼”作“鬣”。夫鱼何得有翼？则作“鬣”者是矣。“钦山有兽，其状如豚而有牙，名曰当康。”此本“牙”作“介”，“康”作“庚”。庚、康古今字。“介”即“甲”字，言形似豚而背有甲。若作“牙”，则豚自有牙，既似豚矣，何必更言有牙？不可通矣。此所谓“一字千金”者也。

（六）《稽瑞》

《稽瑞》是一部专聚一个门类的纪事的小类书，所聚者都是书传中的休祥之事，起上古，迄六朝，编为四言韵语，而自注其出处。书凡一卷，前有自叙说：“方今元日朝会，上公上寿已，文部尚书奏天下瑞凡四。……惜其国家之大事，帝王之休祥，未列著述，盖阙如也。遂征诸图史，著《稽瑞》一篇，考事以为对，切对以为句；并一对对下，随而解之。……维嵩白云子刘赧书。”刘赧事迹及时代本无记载，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17类书类著录此书，并据《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752]，诏改吏、兵、刑部为文、武、宪部，时官文部尚书者为杨国忠。肃宗时复旧制”，而赧自叙有“文部尚书奏天下瑞”云云，考定刘赧为唐人，书即成于天宝末、肃宗至德前。

本书在北宋《崇文总目》和南宋《通志·艺文略》皆列史部传记类，《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列子部类书类，《中兴馆阁书目》《玉海》卷200引都有著录。晚明祁承燾和清初徐乾学也都藏有见《澹生堂藏书目》

和马玉堂鈔本《传是楼书目》^①。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未得其书。嘉庆间，虞山学者陈揆字子准购得旧刻本，“敬”、“殷”、“徵”、“慎”等宋讳字都缺笔。陈氏宝之，名其藏书楼为“稽瑞楼”；并欲重刊行世，会病歿不果。至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里人顾湘购得其本，影刻入《玲珑山馆丛刊》中，其书乃行于世。光绪十年甲申[1884]，里人鲍廷爵又重刻于《后知不足斋丛书》中。

《稽瑞》的注语中所引纬书和《田俵子》、《随巢子》，王隐、臧荣绪《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梁《大同起居注》、《天监起居注》等书，今俱亡佚。故瞿镛说：“是亦采辑古书之渊藪也。”因而本书在道光中叶重刻行世后，即为辑佚、校勘学者所利用。

清末孙诒让辑录《墨家诸子钩沈》编刻在《墨子闲诂》所附《墨子后语》卷下里面，《田俵子》一家据《稽瑞》独得三条、校二条；《随巢子》据《稽瑞》独得一条。“独得”，就是说在现存的其他类书和古籍引文中都没有。

现代徐宗元辑录《帝王世纪辑存》1964年5月出版，也利用了《稽瑞》的引文。

^① 孙原湘《天真阁集》卷49《陈子准传》说，“唐·刘昉《稽瑞》一卷，向来藏书家未经著录”，不确。

第六章

北宋的重要类书

北宋初年,入太宗赵光义年代,进入“文治”时代,政府以国家的力量,连续编成了几部大书:(1)百科性质的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2)小说类编的《太平广记》五百卷;(3)文章总集的《文苑英华》一千卷。接着,真宗赵恒年代,又编成一部,(4)政事历史的专门类书《册府元龟》一千卷。后来合称它们为“宋代四大书”^①。今均完整存在,这是由于宋代版刻已经盛行,所以不象宋前的大部头书易于散失。

《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虽然也是分类编辑的,但前者内容专收小说,向来著录在小说类中;后者是依《文选》体例辑录的词章专书,向来著录在总集类中;皆不以类书看待。“四大书”也不称为“四大类书”。故我们在这里也只谈《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两大类书。

北宋时个人所辑的类书,以太宗时吴淑编的《事类赋》三十卷、真宗时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卒谥元献编的《类要》一百卷为最著名。《事类赋》流传较广,利用较多,清代辑佚、校勘工作中使用频繁。《类要》自明以来,传本甚罕,迄《四库全书》开馆时,仅浙江范氏天一阁藏有传录宋本,而中间残缺至四十三卷;《四库总目》著录在卷137类书类存目中,故其书仍不行于

^① 《碎金·书籍篇第十四》:“《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下注四个小字云:“四大部书。”余嘉锡考《碎金》之为书,在宋、元时即已有之(见景印本《碎金》跋)。则“四大书”的提法,宋时即已有之。

世,这里也不专门论列。

北宋中期,还有阙名氏所辑《重广会史》一百卷,也是一种政事历史的专门类书,有“小册府元龟”的味道。其书国内久已失传;日本有北宋刊本,1928年经其国育德财团影印,乃重行于世。

(一)《太平总类》——《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的编纂,开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十七日戊寅[977—IV—8],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庚子[984—I—24]。据《玉海》卷54引《太宗实录》。共用六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初名《太平总类》^①;当清本将要完成的前夕,太宗为了夸示自己的好学,命每天进呈三卷,以备“乙夜之览”,才诏改为今名。宋版本书前,载《国朝会要》一节说: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知制诰李穆、太子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左拾遗宋白,太子中舍陈鄂,光祿寺丞徐用宾,太府寺丞吴淑,国子监丞舒雅,少府监丞吕^②文仲、阮思道等,同以群书类聚之,分门编为千卷。

先是,帝阅前代类书,门目纷杂,失其伦次,遂诏修此书。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分定门目。

八年十二月,书成。诏曰:“史馆新纂《太平总类》,包罗万象,总括群书,纪历代之兴亡。自我朝之编纂,用垂永世。可改

^① 《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卷497引《直斋书录解題》说:“本号《太平类编》。”但《直斋书录解題》本书,仍作《太平总类》。《四库全书总目》卷135又说:“初名《太平编类》。”宋本袁州刻《郡斋读书志》卷3下以《太平总类》之名著录而又把“类”字误为“领”字。

^② “吕”原误作“李”,据《太宗实录》和《宋史》本传校正。

名为《太平御览》。”帝每听政之暇，日读《御览》三卷。有故或阙，即追之。虽隆冬短景，必及其数。

对于“日读三卷”，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还有一个解释，是宋太宗自己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

编者 参与编纂人，如上引《国朝会要》，总共是十四人。这些人中，李克勤、徐用宾和阮思道后来调任他职，另以直史馆赵邻几、太子中允王克贞、董淳补其缺据《玉海》卷54引《会要》，故始终是十四员。其中，李昉、扈蒙为领修人。其书首卷的题衔署：“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臣李昉等奉敕纂”四十四字。

修书诸人中，致力最深者，据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说：“似仅有吴淑、吕文仲、王克贞三人。考淑等三人传记，于《御览》纂修期间，皆未言兼摄他项职事。余李昉等十人于受命撰修《御览》之后，或兼掌丝纶，或参赞军旅，或分心于吏事，或劳神于案牍，对于《御览》，盖无一人能专心致志与吴淑等三人之不兼他职者比。惟舒雅之情况如何不明。”

书成较清本早一年说 聂崇岐以为《御览》初稿之成，实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其理由为：(1)据《玉海》卷54《雍熙文苑英华》条引《会要》曰：“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命李昉、扈蒙等[十七人]阅前代文章，撮其精要，以类分之千卷，号曰《文苑英华》。”参与纂修《英华》诸人中，有八人皆为参与《太平御览》者。设其时《御览》尚未完成，何能骤调其半数撰修之人从事他种工作？(2)《御览》卷首李昉之题衔，与太平兴国七年李昉之职位合，而与八年昉之职位不合。“意者，《御览》实成于太平兴国七年，故当时能抽调编辑诸人之大半以从事《文苑英华》之修纂，但完成者不过为进请删定之稿本，不为定本；其定本之成，谅已在太平兴国八年。其后，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荣王宫火，秘阁、崇文胥遭波及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4，

《御览》定本或于其时与他书同为灰烬，而前所进呈之底稿，或以不
为人重视，藏于他处，未遭焚毁，迨日后雕板，遂取稿本为据，故昉
之题衔仍为太平兴国七年之翰林学士承旨也。”《太平御览引得·序》。

蓝本 《太平御览》的纂辑，充分地运用了当时的皇家藏书。
南宋·蒲叔献刻《太平御览》序所谓“太宗皇帝……四方既平，修文
止戈，收天下图书典籍，聚之昭文，集贤等四库。太平兴国二年三
月戊寅诏李昉等十四人編集是书”者。但《御览》也不全是从原书
采摭，而是以前代类书为蓝本，修葺增删而成。《太宗实录》所谓
“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
千卷”《玉海》卷54引者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得更分明：

《太平御览》一千卷，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
博要》及诸家，参译条次修纂。或言：国初古书多未亡，以《御览》
所引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尔。以《三朝国
史》考之，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而《御览》所引书多不
著录，盖可见矣。（上海图书馆藏卢抱经手写五十六卷本卷46、
通行二十二卷本卷14）

近人曹元忠撰《唐写卷子本〈修文殿御览〉跋》载《笈经室遗集》卷11证
《太平御览》之因袭《修文殿御览》云：

余谓《修文殿御览》今尚存宋·李昉等所编《太平御览》
中。取唐、宋以来诸书所称《修文殿御览》以校《太平御览》，可略
言焉。

按，南监本《魏书》《孝静帝纪》及《皇后列传》卷后校语，并
云：“魏收书亡，后人补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修文殿御
览》附盖之。”^①今见《太平御览》皇王部、皇亲部引《后魏书》，其
证一。

^① 这个校语，宋蜀刻《眉山七史》本已有之，证明是宋人加注的，明初刻本《魏书》
因之。

《通鉴·晋纪·考异》引祖孝征《修文殿御览》云：“太安二年[303]，特大赦，改年建初。元年，特见杀。”今见《太平御览》偏霸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其证二。

吴师道《战国策补注·秦策》“美男破老，美女破少”，云“《修文殿御览》引作‘美男破老，美女破车’。今见《太平御览》人事部引《十二国史》，惟‘车’作‘居’，今本作‘破舌’，乃‘居’字形坏而讹。其证三。

《北户录》注引《修文殿御览》：“招潮小彭蠡，壳白。依潮。潮长退，背坎外举螯，不失常期。俗言‘招潮子’也。”今见《太平御览》鳞介部引《临海异物志》，其证四。

又引《修文殿御览》云：“龙眼子，一名龙目。左思《蜀都赋》云：‘旁挺龙目，侧生荔枝’也。”今见《太平御览》果部引《吴氏本草》，其证五。

不仅是内容条文多取材于前代类书，即其体制亦多摹拟，搬取。如它分部五十有五，其数目即与《修文殿御览》相同。《太平御览》门目、编次上的有些疑问，必须理解这个基本情况才能得到解答。曹元忠更进而发其覆说：

《太平御览》皇王部于东晋后即接后魏诸帝，而退宋、齐、梁、陈诸帝于偏霸部；皇亲部又于东晋皇后后，即接后魏诸后，而退宋、齐、梁、陈诸后于偏霸诸后之后，当仍《修文殿御览》目次之旧，以北齐承后魏者也。

至皇王部于东魏后即接后周诸帝，而退北齐诸帝于偏霸部；皇亲部又于东魏皇后后即接后周诸后，而退北齐诸后于偏霸诸后之后，当仍《文思博要》目次之旧，以唐承隋、隋又承后周者也。然则《太平御览》之中，非惟具存《修文殿御览》，并具存《文思博要》，亦断可知矣。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字晓徵，号竹汀。江苏嘉定人。雍正六年生，嘉庆九年卒

(1728—1804)没有深入到这一层,所以他议《太平御览》的体例遂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弹纠亦多不得要领:

其皇王、偏霸二部,进曹魏而退蜀吴,尊拓拔而黜江左,正宇文而闰高齐,未免偏私而不得其平。五代、十国,并不预偏霸之列;职官则翰林学士、节度、观察诸使并阙焉,详于远而略于近。皆体例之可议者也。(《潜研堂文集》卷30《跋太平御览》)

部类 《太平御览》分五十五部,五千三百六十三类(有些类又有附类,总共有六十三附类;合类与附类共为五千四百二十六类)。今将部名与每部卷数,类数列举如下:

天部(15卷/39类) 时序部(20/39) 地部(40/672,附4类) 皇王部(41/217,附7) 偏霸部(18/105,附1) 皇亲部(20/246,附13) 州郡部(18/335,附7) 居处部(25/90,附5) 封建部(5/28,附1) 职官部(67/393,附3) 兵部(90/171) 人事部(141/235) 逸民部(10/1) 宗亲部(11/25) 礼仪部(41/81,附1) 乐部(22/50) 文部(22/63,附1) 学部(13/27,附1) 治道部(15/9,附1) 刑法部(18/43,附3) 释部(6/10) 道部(21/53) 仪式部(4/20) 服章部(15/76,附3) 服用部(21/81,附1) 方术部(18/25) 疾病部(6/57) 工艺部(12/35) 器物部(10/106,附5) 杂物部(2/23) 舟部(4/27) 车部(5/50) 奉使部(3/1) 四夷部(22/378,附1) 珍宝部(12/44) 布帛部(7/34) 资产部(16/94,附1) 百谷部(6/15) 饮食部(25/62,附1) 火部(4/8) 休征部(2/46) 咎征部(7/83) 神鬼部(4/2) 妖异部(4/5) 兽部(25/122) 羽族部(15/117) 鳞介部(15/207) 虫豸部(8/82) 木部(10/127) 竹部(2/40) 果部(12/76) 菜茹部(5/37) 香部(3/42) 药部(10/202,附3) 百卉部(7/107)

类目举“时序部”三十九目如下:

律 历 五行 四时 闰 岁 岁除 春 立春 春分
 夏 立夏 夏至 秋 立秋 秋分 冬 立冬 冬至 元日
 人日 正月十五日 晦日 中和节 社 寒食 三月三日 五
 月五日 伏日 七月七日 七月十五日 九月九日 腊 小岁
 热 寒 丰稔 凶荒 旱

《御览》的类目纷繁，致重复之处甚多。有的在不同部之中重复，如卷 35 时序部和卷 879 咎征部都有“旱”类，卷 188 居处部和卷 767 杂物部都有“瓦”类。有的在同部之中也重复，如“太白山”和“岷山”两类在卷 40 地部和卷 44 地部中都重复出现。这不但造成了分目上的架叠，也给编制体例上带来了混乱，因为(1)，势必把同一类目的资料拆散了；(2)，有时又把同一材料重复出现在两处，例如卷 188 “瓦”目中引用的《礼记》、《史记》、《汉书》等则，都重复出现于卷 767 的“瓦”目中。所以，聂崇岐议之云：“即令一事一物可以分入二部，如‘旱’可入时序亦可入咎征，‘瓦’可入居处亦可入杂物，但于后者存其名而使与前者互见可矣^①，何必又逐条钞入，徒增篇幅哉！”《太平御览引得·序》。

《太平御览》的五十五部之数，是学《修文殿御览》的，不过具体的部名，两书是否相同，缺乏《修文》的部名对照，不得而详。《修文》分五十五部，是以古典哲学为依据的，这个数字的典故出在《易·系辞》里见第三章第五节的脚注引，其意义是表示“包罗万象”。故分五十五部，不是五十四、五十六，也不是其它，有其特殊意义。

引用书数和引用书目 本书首卷之前，附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详载引用诸书的名称。这个《纲目》，宋本即有，其为宋世

^① 在不同类目之间而有相互关系的材料，《太平御览》本有“见”的体例，而不予复出。如卷 197“华表”类有一行道：“辽东华表，见‘鹤’门。”不过在今本卷 916 的“鹤”类中，却又脱掉“辽东华表”（事出《续搜神记》）这一条，弄得两类都不见。而“见”的体例，《御览》执行得也是不严格的。

所编无疑。但也决不是修书当时所编，而为仁宗赵祯时代以后的好事者所撰辑的^①，这是因为《纲目》中并列着《唐书》和《旧唐书》之名。方修《御览》时，《唐书》只有刘昫撰修的一种，初无旧与不旧之别；至仁宗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等重修《唐书》成，刘书始被冠以“旧”字，而欧书或冠“新”字或直称《唐书》。至于《御览》所引，只能是刘昫的《唐书》，且亦决无“旧”字冠于其上。这不过是编《纲目》者的杜撰。然而因这一错误，遂知《纲目》之编，定必在仁宗时代以后。

《纲目》的末尾，有记两行云：“右计一千六百九十件^②，外有古律诗、古赋、铭、箴、杂书等类，不及具录。”后人言《御览》引书种数的，多以此为根据，说是一千六百九十种。其实“尾记”言明古诗、古赋等未列入《纲目》，故确实数字远不止此。又，这个《纲目》编得并不精审，即所列诸书，重复讹谬，不一而足，如：(1)，书名全同之复见，如《太平经》两见，《法轮经》三见；(2)，书名或著者偶因一、二字不同而复见者，如“徐伟长《中论》”与“徐干《中论》”、“陶隐居《本草注》”与“陶洪景《注本草经》”、《礼记》与《小戴礼》等皆两见；而《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国志》及《元和郡县图》则三名具见。还有子虚乌有的，(3)，如《韩书外传》、《旧唐书》等，前者本无其书，后者则《御览》引而别有其名，《纲目》妄增，尤无所据。可知作者水平既低，荒疏又甚，故纰缪百出。它所列举的1,689种，其实又不足1,689之数，剔去重复，恐不过千余种。

① 过去有一些看法，认为这个《纲目》是原有的，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即持这种看法。先前，《四库总目》也持此说。这都是由于误解洪迈《容斋五笔》卷7中“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书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卷首”一语而起。

② 实际上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九个目录，较所记总数差一个。这是因为，《纲目》每行一般都是排列两个书目，全部为845行，骤计之即得1,690之数，但是忘记了，在中间的“刘澄之宋初古今山川记”因字数较多，一行只此一个书名，故总数应除去1，而只得1,689之数。

那么,《太平御览》所引用书究为几何?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1931年出版卷3说:“《太平御览》引书二千八百余种。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尽为辑出,存校中未刊。”那是把诗、赋、铭、箴之类都算进去了,但其中也不免有重复。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1959年出版序言及凡例第8条中,则据称《太平御览》引用书经核实后为二千五百七十九种。

谬误 《御览》的编纂,有许多草率的地方。上面已提到其类目重复所造成的混乱一事,此外还有其它的谬误。

《御览》因杂钞前代类书,而未加细校,故存在以下缺点:(1)引用书名常错误杂乱,先后异致。如“刘澄《宋永初山川古今记》”尚有《宋永初山川记》、《永初山川记》、《宋永初古今山川记》、《山川古今记》、“刘澄《山川记》”五种不同名称。又如《南岳魏夫人内传》尚有《紫虚南岳夫人传》、《南岳夫人内传》、《南岳夫人传》、《南岳魏夫人传》、《魏夫人传》五种异名。其他一书有二、三种不同名称的更多。(2)引用书名,怪诞不经,罔知所云。如卷456引《行成坤国语》、《立后王国语》、《君臣望晏子》,卷457引《讽谏木国语》、《各纳木新序》、《谏君木韩子》、《台甲孔丛子》、《杀谏庚符子》,卷477引《司蚕桑毕下司马徽》等,骤遇之几不辨其所引者为何书。这大概由于钞录者学既浅陋,工又疏略,误将所据类书的篇目、段节与其书名混而为一,而纂修诸人亦视而无睹,未加删正。(3)标列书名,往往有误。《御览》所引一书,往往或以另一书的文字窜入,如卷271引刘向《新序》论用兵事,下接另条:“又曰:‘乐毅以弱燕破强齐七十余城者,齐无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绍五万者,袁无法故也。……’”按《御览》例,称“又曰”的是承上条书名之义。今此“又曰”紧接上条所引《新序》,则其下所引者,自亦当视为《新序》之文。惟《新序》作于西汉之末,何能论及东汉末袁、曹攻战之事?一望而知其误。见聂崇岐:《太平御览引得·序》。

《御览》引书冠头的错误是较多的。刘文典《三余札记》卷2《淮南子逸文》指出《御览》卷459所引“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实为《韩非子》《安危篇》文；卷899所引“牛胆涂目，莫知其谁”等语当是《淮南万毕术》之文。《海隅读书记》也指出《御览》沿用《艺文类聚》，而引书不及《类聚》为谨严。如《御览》卷350兵部·箭下云：

《韩子》曰：“矢来无向，则为铁室以备之。”

又曰：“智伯将伐赵，赵襄子召张孟谈问之曰……”

又曰：“水激则旱，矢激则远。”

又曰：“楚人有白猿，王自射之则搏矢而熙……”

在今本《韩非子》中，有前二事分见于《内储说上七术》及《十过》两篇而无后二事。此后二事见于今本《淮南子》中“水激则旱”见《说山篇》，“楚人有白猿”见《兵略篇》。这在《类聚》里就未尝有误，卷60军器部·箭门是这样编的：

《韩子》曰：“智伯将伐赵，赵襄子召张孟谈曰……”《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则搏矢而阜……”又曰：“水激则旱，矢激则远……”

在此可以明显看到《御览》致误的轨迹。

作用 尽管《御览》在编纂上存在着不少的缺点、毛病，但它是现存古类书中保存五代以前文献、古籍最大的一部，所以在学术研究工作中还是常常要参考它，而作辑佚工作的，更把它当作宝山^①。做校勘古书工作的，遇到疑难，也常常藉《御览》的引文来解决问题。聂崇岐《重印太平御览前言》说：

《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今已失传。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看不到原书，还可以从它那里寻找断篇残简。例

^①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凡例第九条说：“《太平御览》书目一千六百九十种，内地理书约三百种，较诸类书尤为赅博。”这是一个辑佚实践者的体会。

如，讖纬之学既是两汉思想史上一件大事，而对后世也有不太小的影响，可是这些纬书隋以后就失传了，赖有《太平御览》引用了一部分，使我们还能知道它们的大概。又如论述农业技术的《范子计然》和《汜胜之书》，早于著名的《齐民要术》好几百年，原书都早已不见，也赖有《太平御览》的引用，我们才得窥见我们祖先在两千多年前对生产知识一斑。又如《竹书纪年》和它同时出土的《古文琐语》，对于古史的记载，有些与经过儒家美化的说法大不相同，但它们也早已遗佚，我们从《太平御览》还能寻得到它们的一鳞半爪。至如崔鸿《十六国春秋》（今世传本乃明人伪撰），是综述“五胡乱华”时期的重要史籍，据王鸣盛等人的考订，它在北宋已失传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都没有能够见到原书；可是《太平御览》引用了四百八十多条，对于研究十六国事迹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自然，另外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等，也都保存了好些失传古籍的零篇残简，但《太平御览》中所保存的要比其他类书多得多。如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范子计然》下卷，几乎都是录自《太平御览》的。

关于校勘上的价值，清·昭文孙原湘字子潇《重刊宋本太平御览序》载张海鹏刻本《太平御览》前，也载于《天真阁集》卷40有所申说：

窃谓《御览》一书，其援引浩博，足以存秦、汉以来失传之书，世所知也。其具存古训，可以订证宋以后经、史刊本之讹，世未有知之者，今略举数条于此：

《书》“敬授人时”，“人”作“民”，与日本足利学本合。“赤埴坟”作“戡”，与石经合。“西伯戡黎”作“龔”，与《志林》合。“駉駉牡马”，“牡”作“牧”，与古本合。《周官注》曰“眈眈”作“跌”，与宋本《释文》合。《左传》“遂扶以下”，“扶”作“跣”，与服虔本合。此犹互见于别本也。“明于天之道而察于人之欲，故兴神物，以前民用。”较今《易》义为长。“震为苍琅竹”，今《易》作“簣”。《说文》

“簋”训“篮”，则“琅”字优。“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庙”，与今《左传》异。“仲尼，天也，不可阶而升也”，与今《论语》异。“自葛始，天下从之”，与今《孟子》异。“今兹海岛有灾乎”与今《国语》异。此犹互有义理也。“东门之栗，有践家室”，“践”作“靖”，靖，善也，言有善人可与成家室，可订今本《毛诗》之误。“逆祀而弗止也”，“止”作“正”；“则思志义之臣”，“志”作“忠”；“宋音、燕女溺志”，“女”作“安”；于义皆迥胜，可订今本《礼记》之误。“行役以妇人从”，多“从”字；“进戈者前其镞，后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铍，后其锐”，多“后其锐”三字；“大割牲，祠于公社”，多“牲”字；“授以弓矢，立于高禘之前”，多“立”字；“夫妇齐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多“盛服”二字；“以致天下之和，以达天下之礼”，多“以达”二字；可补今本《礼记》之阙。“桀石以投人”作“磔石”，按，磔训担，与磔音、义迥别，可订今本《左传》之误。“童子谣云，丙子之晨”，多两“子”字；“战而捷，必得志于诸侯”，多“志于”二字；可补今本《左传》之阙。“不方千里，不方百里”，多两“方”字，可补今本《孟子》之阙。《家语》：“孔子筮，得贲。孔子曰：‘以其离也。’”“离”作“杂”，于义始显，可订今本《家语》之误。《风俗通》：“舜者，推也。”“推”作“准”，与卢抱经校本暗合；“彼之苦于日见月怖，亦喘之矣”，抱经采明本《御览》补，今作“使之苦于日见月怖喘矣”。使谓役使，义匝而文简，此又抱经所未及见也。引《逸诗》：“丰年之冬，必有积雪。”《玉海》、《广逸》诸书所未载也。

至所引诸史足与今本订误者：汉殇帝延平元年，《东观汉记》作延光。延光，安帝年号，则《东观》之谬也。冲帝永熹元年，《东观》、范书、《纲鉴》俱作永嘉。按，晋怀帝亦号永嘉，西晋去汉甚近，不应袭用幼冲不祥年号。钱竹汀《养新录》载《学斋占毕》记淳熙二年[1175]邛州僧得古窰石阙，有“永熹元年汉安乡”云云，史勤斋疑其号不见于史，竹汀断以永熹系冲帝，今作永嘉误。特

未引《御览》为证，则竹汀亦未见宋本耳。《魏志》“中山王奭”，今本作“衰”，按《金楼子》作“奭”，则“衰”字误也。《吴志·吕蒙传》：“利尽长江，此上流之势，于国之便，十徐州也。则重西门，国之固也”云云，本传不载，裴注亦无。《晋书》：“陛下齐王”。陛下齐王连，谓当时陛下为齐王也。今《晋书》作“秦”，是误指询矣。《惠帝纪》：“壬辰，大赦改元。”旧本与《晋书》同，宋本无之。按，是年正月诏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三月不得复改元，明系大赦改元四字相连而误衍。“尊荀氏为皇太后”，《晋书》作“建安郡君”。按，帝即尊位，无尊生母为郡君者。“春正月戊戌”，《晋书》作“二月戊辰”，按下有“三月戊辰”，则二月安得有戊辰？《唐书·哥舒翰传》“大计军”，今《旧书》作“大斗军”；《太宗纪》“不宜引卑碎之人”，今《旧书》作“裨卒”。凡此，皆可据以考史书之失也。^①

孙氏所说的，有一小部分是指《太平御览》的宋刻本较明刻本优异而言；绝大部分则是泛论《御览》的引文较传本古籍优胜处。明刻《御览》，有的地方照传本古籍改掉，当然也就不会胜于流俗本古籍了。

版本 《太平御览》在太平兴国八年完成后，或曾刊版，但现在传世者并无北宋刊本^②。旧时藏书家所号称的北宋刊本，实际上是南宋的闽（建宁）刊本。南宋有闽、蜀两刊^③，闽前、蜀后，现在都有残本存留，并经影印行世。

^① 肃山沈豫《群书提要》对孙序有些意见，说他“不无边腹自负意”，但也承认它是“然亦沿波讨源者矣”。

^② 《郎园读书志》卷6说：“见一活字残本，目后有长方牌记云：‘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刊行’字二行。”意谓这个明活字本是根据太平兴国刊本摆印的。但这个牌记是不可靠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有“宋庆历五年[1045]刊本”，也不可靠；并没有人看见过这个本子。

^③ 宋蜀本的牌记说：“建宁所刊，舛误甚多，因以别本参考，并从经、史及其它传记校正。”则蜀刻以前，建本而外，也还有其他刊本。

(1)宋闽刊本 宋蜀刊本蒲叔献序说：“《太平御览》以载籍繁夥，无复善本，惟建宁所刊，多磨灭舛误，漫不可考。”周必大序进《文苑英华》刊本说：“太宗皇帝诏修三大书，《太平御览》闽、蜀已刊。”蒲序作于庆元五年[1199]，周序作于嘉泰四年[1204]，可知其在庆元以前已槧版行世。

此本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字。明内府藏本一部，后流落在外，清乾隆时为吴郡朱文游所得，已非完书。吴中经学名家惠栋字定宇，康熙三十六年生，乾隆二十三年卒(1697—1758)尝馆朱家，故曾借读其本。后又由朱家至同郡周锡瓚家周即得宋刊《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者，仅有三百六十六卷。嘉庆九年甲子[1804]又为同郡黄丕烈所得。同治时，转入归安陆心源皕宋楼，又佚去十五卷，于是所存只三百五十一卷，所存卷次为：

1-133, 172-200, 212-368, 424-455。陆缺：531-535, 541-545, 726-730。

现存《御览》刊本，以此本为最古。但陆心源定它为北宋刊本，且认为是“北宋官刊祖本”《仪顾堂集》卷17《宋板太平御览跋》，是不准确的^①。皕宋楼所藏三百五十一卷残本，清光绪末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

此外，嘉庆、道光间张金吾藏有宋刻残本六卷201—205,211，行格字数与上述本同，而所存又适为前本所缺，故张氏疑其即为前本的一部分。

(2)宋蒲叔献刊本（宋蜀刊本）锦屏蒲叔献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于庆元五年[1199]七月，取《太平御览》刊于治所，即周必大所云之蜀本。此本有蒲氏序及双流李廷允跋。

此本国内无藏，日本宫内省书陵部以前称“图书寮”藏有一部，乃枫山官库旧物。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字至二十三、四字不等。

^① 傅增湘《静嘉堂文库观书记》：“按，此书避讳至‘慎’字止，字体极精整可翫而古厚之意已失，陆氏乃谓为北宋刊本，景星庆云，为此书之祖本，何其疏耶！”

版心有刻工姓名。缺卷 460—469, 545—555 及 566 等卷, 钞补齐全。又, 日本京都东福寺也藏有残本。

元代无刻本。明代至万历初, 有刻本及活字本两本行世。

(3) 明倪炳校刊本(黄正色本) 书前有万历纪元[1573]孟春黄正色序, 故一般称为黄正色本。黄序刻书的缘起及其与活字本的渊源说:

宋世刻本, 俱已湮灭, 近世雲间朱氏仅存者, 亦残阙过半。海内钞本虽多, 辗转传写, 讹舛益甚。吾锡士大夫有好文者, 因闽省梓人用活字校刊, 始事于隆庆二年[1568], 至五年[1571], 才印其十之一、二, 闽人散去。于是浙人倪炳伯文居业于锡, 毅然谋于郡邑二、三大夫, 协办鸠工, 锓诸梨枣, 经之营之, 三阅寒暑矣。度时量力, 再期可成。同年薛宪副应登甲^①有校得善本, 藏诸家塾, 其仲子庠生名逢者, 出所藏本, 俾倪氏缮写付梓。

(4) 明活字本 倪炳刊本, 原系由于活字本排印未成而刻。但倪本既刻, 活字本随亦摆印完成, 卷首有周堂的识语说:

《太平御览》一书, 从闽中饶世仁等购其半, 半在锡邑郡伯顾肖芦、太学秦虹川家, 请于先君, 欲合而梓之, 未几而先君作古矣。不肖惧先志之未酬, 考订厘辑, 遂成完书。所谓活板, 仅百余部, 与顾、秦二氏分而有之。倘好事者藉稿于兹, 更加精校, 锓为不刊之典, 是所愿也。时万历甲戌[二年, 1574]小春吉旦, 苏熟周堂识。

卷末有“闽中饶世仁、游廷桂整摆, 锡山赵秉义、刘冠印行”二行。板心有“宋板校正, 闽游氏全^②板活字印行壹百余部”或“宋板校正, 饶氏全板活字印行壹百余部”各二行字样。又附有蒲叔猷、李廷允二跋, 因此, 此本所根据者似即为宋蜀刊本。

^① 薛应登, 名甲。《四部丛刊》景宋本《太平御览》张元济跋误为“薛登甲”。

^② “铜”字的省体字。

明版两本,错脱都非常多,当时人即极不满意。胡应麟《二酉缀遗》卷上《少室山房笔丛》卷35说:“《御览》向行钞本,十年来始有刻,而讹谬特甚。非老师宿儒,即一篇半简,莫能句读。至姓名颠舛,世代鲁鱼。初学士读之,或取入诗文用,误人不鲜。”清代《四库总目》说:“活字本、倪氏本同出一橐,脱误相类,而校手各别,字句亦小有异同。”这些校改,由于出于臆撰,所以只是增加了混乱。

因为明版本的不可靠,清代校勘、辑佚学者遂力求宋本和影宋钞本,以资凭藉。到嘉庆年间,就迭据善本,重加校刊。接着,又有日本的校印本。

(5)清张海鹏刻本清嘉庆九年[1804],昭文张海鹏字若云,乾隆二十年生,嘉庆二十一年卒(1755—1816)利用何元锡钞合周锡瓚藏宋刻本三百六十六卷、黄丕烈藏旧钞本五百十九卷又序目十六卷、孙衡藏四十卷的本子,再加上戚芸生藏三十卷、张氏自藏旧钞二十二卷、范氏天一阁旧钞二十三卷,刻于照旷阁。参加校订者,有昭文黄廷鉴、昭文孙原湘、镇洋盛大士等。黄氏《第六絃溪文钞》卷2有《与张若云州司马论太平御览考异书》,盛氏《蕴素阁文集》卷5有《与张若云书论校太平御览》。有渤海劳树棠、阳湖孙星衍、昭文孙原湘、钱唐何元锡、昭文张海鹏序五首。这个本子刊成不久,书板即毁于火,故流传甚少。

(6)清汪昌序活字本 清嘉庆十一年[1806],扬州汪昌序,用活字校印,不详所据底本。

(7)清鲍崇城刻本 清嘉庆十二年[1807]歙县鲍崇城校刊于扬州,十七年[1812]完成。是根据他所得的明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钞本,又借得阮元所藏何元锡钞合归张海鹏所刊的底本,汇校雕印。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有阮元序及鲍崇城自序。

(8)日本仿宋刊本(日本活字本) 日本安政二年乙卯[当我国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喜多村直宽字士栗,为侍医,尝用聚珍版印《医方类聚》得医官曲直濑所藏明影宋钞本《太平御览》,以枫山官库所藏宋槧

本校勘，用活字排印，至文久元年辛酉〔咸丰十一年，1861〕竣工。喜多村自跋说：“《太平御览》昌平鬻舍有影钞本，直宽因请贷而为粉本，聚珍刷印，以广其传。第一卷至五六二卷，属校于田口文之。文之时加勘正^①，著有《举讹》。戊午岁〔1858〕，直宽闲居，于是第五六三卷以下，迄于篇末，手自雠订。其别风淮雨，讹谬显然者，据清人所刊宋版，略加厘正，不复考异也。”张元济说：“其优于鲍本者，则板心所记刻工姓名，均与蜀本合。”

(9) 广东重刊鲍氏本 清光绪十八年〔1892〕，南海李氏取鲍刻本重刊。曾经加工校勘，改了不少字，与鲍本不是完全相同。

(10) 石印鲍氏本 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积山书局以鲍刻本影印。

(11)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宋本）
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访书，在帝国图书寮、京都东福寺获见宋蜀刻本，因请借影印，摄得影片计目录十五卷、正书九百四十五卷（缺卷21, 42—61, 117—125, 656—665, 724—738）；又于静嘉堂文库借摄所藏宋本（宋建本）补卷42—61, 117—125共二十九卷携归。于1935年12月印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中，分订一百三十六册。其宋蜀本、宋建本所缺的二十六个全卷及其它卷中的缺叶，用日本活字本补足。因为它在好些地方胜过鲍刻，就成为此后最流行和通用的本子。

(12) 中华书局缩印《四部丛刊三编》本 建国以来，中华书局为了供应学术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于1960年将《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缩印。以影宋本的两叶（四面）拼做一页；每页上、下两栏，每栏为原来的一叶。共印成四千四百二十六页，装订成四大册。前载聂崇岐作的《重印前言》。又，《丛刊》本的目录十五卷也是影印宋本的，缩印本则改为排印，在每个门类的下面加注页码，查检起

^①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11：“田口文之多肥改，未足凭也。”

来,更为方便。

索引 (1) 钱亚新编《太平御览索引》《文华图书科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34年4月出版。内容为篇目索引,据鲍刻本编制。用“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索引前有《研究》及《凡例》各一篇。

(2)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第23号:《太平御览引得》,1935年1月出版。内容包括《篇目引得》及《引书引得》二种。据鲍刻本编制。用“中国字度撷法”排列。聂崇岐主编,邓嗣禹持字、赵贞信肖甫等编校。

(二) 《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一千卷,宋·王钦若、杨亿等奉敕编撰,始事于景德二年[1005],到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成。开始时名《历代君臣事迹》,揭露其性质为一部政事历史的百科全书,盖以“君臣的事迹”为限,而为“历代”的;至于天地时序、动植物器物则不在其列。书成进呈,诏题名为《册府元龟》,这个名称的意义是:“册府”是书册的府库,“元龟”是大龟。古人说法,龟可以知未来,所以凡可以作借鉴之事,常谓之“龟鉴”。《册府元龟》就是说这书是一部古籍的大龟,可以作为君臣的鉴戒,也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据刘迺和:《关于册府元龟》(载《人民日报》,1961年7月23日)。

经过 宋真宗赵恒因其父太宗赵光义曾敕编几部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一部大医方书《神医普救》,也想编一部大书和他父亲媲美,故在即位后的第八年,有诏修《历代君臣事迹》之举。据王应麟《玉海》卷54载:“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二十二日,1005-X-27],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等奏请直秘阁钱惟演、刁衍,龙图阁待制杜镐、戚纶,直集贤院李维,直史馆王希逸、陈彭年、姜屿、陈越,太子右赞

善大夫宋贻序同编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编目，送钦若暨亿参详；钦若等又自撰集。上用钦若等所撰为定；有未尽者，奉旨增之。又令内臣刘承珪、刘崇超典其事，编修官供帐饮饌，皆异常等。俄又令秘书丞陈从易、校理刘筠同编修。又直馆查道、太常博士王曙^①。未成，又增直集贤院夏竦、职方员外郎孙奭注撰音义。三年四月丙子〔初五日，1006—V—4〕，四年八月壬寅〔初九日，1007—IX—22〕，车驾再幸编修之所^②，再阅门类，杨亿悉以条对。编次未及伦理者改正之。帝曰：‘朕编此书，盖取著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取法。至于开卷览古，亦颇资于学者。’皆命从官坐赐编修官器币。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甲申〔二十五日，1008—VI—30〕手札诏，凡悖恶之事及不足为训者，悉删去之。日进草三卷，帝亲览之，挺其舛误，多出手书诘问，或召对，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之，六年八月十三日壬申〔1013—IX—20〕，钦若等以献进，表曰：‘……矧《皇览》、《博要》之言，《玉鉴》、《珠英》之作，但词林之见采，非治本之宜先……’崇政殿进呈。凡千卷，目录十卷，音义十卷，诏题曰《册府元龟》。”真宗制序^③说：

太宗皇帝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书而撰《神医》；次复刊广疏于《九经》，校阙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言于释、老。洪猷丕显，能事毕陈。朕遵先志，肇振斯文，载命群儒，共司缀辑。粤自正统，至于闰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命宽猛，官师论议，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刑。

张一纯说：“在编书过程中，书局的人事进退，有的没有年月可考，如王希逸之死，宋贻序的贬官，查道、王曙入局。总计局内有总

① “曙”原作“晓”，乃避宋英宗讳改，今回改。

② 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说，修书地点在宣徽南院厅。

③ 这篇序文在今书前不存，系见于《玉海》卷54。

裁二人，编修前后达十七人^①，典掌二人。当日局内分工情况，史书不详。曹溶《学海类编》收有关于《册府元龟》的书四种：《历代铨政要略》，杨亿撰；《刑法叙略》一卷，刘筠撰；《邦计汇编》，李维撰；《贡举叙略》一卷，陈彭年撰。这些书都是《册府元龟》各部的‘总序’，《四库全书总目》怀疑它们不是真出于杨亿等之手，见卷80，101，84，83。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当日分工，由此可窥其一、二。这批编修人物之中，杜镐是预修《文苑英华》的人，他和刁衍在书成不久即去世；陈越在书成前一年死。王曙、夏竦预修《册府元龟》，《宋史·王曙传》、《夏竦神道碑》载王珪《华阳集》卷35不载，大概他们任职的时间不长或所起作用不大。此书总其成的是杨亿，任职精勤的是陈越、陈从易、刘筠。”《谈册府元龟的编纂和它在文献学上的地位》（载山西《学术通讯》，1963年第2期）。

不改旧文 《玉海》说：“王钦若以《南、北史》有‘索虏’、‘岛夷’之号，欲改去。王旦曰：‘旧史文不可改。’赵安仁^②曰：‘杜预注《春秋》，以《长历》推甲子多误，亦不敢改，但注云：日月必有误。’乃诏欲改者注释其下。”

取材 《册府元龟》不录杂史、琐说、家传。《玉海》说：“凡所录以经籍为先。亿又以群书中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之类，皆繁碎不可与经、史并行，今并不取。止以《国语》、《战国策》、《管、孟、韩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与经、史俱编，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之类，采摭铨择。”又说：“景德四年九月戊辰[初五日，1007—X—18]，上谓辅臣曰：‘所编《君臣事迹》，盖欲垂为典法。异端、小说，咸所不取。观所著编序，援据经、史，颇尽体要，’

① 十七人的计算，是除了前引《玉海》中所提到十六人外，再加石中立。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之记载，石中立亦在局预编修。

② 赵安仁即家藏《北堂书钞》者，见第四章第三节“陈禹谟刻本”段。据《玉海》此记载，则赵安仁、王旦亦皆参加《元龟》局事者。

而诚劝之理，有所未尽也。’……”

《元龟》虽不取小说、杂书，但史书以外，亦采实录等历史原料。据岑仲勉的研究，《元龟》多采《唐实录》和《唐年补录》^①，他说：“《元龟》与今本《旧书》之句略异者，不能定谓《元龟》是采自《旧书》，此为校《旧书》者所最当注意之一点。……唐武宗以下，实录或佚、或阙，故《元龟》常采他种，编年以弥补之。”《唐史余藩》卷4《册府元龟多采唐实录及唐年补录》条。

闰僭 刘迺和说：“《太平御览》以蜀、吴、五胡十六国、宋、齐、梁、陈、北齐为偏霸，奉与东魏仍入皇王部。《册府元龟》则以秦、蜀、吴、宋、齐、梁、陈、北齐、东魏、朱梁为闰位，五胡十六国及五代之十国另立僭伪部。同是宋代官书，意见也不一致。”按，《御览》是循前代类书之旧，见前节。

部门 《册府元龟》真宗序说：“凡勒成一千一百四门，分为三十一部，凡一千卷。”《玉海》卷54载部、门数同，并列举每部的门数，但是把它所举的每部门数加起来，却得一千一百零六门，多了两门。用明刊本逐门点下来，实际的门数是一百一十一十六，较序所说多十二，较《玉海》细数多十。明本三十一部的总序所记的门数，也有的有错误，若照其数叠加，则得一千一百二十七门。现将三十一部的部名、所占卷数以及明本实际门数列举如下：

帝王部(181卷/128门) 闰位部(37/78) 僭伪部(16/37)
列国君部(21/40) 储宫部(6/17) 宗室部(38/43^②) 外戚部
(8/23) 宰辅部(32/41) 将帅部(117/106) 台省部(26/29)
邦计部(29/29^③) 宪官部(11/15) 谏诤部(27/6) 词臣部

^① 《册府元龟》卷708狄兼善条下注云：“按《唐书》本传不载此事，《唐年补录》有此诏而不载兼善等本官。”是《元龟》此条综《唐书》、《唐年补录》而为之。按《崇文总目》：“《唐年补录》六十五卷，贾纬撰。”其书以武宗后无实录，故作以补之。今佚。

^② 《玉海》作“四十二门”。明刊本总序亦称“四十二门”，误。

^③ 明刊本总序称“三十九门”，误。

(4/8) 国史部(9/13) 掌礼部(34/9) 学校部(12/15) 刑法部(11/9) 卿监部(6/15) 环卫部(3/9) 铨选部(10/8) 贡举部(13/7^①) 奉使部(13/27^②) 内臣部(6/16) 牧守部(30/42) 令长部(7/21) 宫臣部(8/11^③) 幕府部(15/16) 陪臣部(20/21^④) 总录部(205/243^⑤) 外臣部(45/34)

门目举台省部二十九门为例:

选任 德望 才智 公正 正直 宠异 清俭 恭慎 练习 谦退 识量 忠节 举职 宣赞 荐举 封驳 奏议 谋画 简傲 废职 交恶 漏泄 奸邪 轻躁 谴责 明附 害贤 谄佞 贪黷

篇幅 《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同样是一千卷,但每卷的容量比《御览》大,所以总字数约超过《御览》一倍。用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计算版面字数,是九百四十万字。^⑥

体制 《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也和其它一般的类书在编辑体例上有两个很大的不同之点:(1)它所引用的书籍和文献,都不注明出处;(2)它并不完全“述而不作”,在每部之前都写“总序”,言其经制;每门之前又各有“小序”,述其指归;故有“总序”三十一篇、“小序”一千一百十六篇,这都是颇费力的事。

《玉海》说:“初撰篇序,诸儒皆作。帝以体例不一,祥符元年二月丙午[十五日,1008—III—24],遂择李维等六人,撰讫,付杨亿窜定。“总序”一般千余字一篇,但也有很长的,例如《台省部》的“总序”长

① 《玉海》作“十门”。

② 《玉海》作“十七门”。

③ 明刊本总序称“十二门”,误。

④ 明刊本总序称“二十门”,误。

⑤ 《玉海》作“二百四十一门”。

⑥ 陈垣先生用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计算:为九百余万字,与此数亦符合。这是《四库全书》中所收的第二部大书;第一部为《佩文韵府》。

达一万二千字之多；“小序”每篇一般一、二百字。今举《台省部》的《选任》门“小序”为例如下：

夫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大禹之训也。“慎简乃僚，其惟吉士”，周穆之命也。盖邦国治乱，在乎庶官，选贤任能，其来尚矣。自舜命众职，以熙帝载；西汉之后，政归尚书。机务所出，推择斯妙。或以政事用，或以文学升；内则参侍左右，论思治道；外则坐曹夙夜，修明官业；厥职尤重，其才益难。详求遗策，铺观历代，曷尝不慎选众之举，致得人之盛哉。

明末曹胤昌湖北麻城人，崇祯进士辑录《元龟》的总序、小序，专为一书，名曰《册府元龟独制》亦有称为《独注》、《独志》者，计三十卷。清初张尔岐又专录总序，为《册府元龟总序》五卷。

疏失 张一纯指陈它的缺点：(1) 卷 967 说拓拔思恭为吐谷浑，这不仅和《宋史·夏国传》、《辽史·西夏传》不合，且和《新、旧唐书·党项传》不符；(2) 唐朝本来就有两个上元年号，一为高宗，一为肃宗，《元龟》卷 980 以高宗年号误为肃宗年号；(3) 卷 219 李昇条，称昇自云永王璘之裔，《四库全书总目》卷 66 即说它未免附会。

作用 《册府元龟》在校史上的作用最大。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说：“《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旧唐》、《旧五代史》^① 无论，《魏书》自宋南渡后即有缺页，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其三十八卷刘芳上书言乐事，

^① 陈序又说：“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虽然如此，《册府》已渐为人所注意。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建功）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甚著。亦以《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

引《魏书·乐志》仅一行，即注：‘原有阙页’；卢文弨撰《群书拾补》，于《魏书》此页认为‘无从考补’，仅从《通典》补得十六字。不知《册府》五百六十七卷载有此页全文，一字无阙。卢、严辑佚名家，号称博洽，乃均失之交臂，致《魏书》此页埋没八百年，亦可为清儒不重视《册府》之一证。”清儒重视《太平御览》而不重视《册府》的原因，陈氏也探索了，他说：“《御览》采摭范围较广，每条皆著出处，便于引据，为校讎、辑佚家所喜用。”

张一纯说：“今以史书核诸《元龟》，知《元龟》叙述翔实有为他书所不及。例如：南北朝时代突厥与吐谷浑之通使，唐代吐蕃与吐谷浑之通婚，见于《元龟》卷 661, 962。薛仁贵大非川之役的失败原因，两《唐书》不详，《元龟》卷 670, 986, 456 足以补之。唐代江淮各种税收‘转市轻货’运上长安的办法，终唐之世是否都存在的问题，从《元龟》卷 498 可以证实。《旧唐书·食货志》‘比来不许商人便换，……所以物价转高’，‘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市布帛’，核以《元龟》卷 501，‘物价转高’为‘转轻’之误；‘两市’为‘常平’之误。这里也说明《元龟》在校勘、辑佚上的作用。岑建功曾以《元龟》校《旧唐书》；岑仲勉以《元龟》等书校《元和姓纂》，成《元和姓纂四校记》十卷。”

胡文楷说：“《册府》掌礼部之奏议及作乐，刑法部之定律令，邦计部之赋税、田制、俸禄，贡举部之条制，铨选部之条制，以校薛史之礼、乐、刑法、食货、选举诸志，增出奚啻倍蓰？其他诏令、制敕、疏奏可补刘书、薛史纪传者，不可胜计。”《略述册府元龟之版本和校勘》。

版本 《玉海》卷 54《景德册府元龟》条的注语说：“祥符八年十二月乙丑^①，钦若等上版本。宴编修官，上作诗一章赐令属和。”

^① 这里的月、日有误。由于大中祥符八年的十二月没有乙丑日，当为“十二月己丑”（十三日）或“十一月乙丑”（十九日）之误。如果是前者，公历为 1016—I-25；如果是后者，公历为 1016—I-1。

这说明《册府元龟》在两年前编成后即付刊版，故至是“上版本”。《玉海》又记载“天禧四年闰十二月癸丑[初七日,1021—I-22]，赐辅臣各一部”；“景祐四年二月甲子[廿一日,1037—III—10]赐御史台”。也是因为有了版本，这样的大书才能广事分赠。这就是《元龟》的首次刻印本。但是这个北宋版本，今已全无存者，许多藏书家和谈《元龟》版本者总是把现存的南宋蜀刻残本当作北宋祥符的初刻本，这是完全错误的。

南宋本书有两次刻版：一为每半叶十四行、行廿四字的蜀刻本；一为每半叶十三行、行廿四字、冠题《新刊监本册府元龟》的刻本。这两个刻本于今都有残本存在。

(1) 南宋蜀（眉山）刻本 《中国版刻图录·目录》说：“十四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宋讳缺笔至‘贞’字。审其行款、字体、刀法，与《二百家名贤文粹》如出一辙^①，知为南宋中叶眉山坊本无疑。此本原出北宋官版，故讳字、缺笔多遵之。《铁琴铜剑楼书目》谓系北宋祥符书成最初刻本，绝非事实。”^②清嘉庆中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是把这个版本作为“南宋刊本”的，然而同时又把十三行的《新刊监本册府元龟》作为“北宋刊本”卷26类书类，其实那一本也是南宋所刊。

南宋蜀刻本如今国内外共存有残本五百七十六卷，其卷目如下：

① 《图录》又说：“《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十四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据庆元二年[1196]眉山王称序、庆元三年[1197]咸阳书隐斋刻书跋文，知此书为庆元间眉山咸阳书隐斋刻本，书隐斋乃眉山书坊斋名，咸阳是其原籍。刻工王朝又刻《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书，其人乃南宋中叶眉山地区名匠。”

② 这样说的不仅是《铁琴铜剑楼目》，陆心源《仪顾堂集》卷16、袁克文《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都这样地肯定。连精于版本鉴识的傅增湘，在其《静嘉堂文库观书记》中也这样说。

(钥匙)a=北京图书馆收藏 b=显微胶卷一式两个拷贝，
分藏北京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原书遭美帝国主义
劫持中 c=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 f=日本静嘉堂
文库收藏

卷 6—10(b), 41—45(b), 56—60(b), 129—166(f), 171—180(f), 182—204(f), 271—275(b), 286—295(a), 307(b), 309(a), 341—345(b), 356—375(b), 386—390(b), 396—400(b), 411—415(b), 442(a), 444—445(a), 456—460(b), 471—475(b), 482—483(a), 484(a, b), 485(b), 491—495(b), 505—538(f), 542—565(f), 567—577(f), 583—585(f), 586—590(b, f), 591—599(f), 604—605(f), 608—610(f), 611—615(b, f), 616—660(f), 666—701(f), 706—708(f), 717—720(f), 726—732(f), 737—739(f), 742—756(f), 761—785(f), 786—787(a, f), 788(c, f), 789(a, f), 790—791(f), 796—800(f), 803—806(f), 811—812(f), 815—865(f), 876—900(f), 901—905(a), 906—933(f), 936—938(f), 940—942(f), 944—947(f), 950—956(f), 967—1, 000(f)。

(2) 南宋刻十三行本 南宋另有一个刻本，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每卷冠题“《新刊监本册府元龟》卷第几”。清嘉、道间，爱日精庐藏有残本九卷（卷 249—254, 261—262, 276），原为宋、明两代内府所藏有宋玺二：“御府图书”、“缉熙殿宝钤”；明玺一：“文渊阁印”。张金吾定为北宋刊本，是错误的。道光时为瞿氏恬裕斋（铁琴铜剑楼）所得时，又已佚去卷 250 一卷，只余八卷。瞿氏定为南宋刊本，是正确的。今此八卷在北京图书馆。

十三行本残存的八卷，与现存的宋蜀刻本五百七十六卷卷目无重复者，故合计之得宋刻《册府》残本五百八十四卷。此五百八十四卷宋本，经已故之前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字菊生，浙江海盐人陆续自国内外拍摄照片得五百四十六卷日本部分完全摄回，国内尚有三

十八卷未摄^①，制版留有样张。现在这份样张存在中华书局。

现存的明代钞本，很多是冠题“《新刊监本册府元龟》卷第几”的^②，证明它们系自这个南宋刻本而不是从宋蜀刻本转录或影写的。

(3) 明崇祯黄国琦(李嗣京)刊本 《册府元龟》在北、南宋三刻之后，一直到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才再有刊本。宋刻本在明代流传得也很稀少，即偶有收藏，也极不显著。故明代藏书家所有的，大多是传钞本^③。故季年时黄国琦字石公，号五湖，江西新昌人校刻此书，所用底本悉皆是钞本，而传钞本大都是错误脱漏，难以究诘，因此黄氏与其友人，费了不少的力气去校订。黄刻本因卷首结衔领先题：“李嗣京订正”，故亦有称为李刻本者。

先是，三水文翔凤字天瑞，号太清，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求《元龟》，闻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代中期的博学家蓄有此书写本，且经雠正，至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竟得之，“寻行丹栉，殊敬公之苦心；无奈其极冗、极讹、极参差、极脱落”，依然是个不可读之本。其年，文氏视学山西，以黄国琦同行，遂邀黄氏同作校订工作。至天启六年丙寅[1626]，文氏丁忧回籍，黄氏就单独负起了这个责任，直到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中间来往陕西、山西、河南、江西、京师各地，借阅了高阳孙承宗、侯官曹家佺、上虞倪元璐等九家抄本参校，厘讹补阙，又得陈龙正、张肯堂、夏允彝等九十余人帮助覆勘，自辛酉迄辛巳[1621—1641]历时二十年，才告完成。其校雠辛勤，用功之深，可以想见。但他无力将校本刻版。到次年[1642]，他以进士做福建建阳县知县，得到本省巡按李嗣京、建南道胡维霖等人的资助，才在建

① 未摄影制版之卷号是：309, 356-375, 386-390, 396-400, 411-415, 483, 485。

② 北京图书馆所藏两部明抄本中的一部（书号10429），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一部，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的明抄本一部，都是如此。

③ 黄刻本《元龟》文翔凤叙：“宋汇书四大部，……他皆宿已刊行，惟《册府》阅六百年止一写本互相抄传，势家购之，必损钱至三、二十万，贫士竟生至梦有不之逮者。”

阳开版，这年的二月始事，十月告成。月期据李嗣京《揭帖》。这就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的黄国琦刊本^①，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②。

文翔凤、黄国琦等人费了那么多的力气校钞本《元龟》，但是他们没有见到过宋本，所以虽然勘正了不少的错误、脱漏，但还有很多的不能更正。因此，从清代末期以来，见到宋本的学者，就更能订正它的许多错脱。陈垣在《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据傅增湘字沅叔，江安人之所校者举例说：

二百九十卷明本卷首前三页半，系二百九十七卷《谴让》门卷首之文，重出于此；所缺去者系《立功》门小序及周公旦等九条，凡一千二百余字，非宋本何由补足之？又如明本六百十九卷二十页三行后，脱武懿宗等七条，凡六百余字，均非宋本无由补足。

然而，宋本本身也不是没有错简脱误，经过文、黄等穷思冥索，博稽书传^③，加以移正，也有反而胜过宋本的。陈垣在《序》中举例说：

然亦有宋本误而明本不误者：如傅校本三百七十四卷十八页二行“击虏”下，宋本有张奉国、刘恠等二条，凡三百三十余字，已见本卷四至五页，显系错简衍文，明本删之，是也。又五百九十卷十七页四行“章”字下，宋本有“黄钟一宫”等三百二十余字，系五百六十八卷十八页之文，错简于此。脱固不可，衍亦何用？明本亦已删去。此皆明本胜宋本处。可见明人对此书集体校雠，曾用相当功力，不得以“明人空疏”遂一笔抹煞也。

① 这个刻本中的“常”字作“尝”，或缺末笔；“洛”作“雒”；“校”作“较”；“检”作“简”；“由”作“繇”，或缺末半笔作“由”；皆避明末帝讳。

② 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10《册府元龟》条在“明崇祯壬午刊本”外，又说“有明刊半叶八行本”，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本子。明代并没有两个刻本，其它版本也没有半叶八行的。

③ 文凤翔《叙》说：“凡疑义当前，辄纵横曲直，以尽其解；攻坚破僻，务使冗者削，讹者真，参差者得序，脱落者尽补。一字困手，磨心数夕；又博寻于、史、经、传之繇然，条其胜理，析其本致，务求归于至是。”

陆心源《北宋本册府元龟跋》所举明本脱文甚多，有真脱者，固可由宋本补足；有非脱而为明本有意删去者，固不必复由宋本补之也。如谓五百五十九卷十二页李翱条前脱路隋一条，凡五百七十余字，今按路隋条已见五百五十七卷一页。又谓六百十七卷十六页张仁愿条前脱刘三复一条，凡四百余字；十八页顾荣条前脱王观一条，凡四十余字；崔振条前脱王彪之一条，凡八十余字；今按刘三复条已见六百十六卷二十一页，王观、王彪之条已见六百十七卷五页。……凡此诸条，非陆《跋》所举有误，即宋本重出或互见之文，可以用校勘学之“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校，即知其重出或互见而删之，故与其说是明本脱文，毋宁说是明本删宋本重出之文为得其实也。因此，益信明人校刻此书之劳不可没。

崇祯刻版，至清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因黄家遭火灾，书版多散失，后经补刻，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黄国琦之侄九锡重印此书，卷首结衔题为：“淮南李嗣京参阅，西极文翔凤订正，豫章黄国琦较释。”和崇祯印本不同^①。后有黄九锡跋云“诂庚子秋，书厨忽罹回禄，板多错落。予偕六鳌殷情补缀，仰承弗皇；值伯弟六鸿以新纶挥弦剡城，比行盖匆匆，特为停驂，赞成合璧，《册府》幸也”云云。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未见崇祯印本，而谓：“明崇祯中，文太青翔凤及其门人黄石公国琦先后取是书校正讹误，将授诸梓，未果；康熙壬子，石公之侄九锡等始为刊行。”卷61类书类二。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黄家书版在吴门求售，为书贾王胜

^① 崇祯印本结衔题：“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臣李嗣京订正，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维霖参阅，知建阳县事臣黄国琦较释。”当然，清代的补刻印本不需再冠以明朝的官衔，而易胡维霖之名为文翔凤，也就比较地接近于校定的事实。明刻印本用李、胡之名，只是因为他们出了刻印资费的缘故。

鸣所得,又将此书重印,前有丁序贤小引,说“版归书坊后,失去者百数十篇,其中蠹蚀霉缺者不可胜计,余因为校雠点定,失去者补刻之,残缺者修增之,阅两月而是书完好如初”云云。经此补刻,崇祯原版,存者寥寥,文字间有不同。

陈垣《序》说:“此书自明以来,只有一刻,康、乾而后,虽续有补版,实同出一源,非有二刻。”故终清之世,只有补明版印本,而无清刻本。《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载“康熙壬子五绣堂刊本”,不得其实。

(4) 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刻本 建国以来,中华书局为了提供学术研究的资料,将明崇祯刻印本影印,并用残宋本补其脱漏之条。由于明本流传已稀少,经过调查,最后决定用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所藏的崇祯初印本为主,参用北京图书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周邨同志等所藏的四部较好的印本。以明本的两叶(四面)拼做一页;每页上、下两栏,每栏为原来的一叶;共印成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一页,装成十二大册。在1960年6月出版。前载陈垣撰《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末有《类目索引》及《校印后记》。此外,又把卷首的总目和分册目录同本书的标题核对校正,加注页码。在使用上,最称方便。

影印前,曾把宋本五百四十五卷的摄影样张和黄刻本大致比勘了一遍,将黄刻确实脱漏的一百四十二条依据残宋本钞录,作为补遗,分别附在相应各卷的末尾。经过这样的处理,影印本就大致综合了宋、明本的所长。

索引 (1)《册府元龟引得》,1933年陈鸿飞编,载《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5卷第1期。系子目的索引,按汉字笔划顺序排列。

(2)《册府元龟索引》,1933年吕绍虞、于震寰同编,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8卷第6期。亦子目索引,按杜定友《汉字形位排检法》排列。

(3) 《册府元龟类目索引》，附载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末册，按汉字笔划顺序排列。

(4) 《册府元龟索引》，日本宇都宫清吉、内藤戊申合编。只完成了《奉使部》、《外臣部》两册，在1938年日本昭和十三年由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系词语索引，包括人名、国名、地名、称号、官名、部族名、夷语、术语、风俗、信仰、习惯等各种词语，按汉字笔划顺序排列。逐个词语除注明它在本书中的卷数、子目、页数、行数外，并且追查《元龟》引文的来历而注在“参考”栏中。《元龟》体制上的缺点，如前所述，是引文不记出处，这个索引却弥补了此一缺点。其用力之勤，可想而知。事实上是对《元龟》做了研究性的工作。

女《册府元龟》——《彤管懿范》 据《玉海》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诏：‘妇人事，别为一书。’又说：“八年闰六月庚辰[初二日，1015—VII—20]，枢密使王钦若上奉诏编修后妃事迹七十七卷[原注]《崇文目》类书类：七十卷^①，赐名《彤管懿范》。大约如《册府元龟》，凡六部、百四十门。诏钦若撰序。九月丙寅[十九日，1015—XI—3]钦若上之。”这部女《册府元龟》已失传。

缩本《册府元龟》——《天和殿御览》 据《玉海》载：“乾兴初[1022]，命翰林侍读学士晏殊等于《册府元龟》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为二百一十五门。[原注]《书目》天圣中撰^②。名曰《天和殿御览》[原注]天和殿，禁中藏书之所，因为名。仁宗尝谓辅臣曰：‘《天和殿御览》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因言：‘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戒。’”又引晏殊序语云：“上稽雅诰，下采信书，削糟粕之繁，撮丹青之要。”又引《真宗实录》说：“天圣二年五月甲寅[二十八日，1024—VII—6]，内出《天和殿御览》四十卷、《隋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也作七十卷。七十七卷之说应是错的。

② 《玉海》中所称的“《书目》”是指《中兴馆阁书目》。《中兴目》说“天圣中撰”，就是说这个缩本已不是真宗时代的作物，而到了仁宗赵祜的初年。

书》八十五卷下秘阁镂板。”是此书当时曾镂板流行，而亦久已失传。

(三) 《一字题赋》——《事类赋》

《事类赋》三十卷，吴淑字正仪，丹阳人。初仕南唐为内史。归宋，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官至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后汉天福十二年生，宋咸平五年卒(947—1002)撰。他是参加《太平御览》编纂工作的，而且是用力很勤的一位。此书则是他个人所编，于淳化[990—994]中再次进上，在《太平御览》成书之后。原名《一字题赋》，计百首，无注，分二十卷。初进上后，真宗命他附加注释，乃自注之，广为三十卷，改称为《事类赋》^①。书前有《进注事类赋状》说：

右臣先进所著《一字题赋》百首，退维芜累，方积竞忧，遽奉训辞，俾加注释。伏以类书之作，相沿颇多，盖无纲条，率难记诵。今综而成赋，则焕焉可观。……今并于逐句之下，以事解释；随所称引，本于何书，庶令学者知其所自。又集类之体，要在易知，聊存解释，不复备举。必不可去，亦具存之。凡讖纬之书及谢承《后汉书》、张璠《汉纪》、《续汉书》、《帝系谱》、徐整《长历》、《玄中记》、《物理论》之类，皆今所遗逸而著述之家相承为用，不忍弃去，亦复存之。前所选二十卷，加以注解，卷秩差大，今广为三十卷，目之曰《事类赋》。……

《事类赋》用骈四、俪六为之，据明·李濂刻书序说是“遵当时取士之制”，那么，也是为科场之需而作。这种体裁，却是新创。《四库全书总目》说：

^① 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5说：“《魏志·后妃传》注引《魏略》曰：‘[卞]兰献赋，赞述太子德美。太子报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宋·吴淑作《事类赋》，义取诸此。”

类书始于《皇览》。六朝以前旧笈，据《隋书·经籍书》所载，有朱澹远《语对》十卷，又有《对要》三卷、《群书事对》三卷，是为偶句隶事之始。然今尽不传，不能知其体例。……今所见者，唐以来诸本，骈青妃白，排比对偶者，自徐坚《初学记》始；镕铸故实，谐以声律者，自李峤《单题诗》^①始；其联而为赋者，则自淑始。

峤诗一卷，今尚存^②，然已佚其注，如《桂》诗中“侠客条为马，仙人叶作舟”之类，古书散亡，今皆不知为何语，故世不行用。淑本徐铉之婿，学有渊源，又预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两大书，见闻尤博。故赋既工雅，又注与赋出自一手，事无舛误，故传诵至今。

部目 《事类赋》三十卷，计分十四部、一百目。今将部名及每部所占卷数、所分子目数列举如下：

天部(3卷/12目) 岁时部(2/4) 地部(3/10) 宝货部(2/6) 乐部(1/5) 服用部(3/8) 什物部(2/7) 饮食部(1/2) 禽部(2/9) 兽部(4/9) 草木部(2/9) 果部(2/11) 鳞介部(2/4) 虫部(1/4)

子目举《宝货部》二卷六目如下：

[卷9·宝货部一] 金 玉 珠

[卷10·宝货部二] 锦 丝 钱

每个子目为赋一首。子目都是一个字，共为百首，所以原名为《一字题赋》——这个名称乃由李峤的《单题诗》而来。

它的赋、注内容，举《天部》第一首《天》的首数联为例：

① 《单题诗》之名，见于边惇德刻《事类赋》序。

② 《全唐诗》卷59及60载李峤《日》、《月》、《星》、《风》等五律一百二十首，皆一字题，即边惇德所称之“李峤《单题诗》”。在日本流传有这一百二十首诗的单行本，名为《李峤杂咏》，分上、下二卷，天瀑山人据以刊入《佚存丛书》。

太初之始，玄黄混并。《列子》曰：“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陈思王植《魏德论》曰：“在昔太初，玄黄混并。”及一气之肇判，生有形于无形。潘岳《西征赋》曰：“化一气而甄三才。”《列子》曰：“夫有形者，生于无形。”于是地居下而阴浊，徐整《三五历》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天在上而轻清。《易乾凿度》曰：“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

版本 本书有南宋绍兴十六年丙寅 [1146] 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卷末有绍兴丙寅仲夏廿三日 [1146—VII—3] 右迪功郎差监潭州南岳庙边惇德序，称“滎阳郑公将命在浙，以所藏《事类赋》善本俾镂版”云云；序后有边惇德、陈绶、李端民等校勘官衔；前有吴淑《进状》；所引书名下皆有“曰”字；每半叶八行，行十六至十八字不等，注文双行，行二十五至二十七字不等。北京图书馆藏有两部：一部全，即《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者；一部缺十一卷，抄配，系士礼居旧藏。

《函宋楼藏书志》卷 59 有元刊本，书题下署：“宋博士渤海吴淑撰注，元学士王磐校勘。”《平津馆鉴藏记·书籍》卷 1 也有元版，黑口，每叶廿二行，行廿字；缪荃孙以为是明嘉靖开封刊本。《云自在龕随笔》卷 4。

明代有以下几个刻本：(1) 嘉靖十一年壬辰 [1532] 无锡华麟祥刊本，前增其子华云一序；此本是苏守内江赵鹭洲所属刻，故亦称为内江赵鹭洲守苏刊于郡斋本；又因书口有崇正书院字样，也称为无锡崇正书院刊本；(2) 嘉靖十三年甲午 [1534] 开封太守南宫白珩字石岩刊于郡斋本，前增李濂一序，后有陈全序，黑口，每叶廿二行，行廿字；缪荃孙说“板式颇似元板”《云自在龕随笔》卷 4；(3) 万历十七年己丑 [1589] 宁寿堂刊本，前增万历乙丑接，万历无乙丑，当是己丑之误范应期一序。据《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记载，尚有明叶氏作德堂覆无锡华氏本。

清代有：(1)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1764] 华希閔剑光阁刊本，最流

行,然字句讹脱甚多;(2)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绣谷周氏令德堂刊本;(3)嘉庆六年辛酉[1801]文盛堂刊本。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 11 说:“不知何时以华本改为十一行,而尽删去书名下‘曰’字,并删节注文,仍题华麟祥校刊。[原注]此后剑光阁刊本因之,近日辑逸书者亦多据其本。如开篇《天部》‘地居下而阴油’注引徐整《三五历记》,近本竟全删之;又‘溟滓濛鸿’注引《帝系谱》并引注文,近本则删注文;‘雪霜降而风雨施,无非教也’注引《礼》曰‘天有四时,风雨雪霜,无非教也’,近本只注一‘礼’字。其它不可缕举。观其所节,意在去繁就简,似亦略通文义者,非书估所能为。不知吴氏引书,今大半亡佚,一字之存,当同一珠,乃复妄施斧削,使人人习读之书,竟不得真面目,其可恨十倍于陈禹谟。”

广事类赋 清代有循吴氏所创的体例而扩充之者数家:(1)华希閔字豫原,号芋园,无锡人撰并自注《广事类赋》四十卷,二十七门、二百九十一子目,目各一篇。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自序;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其弟希閔又为之重订,与吴氏原书一并付刊。(2)吴世旂字通帛,泾县人撰并自注《广广事类赋》三十二卷,一百三十七首。嘉庆元年丙辰[1796]自序。(3)王凤喈号简亭,江西新城人撰并自注《续广事类赋》三十卷,十一部、三百十四首。嘉庆三年戊午[1798]自序。(4)张均号坦斋撰并自注《事类赋补遗》十四卷,十三门、一百首。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自序。坊间后有合吴氏原著刻为《五种事类赋》者;又有汇而条附,刻为《事类统编》者。黄葆真号诚斋,丹阳人复逐类摘对附后,成《增补事类统编》九十三卷,梓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然除吴氏原著,其它只可供流俗獭祭之用,绝无保存往古文献的价值;而合刻、汇编之本,于吴氏原著采用的底本及校讎都不精,故谬误尤多。

(四) 《重广会史》

《宋史·艺文志》子类·类事类著录“《重广会史》一百卷”，下注：“不知作者。”其书在国内久已失传，南宋的藏书家晁公武、尤袤、陈振孙诸家的簿录，就已杳无消息。然有北宋刊孤本，一百卷足，由朝鲜流入日本，藏于前田侯爵家。前田侯十一世纲纪，性嗜古籍，凡本邦国典艺文及中土佚书，征求不倦，筑藏书文库名“尊经阁”。明治维新，虽稍稍散佚，而存留尚富。1928年，经日本育德财团用珂罗版影印，线装二十册，附《景宋本〈重广会史〉解题》用日文撰写一小册。其书乃重传于世。

撰著年代和刊刻年代 据《解题》的考证，书前有“经筵”两大字朱文方印，是宋时的印章；每册押尾有朝鲜朝廷的公章，称“高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并纪宋国建中靖国元年、辽国乾统元年纪元。其书到朝鲜入藏为宋建中靖国元年、辽乾统元年，亦即朝鲜肃宗朝辛巳岁，公历1101年，则其书必刻于宋徽宗赵佶之前可知。其书又引用了宋祁、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则编成必不能早于《新唐书》之行世。按宋本《新唐书》的《进表》后面有“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六日[1060—VII—26]奉旨，下杭州镂版颁行”字样。从嘉祐五年到建中靖国元年，其间凡四十二年，《重广会史》的编成和刊版，都应在这四十二年之间。胡道静补充说，“本书的避讳字至‘恒’、‘禎’、‘贞’、‘署’等字止卷13、叶14、前14行“署为主簿”，“署”字作“罍”；“勸”字则不避嫌名卷74、叶17、前13行，又卷76、叶2、后14行两“勸”字均不作“勉”，则刊刻应在神宗赵顼之前、英宗赵曙之世，其距《新唐书》之问世固甚近也。”《海隅读书记》。

《解题》又说：“就书名看，可能其前先有《会史》，次有《广会史》，最后乃赅事补充为《重广会史》。”按，南宋绍兴中访求图籍之书目《四库阙书目》史类载“《会史》一百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

书目》史类·正史类载“《会史》一百卷”。从卷数来看，可能这里的《会史》已是《重广会史》的简称。至于列入史类，正因为它是一部综合《十七史》的政事历史性的类书。

内容和门目 《解题》说：“本书内容，专取‘正史’事迹，分类排纂；兼取《左传》及子书，然全书中不过数条。全书标题五百五十有余。取材趣旨仿《册府元龟》，标题体裁似《通鉴总类》。盖浩浩烟海如《十七史》，其势猝难悉读。此书萃其菁华而类聚之，使稽古者易于检寻。编者本意果以此为目的，颇有足多。”

《重广会史》的门目，为主题揭示的性质。全书一百卷，每卷多者十门，少者二门，总共五百五十三门，不以部、类统率。门目举例如下：

[卷第5]君臣相遇第一 君臣相须第二 君不疑臣第三
君疑于臣第四 君戒于臣第五 臣戒于君第六

[卷第41]忍耻立功第一 事寡而功多第二 劳而无功第三
以功覆过第四 使功不如使过第五 释囚拜职第六

[卷第79]不与民争利第一 与民争利第二 轻利重义第三
重利轻义第四 见得思义第五 见利忘义第六 弃本逐末第七

每门按其主题，荟聚史事数则至数十则。举卷85《不待其招而往第四》共收三则为例如下：

《史记·商本纪》曰：“伊尹名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后汉·王霸传》：“光武兴义兵，霸谓曰：‘不自知量，贪慕威德，愿充行伍。’光武曰：‘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遂从破王寻、王邑。”

《新唐·房乔传》：“补隰城尉，顾中原方乱，慨然有忧天下志。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策杖上谒军门，一见如旧。”

篇幅 《重广会史》每叶三十行，行约二十五字。全书共约五百叶，总计约三十八万字。

引书 主要是引用纪、志、表、传体的所谓“正史”，自《史记》起至《新唐书》止；引《新唐》而不引《旧唐》；也不引用五代史书，因而不能用来校核薛居正的《五代史》。此外，只于卷1《君无为而治第一》开头处引《荀子》、《老子》各一条，《庄子》三条；《君不严而治第三》引《左传》一条。

《重广会史》是北宋中期编录、刊印的类书，所引用书皆据当时版本，自有可校订现行版本之处。《解题》举有二例：（1）第一卷第一题引《庄子》：“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乱。”此条见《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今世德堂刊本等均作“以无为为常”。按字书，“乱”训治，此书据本似优。（2）同卷、题又引《新唐书·道士司马承正^①传》：“帝曰理身无为……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与今本《新唐书》出入颇大，但与《旧唐书》文同。由于在整部《重广会史》中不引《旧唐》，而此则亦标明《新唐》，故《解题》引以为异。其实此则当系引用上发生了差错，未必《新唐》有与今见不同之本。

《解题》说：“故此书如全部检寻，可补正今本‘正史’之讹脱，盖不在鲜。”这话还是可信的。以今来说，这部北宋版的史事类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

^① 应作“司马承祜”，本书以避宋仁宗讳故改。

后 记

本书共十二章，初稿写成于1966年夏。旋遭艰屯，离斋书稿尽丧。先时曾誊录一至六章清本寄京就正于陈师乃乾，师过目后，送至中华书局编辑部，因得意外保存。今蒙书局检出刊行，至感欣慰。陈师当日垂览后，曾有长笺示知关于《北堂书钞》及《白孔六帖》向所未详诸事。又，尹石公世丈曾有一简垂告《古今图书集成》之舛闻。原欲据以订补原稿，而蒙厄之时，书信亦尽失，至堪扼腕。

原稿七至十章分述南宋、元、明、清主要类书，除对习知、习用之《玉海》、《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循例叙论外，并曾研索向来忽视之《记纂渊海》一百九十五卷的未刊本、《事文类要启割青钱》日本影印元泰定元年刊本及明隐士吴琬辑《三才广志》原书一千一百八十四卷，现时残存之明钞本，在北京图书馆有三百三十四卷（缩微胶卷；正本现在台北），在宁波天一阁有一百九十三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亦有一册计三卷。等，用力较勤，颇以失去为憾。

第十一章专叙重视图表之类书在第三章（第40页）上曾提及，第十二章专叙日用手册型之通俗类书。此两类型之类书，同时体现在《事林广记》一书。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时，属余为序，曾连类旁及，反复考论。惟当时印数甚少，见者不多，今此序文附收在拙著《农书与农书论集》农业出版社刊印中之后，以其略存本书最后两章之梗概，或可为研治类书者参考之助，故复及之。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胡道静

记于四平大楼海隅文库